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41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第四十一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年·北京



(京) 新登字 071 号

中共党史资料 (第四十一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北京 1929 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百善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8.25 印张 159 千字

1992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500 册

ISBN 7-80023-456-8/K · 445

定 价: 3.50 元

目 录

文 献

- 切实抓好党的组织建设工作 罗荣桓 (1)

回 忆 录

- 终生难忘的怀念 莫文骅 (6)
走出祁连山 赵正洪 (39)
抗战时期在皖南 李一氓 (60)
北线第一个大胜利 杨斯德 (111)
我军第一所炮兵学校的组建 郭化若 (130)

人 物 介 绍

- 1973 年周恩来回延安 刘 静 (139)
陈延年同志二三事 徐彬如 (151)
刘长胜传略 江柯林 (157)

专题资料

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后五年

- 斗争概述 邓礼峰 (188)
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 郑 谦 (204)

译文选登

去延安 [日] 野坂参三 韩凤琴译 (234)

小资料

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对外宣传

机构——《中国工人通信社》 程慎元 (253)

切实抓好党的组织建设工作*

罗荣桓

军委确定，明年部队的工作还是以贯彻创造四好连队为中心。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已经作了详细讨论。组织部门的任务，就是要从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面保证这个中心工作的胜利完成。

党的组织建设工作与中心工作的关系最密切，一切工作都靠党的组织活动去实现，因此组织部门应经常关心中心工作。但是不能说“组织部门就是管中心工作的”，这个提法不妥当。组织部门是管党的组织工作的业务部门，它的工作主要是抓党的组织建设，党的组织建设搞好了，就可以从组织上保证中心工作的完成。因此，组织部门必须紧紧抓住党的组织建设工作，要抓住不放，放了，组织部门就失去工作中心，就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创造四好连队运动中，一定要抓好支部建设。连队以党支部为核心，连队工作靠党支部的领导，党支部搞好了，连队才能实现四好的要求。

* 这是罗荣桓同志 1961 年 11 月 15 日在全军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摘录。

关于目前党的组织建设，主要应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加强党的教育。一年来，发展党员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绩，部队增加了大批新党员，同时，超期服役的的士兵多了，党的骨干相对地稳定下来了，因此，今后发展党员应作为一项经常的工作去进行。明年重点要放在加强党的教育，提高党员质量方面。现在连队党支部预备党员的数量很大，有些支部的骨干也是近一两年才入党的，缺乏党的基本知识，对他们不好好地进行教育，就不能很好发挥党员的作用。加强党的教育，提高党员质量，是建党的根本问题，明年一定要抓好这件工作。

健全和活跃党的生活。各级党的组织要把党的会议开好，要使党内民主生活活跃起来。现在有些党委和支部不懂得怎样开会，往往会前缺乏准备，没有一个酝酿过程。这种做法是不好的。一个人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开会要讨论的问题，不事先给委员出“安民告示”，让大家知道会议内容，早作准备，充分考虑，会议必然解决不了问题。有的单位开两个钟头会，书记一个人就讲了一个多钟头，这很不好。我们要学习毛主席开会的方法，在会前先出“安民告示”，使大家有充分准备，会上让大家畅所欲言，反复讨论，最后归纳起来，作出决定。这样就能发挥大家的积极性，集中集体的智慧。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办事，把党的生活活跃起来，要象毛主席指示的那样，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局面。过去

几次政治思想运动中，有些单位发生一些偏差，目前有些单位党的组织纪律有些松弛，这些都与党内民主生活不够正常有关。平时党的民主生活活跃，问题能够及时得到解决，在政治思想运动中就经得起考验，不会出大的偏差。每个党员必须过党的组织生活，把自己放在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有个别干部党员长期不过党的生活，脱离了党和群众的监督，经常违法乱纪，等问题被揭发出来，已经烂掉半截了。我们要吸取教训，一定要坚持党和群众对干部进行监督的原则。机关支部更要重视这一工作，应该好好抓一抓。

党内有大量的问题是要通过谈话来解决的。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都要做好谈话这项工作，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善于同群众谈话。群众的智慧是宝贵的，往往一个领导干部遇到了问题，自己闷了好几天想不出个名堂来，和群众谈谈话，群众两句话就给你点破了。谈话是联系群众做好工作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谈得好是不容易的，这里重要的问题是要有平等待人的态度。下级干部或者是战士找领导谈话时，往往有种种顾虑，鼓了很大勇气才敢谈出心里话来。领导干部一定要坐下来，耐心地听，不要嫌他罗唆。群众往往看你的态度讲话，你态度好，他就愿意说，你简单粗暴，他就把真相隐蔽起来，把你封闭起来。谈话决不能从印象出发，对人抱成见，这是最有害的。即使对方有缺点，也要先耐心听他讲，看他缺点在哪里，设法帮助他改正。一个同志向你讲了很多意见，总有一些是好的，对

改进工作有帮助，就应该虚心接受。这样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有的同志不是这样，不等人家把话说完就给顶回去，不准别人讲话，结果“阎王爷开店，鬼都不上门”，群众意见听不到，自己把自己封锁起来。我们要学习毛主席平等待人的作风，这种作风在我们建党建军的历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毛主席要找哪个干部谈话，总是先通知门卫，下雨天还叫警卫员拿着雨伞到门口去接，谈话时亲切耐心，平易近人。毛主席常常教导我们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正面的意见要听，反面的意见也要听。特别是同基层干部和战士谈话，更要这样。他们谈的往往是一些日常生活问题，一定要细心听，不要怕麻烦。群众对领导提意见，不论从哪个方面提出，都是有好处的。党的方针政策，很多都是要从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解决思想问题常常要从解决实际问题入手。要很好听取群众的意见，经过深思熟虑，研究分析，把问题弄清楚，然后采取措施，教育群众，解决问题。这就是毛主席说的，要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以平等的态度待人，善于同群众谈话，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这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应提到共产党员的党性上来认识。

了解和研究下级党委的工作方法。组织部门应该在党委和政治部首长的领导下，经常了解和研究下级党委执行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的情况；以及下级党委委员之间的团结和党委会议生活的情况，及时发现问题，总

总结经验，提出建议，以改进下级党委的工作。目前有些党委包揽行政事务，没有充分发挥行政首长和机关的作用，同时也降低了党委集体领导的作用，这种现象必须改进。党委应该抓方针政策和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经过集体讨论，作出决定，然后由委员分工负责执行，充分发挥行政干部和机关的积极性。只强调集体领导，不明确个人分工负责，是搞不好工作的。有些党委执行上级指示时，生搬硬套，不结合部队的实际情况，对下边统得太死，这种现象也必须改进。

检查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各项决议指示的执行情况。这是组织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一检查工作，应从调查研究入手，要把检查工作、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三者结合起来。要多搞些典型调查，认真帮助连队总结经验，使党的组织建设工作的决议指示真正落到实处。

政治机关的工作要具体、切实，不要粗枝大叶，不要一般化。组织部门的干部，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建党学说，要加强党性修养，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锻炼，发扬党的传统作风，成为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组织原则的模范。

终生难忘的怀念

莫文骅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我曾与毛泽东同志有过许多接触，得到过他老人家许多教诲和帮助。虽然岁月过去了很久，往事却历历在目。

—

我最初听说毛泽东这个名字，约在1926年。当时，我的家乡广西南宁风雨如磐，民不聊生。在太平天国革命遗风的影响下，民变蜂起，农民的革命要求十分强烈。1925年春，韦拔群同志从广州彭湃同志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归来后，在桂西北东兰、凤山一带，开展农民革命运动。在传闻中，我们知道了这次农民运动已大大不同于太平天国，而是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农民运动。而且知道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由毛泽东主持的，他是代表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讲习所的。

南宁是中国共产党在广西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城市之一。1926年12月，我在省立第一中学念书时加入了共产主

义青年团。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我和其他一大批同志先后被捕。在狱中我未暴露政治身份，但经受这次斗争磨炼和教育后，更坚定了革命意志，也体会到赤手空拳是对付不了反革命的。1928年2月我出狱回家，二姐夫邓绍棠（当时在旧军队中当营部书记）来看我。闲谈中他说：“朱、毛吹来吹去，现在吹起军队来了，在江西有了红军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红军，心中十分高兴，结合狱中的体会，懂得必须组织革命的军队，进行武装斗争。

1929年12月，我党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雷经天、韦拔群领导的百色武装起义胜利实现，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起义的政治纲领中提出“迅速与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会合”，并把它作为具体行动口号之一。我有幸参加了起义，在军部当中尉参谋。这也是我在以后的革命征途中逐步认识和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观点的起点。

1930年10月，红七军奉党中央命令，准备“打柳州、桂林等城市，而后向广东小北江方向发展，阻止广东敌人向北，以配合全国红军夺取武汉”，即在立三路线错误指导下，离开左右江地区，挥师东进。沿途与前堵后追的敌人浴血苦战，到达桂东北全州时，部队已损失1/3以上（原来7500人）。红七军党的前敌委员会接受了这一严重教训，决定放弃立三路线，取道湘、粤边，到江西去找朱德、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央红军。1931年1月在湖南道州听到了朱、毛红军在江西活动的确切消息，大家非常高兴，感到

有希望摆脱困境了。

1931年4月，被迫拆散分为两部分的红七军，历尽艰险危难，终于先后到达湘、赣苏维埃区，与该区红军会师。一到湘赣，我们耳目一新。感受最深的，一是看到新建的苏区政权，看到分得土地的翻身农民的高昂革命热情，看到亲切温暖的军民关系，看到根据地那种情绪热烈融和，到处是欢声笑语的乐观气氛。这对于一直在国民党区险境中孤军奋战的红七军来说，不啻是到了一个新的天地。二是到达后与湘赣独立师及红二十军一起作战，连战皆捷。湘赣红军和苏区人民都盛赞红七军英勇善战。当时，部队已大大减员，我先后任红五十八团四连政治委员和六连连长兼政治指导员（那时连改为指导员），并任红七军军委候补委员。在与部队共享胜利的喜悦时，大家都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红七军的战斗作风不谓不勇敢顽强，由于没有革命根据地而在国民党白区行军作战，往往吃败仗，被动挨打，到了苏区就能打胜仗。苏区的军民关系这样好，打仗时群众热烈支援，有时出的民工担架比部队还多，保证每个伤员都能救护下来，使我切身感到革命根据地万分重要。我们从实战中认识到，红军这样团结，官兵关系这样好，大家上下一心，协调一致，这都是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政策的结果，是我们迫切需要学习的。于是在作战间隙和休整时间，我们抓紧向苏区红军学习。先学群众工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游击战略战术等，接着又学习阶级分析、红军内部的民主制度、军政纪律和作风等等。经过学习，认

识提高了，眼界宽了，对毛泽东同志日益敬仰。这时，我们早已不停留于“到中央苏区会合朱毛”的口号，而是努力按照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方针原则建设部队。1932年7月，我们到达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合，又经过第三、四次反“围剿”等实战锻炼，红七军发展壮大起来，归属红三军团指挥，真正成为中央红军的组成部分。那时，红七军只剩1300多人。

但是，直到这时，我还没有见到过毛泽东同志。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听说有AB团捣乱，中央军委调红七军去叶坪保卫中央，说是毛泽东同志要来讲讲话，大家非常高兴，但后来未见到，部队又调走了，甚为失望！直到遵义会议后，总政治部召开军民联欢大会，毛泽东同志向中央红军总直属队和群众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当时红八军团撤销，任宣传部长的我，在总政治部待分配工作。听报告时，我挤到主席台前，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闻名不如见面，多年的愿望实现了，多么幸福啊！以后，我被分配到红军军委上级干部队（即中央苏区的红军大学）任政治委员和红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在长征中紧随总直纵队行军，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这才经常见到毛泽东同志。

二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方面军干部团与四方面军

的军事学校合编，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长、政治委员由四方面军的同志担任。刘少奇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但他们都未到职。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任教育长，临时主持学校工作。我任党总支部书记，临时主持政治部工作。学校驻在党中央驻地毛儿盖以西约10里地的卡英。当时，张国焘已经把他与党中央的路线分歧公开到部队，斗争开始激化。有一天，李特冲着我说：“你们红一方面军干部团很散漫，着装不整齐，精神不振，表现出右倾。”我听了很吃惊，当即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认为干部团是很有战斗力的，在长征中立过大功。李特听了我的解释发起火来。这时正好一位衣衫褴褛、一手提着个羊头，一手拿着个土罐子的一方面军干部从窗下走过，李特就指着他说：“你看他像什么样子！这不是向困难投降吗？向困难投降还不是右倾机会主义？”我立即反驳说：“这是休养连的病号。他原是独立师的政治委员，带病坚持跟部队走，说明他对革命是坚决的，怎能说他是向困难投降，是右倾机会主义？你的逻辑不对头啊！”他见我这样说便没有再谈下去。次日，李特约我去谈谈，先请我吃苞米糊糊，这在当时是难得的。又郑重地提出来：“我们昨天谈的事，你再想过没有？干部团是右倾机会主义啊！承认它，好转变。”我说：“没有这回事承认什么？”他又问我：“你读过书吗？”我说：“读过一年半中学。”他忽然严肃起来说：“那么你是知识分子喽，难怪不坦白承认错误！”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因为我知道张国焘歧视知识分子。在四方面军，戴上知识分子的帽子

是很危险的。又一想，李特是从苏联学习回国的，是军政大学的学生，论文化他比我高，就讥讽地说：“我哪能谈得上是知识分子！如果我也算个知识分子，也只是个小知识分子。那你教育长同志不就是大大的知识分子了么？如果说不承认错误是小知识分子的特点，那么，造谣生事就是你这样大知识分子的特点喽！”他听了脸一沉，沉思了一会，没有生气，反而笑咪咪地问：“你过去干过什么工作？”我说：“当过参谋、辎重队长、连长、连政委、游击队临时总指挥、军分区司令、师政治部主任、军团宣传部长、上级干部队政委，最近是干部团的政治处主任。”他说：“象你这样的干部在四方面军当军级干部也是可以的了。”我听他话里有鬼，便说：“在一方面军，象我这样的干部多得很，我算什么。”就这样谈了半个多钟头，话不投机，我起身要走。他又郑重地说：“这个问题你得慎重考虑啊！”我回答说：“你得收回你的不正确言论。”

我回来一想，李特这些话决不只是一般闲谈开开玩笑。这分明是借诬蔑干部团右倾来攻讦党中央，并且挑拨离间，搞小组织分裂活动。这一情况必须向上级反映。第二天我带着身边的两个同志去毛儿盖。先到上级干部队找肖劲光、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李一氓、冯雪峰等几位熟悉的同志，征询他们的看法。他们尤其是冯雪峰同志支持我向
上级反映。于是我找了总政治部代主任博古同志和副主任李富春同志，把经过情况作了详细汇报，两位领导听了非常气愤地说：“要和他继续斗争，要发动群众批判他的错误

观点。”还说要把这一情况立刻报告给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因天色已晚，他们让我住一夜再回去。次日早，富春同志来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可以继续和李特的错误观点作斗争，但组织不宜出面，还不是时候。因为当时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还没有完全认清张国焘的错误，所以发动群众斗争李特是不合适的。”我听了感到毛泽东同志胸怀宽广，谋虑深远，决心回去照他的指示办。走到村边，陈赓同志等着向我询问此事。他支持和鼓励我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继续斗争。

回去后，李特可能觉察到我已向党中央汇报此事，不再和我谈这个问题，只谈些具体工作。但我发现，当部队转移时，李特总是派出几个警卫员跟着监视我。不久，四方面军的一个军长何畏来任政治委员。我把这件事详细地告诉了他，建议他作必要的处理，但他不吭气。

过了草地，到达巴西一带时，部队已普遍知道党内关于继续北上抗日还是回师向西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争论，都非常关心，议论纷纷，气氛有些紧张。有一天早上约4时左右，李德突然来到我床边把我叫醒说：“快起来，中央决定北上，命令即到。你把身边的人组织好，要密切注意李特，不要让他把队伍带走，同时，要防备他整你。”李德虽是“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重要决策人，但仍是中央军事顾问，当时是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路线的。我意识到，他来叫我，是军委示意的。就急忙召集有关人员动员布置，派青年干事张正光到骑兵科长苏进处，告诉他立即出发随

中央直属队前进。行进中李特情绪很低，只是随着部队走。何畏一接到继续北上命令，就借口找军委谈谈，溜到张国焘那里去了。中午，部队来到一个山边村庄停下大休息，红军大学的队伍突然乱起来。原来红四方面军的300多名学员在李特的鼓动和压力下不愿北上，要回去。一个骑兵来传话说四方面军总部命令红大的四方面军学员立即回去。又传说四方面军的部队追上来了，可能会有战斗。我们一方面军的学员纷纷劝说四方面军学员跟中央北上。李特一面用皮鞭抽打不愿回去的四方面军的干部，一面高喊：“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一会儿，李特和李德用俄语争吵对骂。懂得俄语的博古说李德骂李特为流氓，李特骂李德为赤色帝国主义。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从一家小屋里缓步走出来，指着村边的小河对李特说：“你不要闹了，彭德怀来了。”只见彭德怀同志正过河来，李特害怕彭德怀同志，也就不再吵了，他不敢和彭德怀见面，拐弯避开了。毛泽东同志说：“你们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去是可以的。”又对我说：“你们也不要劝说了，让他们回去，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这样，李特便命令四方面军的同志折返，其中部分想北上的同志也只好跟着走了。我便带着一方面军的学员随军委纵队北上。一年以后，正如毛泽东同志预见的那样，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同张国焘的斗争，和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又与一方面军会合了。

三

我们党为了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非常重视培养干部，以之作为开创党的事业，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基本措施之一。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更抓紧这一工作，毛泽东同志尤其如此。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时，党中央将中央苏区的红军大学编为中央军委的“上级干部队”，将几个红军学校编为干部团，均属中央纵队序列，随党中央前进，并保护中央。1935年夏，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两河口会议后，组织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红一、四方面军分开后，一方面军改为陕甘支队，成立随营学校。1935年10月，干部营与陕北的红军学校合并（含上干队），成立红军学校，随中央驻瓦窑堡。1936年1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红军大学”。同年6月改建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毛泽东同志兼任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我任党总支部书记（不设政治部）。学员分一、二、三科。林、罗和我又都是一科学员。6月1日在瓦窑堡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都参加了。毛泽东同志讲了话。6月21日国民党军偷袭瓦窑堡，红大一、二科随党中央迁到保安县（现志丹县），第三科改为步兵学校驻甘肃庆阳。1937年1月，毛泽东同志派林彪、刘亚楼和我去延安组建红大第二期，后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毛泽东同

志兼任该委员会主席。

在培养干部问题上，毛泽东同志首先强调政治思想上的教育。1936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开办之初，毛泽东同志找校领导谈话，明确指出红大的教学重点，一个是讲统一战线，一个是讲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红大”和“抗大”的教育都认真贯彻党的政治路线和战略策略，以适应当时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这一战略转变的需要，体现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方针。他对“抗大”的教学工作非常关心，亲自过问教学计划。一次郭化若同志对“抗大”的教育计划提了一些意见，报告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立即转给“抗大”，并复信郭化若说：“你的意见已告罗瑞卿、周昆、莫文骅、刘亚楼、杨兰史讨论了。”抗大课程安排军政并重。在政治课程中，既有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课程，又有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的课程。后者都是党中央领导同志亲自讲授。我感到，这一时期，从在西北“红大”时部分学员参加听毛泽东同志讲《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在“红大”一期毛泽东同志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抗大”讲授《辩证唯物论》，以及以后学习《论持久战》，加上张闻天同志讲授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朱德同志讲授的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李维汉同志讲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等等，我们所受的教育启发非常丰富深刻，不仅懂得了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战略策略，而且懂

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懂得了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分歧，从而较系统地领会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观点，为以后的革命工作打下了较牢固的政治思想基础。

在培养教育干部中，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工农干部的文化学习。他强调指出：“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以学习马列主义，……政治、军事、经济，哪一门都可以学。”早在1935年冬季在西北“红大”时，毛泽东同志叫我去，亲自把他的警卫员陈昌奉介绍给我，要我带他到“红大”去学习，首先是学习文化，我照办了。他说：“对红军的干部战士都要好好地培养，首先要提高文化，不识字的从识字开始。”1936年4月26日，毛泽东同志给“红大”教育计划的批复信说：“三科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的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果学生一切课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么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有限的……如果学会了看书作文，那么他们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了一种常常用得着的基础工具了。”据此，“红大”三科开展了文化教育。后来“抗大”干部队的文化教育时间占1/3，学习内容包括语文、数学、自然和史地常识等等。毛泽东同志对红军学习文化的重视，体现了他对工农干部、战士成长的深切关怀。

为了正确领导革命，在新的征途上胜利前进，毛泽东同志致力于理论研究工作。他到“红大”、“抗大”讲授的

课程，及先后发表的许多重要的理论著作，都是他学习研究的丰硕成果。他还经常组织有关同志进行研究讨论，借以教育和推动干部学习，尤其对身边工作人员更注意。仅我参加过的就有他先后组织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和哲学问题研究会。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1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讨论到深夜十一二点钟。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我（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被吸收参加了。《战争论》的学习讨论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是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译文又很粗劣，读起来很不好懂。后来由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记得当时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5倍到10倍的兵力。当然，这里也有个政治问题。我们是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凡是非正义战争就不得不分兵把口。”他还用秦始皇先后派李信和王翦领兵灭楚一败一胜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参加哲学研究会的合起来不到10人（与后来延安正式成立的新哲学研究会是一回事）。每次讨论都是由哲学家艾思奇、和培元等先讲，然后讨论。毛泽东同志除了插话，都是在最后讲自己的看法。议论的中心围绕军事辩证法问题较多，实际上是对红军在10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毛泽东同志还曾经就这个题目作过一个报

告，可惜没有印发讲稿。后来发现一个军事辩证法讲稿，没有署名，科研人员认为是他的。我当时不过 30 岁，过去没学过，懂得很少，参加讨论主要是跟着学习，得到了很多启示和帮助。

毛泽东同志的学习精神是大家普遍敬佩的。他除了工作之外就是看书学习。讲话作报告及各种工作文稿都是自己动手写。他非常爱书，很注意收集书刊。当时全国各地人民群众送来的慰问品中有一些书刊，他要我们经常挑选一些送给他。一次我发现一本日本人写的关于外线作战的书，当向他谈到这件事时，他要我立即借给他。过了一天，我把书送给他，他见到书非常高兴。我知道他正在考虑外线作战问题，急于参阅这方面的书籍，这书对他比我更重要。他还经常推荐一些书给大家看。如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李达同志的《社会学大纲》，都是在“红大”和“抗大”初期推荐给大家看的。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倡导和带动下，当时的学习气氛十分热烈。在保安“红大”时，书籍不多，大家都如饥似渴地争着阅读，随时可以看到人们在讨论问题，星期天也不休息。为此，党中央曾多次派杨尚昆同志来传达指示，强调劳逸结合，甚至规定星期天要把门关起来（其实没有门），强迫学员到户外活动休息。同志们虽然出去了，大多数人仍然拿着书本找个草垛坐着晒太阳看书。为什么学习热情这么高？动力就是为了实现民族和阶级解放的雄心壮志和政治责任感，是由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热烈向往和追求。它反映了中国

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的朝气蓬勃奋发进取精神，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前奏。

四

在“抗大”初期的政治教育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是教育的重点之一，也是大家议论较多的问题。如关于西安事变的处理问题、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问题、关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问题、关于统一战线是战略还是策略等等，都曾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就此多次来“抗大”讲课，作了大量的全面深刻的论述。1936年12月26日，即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第二天，毛泽东同志即到保安的“红大”操场，给中央机关干部和“红大”学员作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阐明党中央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实现，成为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的道理。他还风趣地说：“陕北毛驴很多，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用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用这个比喻生动地说明“逼蒋抗战”的方针，并且阐明国共合作抗日是大势所趋，是争取全国各阶层人民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抗战的关键。但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的作用和威望的提高，对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是不会甘心的，因此又要提防着他，这就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联合。1937年

12月15日，我在抗大任政治部主任期间，毛泽东同志在为“抗大”二期九队“救亡室”题词时，又着重强调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他说：“这‘救亡’二字就是你们及全中国人民在现阶段上唯一的总目标。达到这目标的道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你们学习这个统一战线的道理和方法，唯有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救亡之目的。”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关于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的著名论述，使大家对党的统一战线方针的理解不断加深。

在党所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发展的时候，有的同志曾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过高，缺乏必要的警惕，有单纯依靠国民党军队和轻敌速胜的思想。王明搞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主张完全依赖国民党，“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要把党中央搬到武汉去。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说：“要去你们去，我带留守兵团坐镇清凉山。你们去武汉，国民党派几个卫兵，不让你们出来，看你们怎么办！”当时我们是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的。他还多次在不同场合讲：“我们现在就是吃留守兵团的饭”，意思是依靠留守部队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包围下，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是不行的。毛泽东同志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本性是摸透了的。1939年当抗日战争刚刚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就确定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当时还有不少同志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阴谋认识不清，只看到

蒋介石表面上讲了一些好话。一次，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门前作报告时提醒大家说：“蒋介石一讲我们的好话，他策划的反共高潮就会到来。失败了，他又要骂我们一阵才收场。”果然不久就出现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团结抗日友军的工作和反磨擦斗争。他曾提出：“友军工作是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中心的工作”，“争取二百万友军抗日，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心一环”。为此，党中央发出了一系列的指示文件，毛泽东同志也多次口头指示。从这些指示中我们体会到，既不能因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活动而放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根本原则，又不能因为团结抗日而放松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警惕性，工作中要十分慎重仔细。在陕甘宁边区，团结友军的工作和反磨擦斗争往往是由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即八路军留守兵团）出面，但实际上，对于一些重大问题，是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直接指导下，特别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导、亲自决策和参与下进行的。他指示我们，对国民党军队，包括围困陕甘宁边区的几十万国民党军，要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1941年7月，由中央统战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向全军发了《介绍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与友军交朋友工作的经验》。对来到边区的国民党军队要人，如卫立煌、邓宝珊等，虽由留守兵团负责接待，但毛泽东同志都亲自接见交谈。就连那个在绥德地区猖狂进行

反共活动的国民党顽固分子何绍南，毛泽东同志也耐心地亲自与他谈话，进行批评教育。另一方面我们又要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1939年初，驻洛川的国民党新编骑兵第二师师长马禄（属马家回军）率3000余人马进占我郿县南部一些村镇，来电要借道延安去榆林，并派参谋来联络。毛泽东同志一见电报，马上指示肖劲光同志立即复电，不准他们过延安，只准过延长。并指示有关部队，如果他们强行来延安，你们就可以打，即使他们走延长过去，也要作必要的布置。他让曹里怀（当时任留守兵团参谋长）亲自去郿县组织部队准备战斗，监视马师行动；由我陪送他的联络参谋至郿县洛川边界。同时，分别给国民党战区负责人及有关方面发电报，指责马师行动；在郿县地区张贴布告，揭露和警告反共顽固分子；派郭化若、袁光为代表先后去与马禄谈判。马禄见我方态度坚决，义正词严，表示他本人不愿和我们打。后又来信说是误会，并撤回到原防地。事后查明，国民党顽固派指使马禄师的这一活动，是阴谋探我虚实，制造事端，绝非“误会”。从这件事情中也看出毛泽东同志阶级警惕性非常高，眼光敏锐，反映很快。也使我们认识到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必须保持政治上的高度敏感和头脑清醒，斗争方式灵活，但又不脱离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基本立场。

五

最令人难忘的是毛泽东同志率领我们度过的漫长的艰难岁月。在艰苦困难的情况下，他总是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来感染我们；精辟阐述斗争的深远意义来鼓舞我们；用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来教育我们；强调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就能战胜困难，立于不败之地道理来引导我们。1936年7月，“红大”随党中央迁到保安县，生活十分困难。当地群众说：“保安穷山窝，破庙比房多，菩萨比人多。”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白手起家，因陋就简。一科以城外山崖上的石洞为校舍。这些石洞也不知是哪个朝代开凿的，据说是供奉“元始天尊”的。因为长期没人住，洞内外野草丛生，乱石纵横，有的做过羊圈，有的是兔窟狼窝，败草兽粪，狼籍不堪。我们先来个大扫除，把洞里洞外清扫得干干净净；再来个土石作业，洗刷洞壁，抹黑板，砌石讲台、石课桌、石凳子，垒石炕；打来野草编成草帘子挂在洞口挡风；又用3天时间修路。把洞与洞串通起来。就这样，把一片荒山野洞改造成了别具风格的边区最高学府。开学后，毛泽东同志来讲课，他高兴地赞许我们的劳动成果，风趣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这既是对我们的表扬鼓励，又是对我们交待了庄严而

又重大的革命任务。一番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学习劲头更足了。当地群众也特地给学校送来了一面锦旗，写着“劳动可以创造世界”，表示对学校革命精神的高度赞扬。后来西安事变后的确就结业了，下山了。

1937年4月，“红大”二期由保安迁到延安成立“抗大”，虽然条件好一些，但老干部须重新训练，新青年如潮水般涌进来，校舍不足是急待解决的难题。毛泽东同志又指示我们挖窑洞。罗瑞卿、刘亚楼、杨至诚和我等本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决定拜当地群众为师，自己动手在延安城北门外一带挖窑洞，计划用15天时间挖出150个土窑洞。这是一场紧张热烈的建校劳动，党中央很重视，毛泽东同志亲笔写了“我们的伟大事业”的题词。我们就以此题词作为建校工地专刊的刊名。开工后，全校人员齐上阵，校首长也是边劳动边指挥。经过半个月突击，沿山坡挖成175个新式窑洞，而且内部都装修得很好，宽敞明亮，冬暖夏凉，还便于防空。大家又一鼓作气修筑了3000多米的盘山“抗大公路”，使上山下坡更加坦荡。站在山下往上看，一排排一层层窑洞鳞次栉比，犹如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高接云端，气魄雄伟壮观。到了晚上，点点灯火闪烁在山上，与碧空繁星交相辉映，好像银河落入人间，把古老的延安城装点得更加绚丽多姿，生气盎然。当时国际友人斯诺、马海德、史沫特莱等参观“抗大”，都钦佩地称誉为“窑洞大学”。举行新校舍落成典礼大会时，党中央把毛泽东同志手书的“我们的伟大事业”制成横匾送来。毛

泽东同志在大会上讲话说：“在这次伟大的事业中获得成功的原因，把它总结起来说，就是能够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并说：“你们现在已经有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的精神，只要在这个基础上，经你们的努力，把它继续发扬与发挥起来，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是完全可能的。”我们从讲话中得到启示：不仅要凭这种精神建设“抗大”，还要凭这种精神驱逐日寇，建设起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人民中国。挖窑洞结束后，我作了《挖窑洞政治工作》报告以总结经验，内容是毛泽东同志倡导的自力更生方针和艰苦奋斗的精神。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要求“抗大”在继承红军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优良作风，以之培育学员，使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作风传下去。毛泽东同志在“红大”第一期开学典礼上讲话时就提出，创办“红大”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后来在为纪念“抗大”三周年所写的文章里，再一次明确规定“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强调“这三者是造就一个革命军人所不可缺少的”。1937年上半年，有一次林彪到毛泽东同志那里汇报和请示工作，他口头指示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八个字作为校训。我们就把这八个字用红布长幅挂起来，并指示大家学习。以后这三句话八个字形成为完整的“抗大”校风，直至现在成为全军学校的校风。毛泽东同志对“抗大”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他说：“‘抗大’同学毕业后，要能克服困难，联系群众，具有严格的组织纪

律性和民主作风，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谁要贪污腐败，不努力工作，那便不成其为“抗大”学生，就是背叛了“抗大”的纪律。”“抗大”的工作是始终贯彻了这些指示精神的。

陕甘宁边区从历史上讲就是经济落后、甚为贫困的地区。1939年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实行经济扼杀政策，严厉封锁禁运，约定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很有限的一点军饷和军需实物也停止供应了，又在全国发动反共高潮，加上日本侵略军对解放区的大举进攻，造成留守兵团的严重经济困难。当时的西北局书记高岗对保卫陕甘宁边区部队的子弟兵没有什么照顾，时值寒冬到来，怎么办呢？有一次，八路军留守兵团开团以上干部会，会后大家要见毛泽东同志。肖劲光、曹里怀、耿飏、甘渭汉、王维舟、杜平、白志文、袁渊、张才干、贺晋年、阎红彦等同志和我都去了。毛泽东同志正在午休，我们在门口等了一会儿。他起来了，让我们进去，就和我们交谈起来。大家诉说部队物质生活上的种种困难。毛泽东同志说：“怎么办呢？困难是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给我们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把军队解散，各自回家；一个是自己动手搞生产。你们说怎么办好？我看还是自己搞生产好。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嘛！”大家得到启发赞成搞生产，当然不会赞成解散部队回家的。以后毛泽东同志又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和指示，号召做好经济工作，把人力组织起来，生产自给，打破敌顽的封锁围困，立于不败之地。后来，又写了“自

已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来鼓舞大家。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留守兵团自1938年秋就开始搞生产。开始只是解决副食和生活用品问题，以后发展到开荒种粮，生产自给，大规模屯田生产，整个边区展开了大生产运动。最为感人的是，上上下下同甘共苦，共渡难关。中央领导同志和大家一样生产劳动，每人开荒种两分菜地。朱总司令种的西红柿吃不了，送给我们大家吃。他还每天拂晓前带领警卫员去马路上拾马粪。周恩来副主席纺线传为美谈，也鼓舞了生产热忱。大家都吃粗粮。毛泽东同志的衣服已经补丁加补丁，鞋子烤火烧了一个洞照样穿。有几次我们在他那里学习、开会，到了深夜，他把党中央照顾他的一点大米拿出来，熬稀粥请大家吃，当时，这就算是很高的享受了。后来，党领导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学习活动和生产自给发展成为整风、生产两大运动，毛泽东同志称之为整个革命链条中的两个环子。他指出：“普遍推广这两大运动，以为其他各项战斗任务的基础。果能如此，那么，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就有把握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以铁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断的英明正确。

六

毛泽东同志在指导军事工作中，非常重视军政军民关系。在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理论中，他就此作了大量论述，意义极其深远。其中规定的我军三大任务中，生

产和做群众工作两项都关系到军民关系问题。保证军民一致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原则之一。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我军的优良传统。在日常工作中，毛泽东同志也十分重视抓这方面的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留守兵团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加强了战斗友谊和团结，关系是很密切的。但在抗战初期，在边区的困难日益加重的情况下，军政军民之间也难免产生过一些矛盾。因为生产，去定边运盐，部队是公家骡马运的，费用少；老百姓是自己的骡马运的，费用多；开骡马大店，部队的人吃公家的饭，老百姓吃自己的饭，因此部队的店收费少，等等，造成了与民争利；为了占荒山也发生过纠葛。有少数人不能正确对待，相互埋怨。军队发生的不尊重政府和违犯群众纪律的事情也增多了，单纯军事观点和军阀残余思想影响有所抬头。有的干部只强调自己的困难和需要，袒护部队，使一些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有力的纠正。同时国民党顽固派还千方百计地挑拨和破坏我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对这种情况非常重视，亲自做工作协调军政军民关系。1939年冬天，我到驻在某地的警备四团检查工作，发现军民关系存在一些问题，部队反映当地群众对部队支持不够。我为此给边区高自立副主席打电报反映情况，请求边区政府帮助解决部队的困难。我回来后不久，突然毛泽东同志叫我去。进窑洞门一看，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李富春、肖劲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还有西北

局书记高岗都在，看样子是正在开会当中临时找我去的。毛泽东同志见我进去就批评说：“你们军民关系不好，不检讨自己，还向中央告状，埋怨政府。”我知道是电报出了问题，赶忙作检讨，并说明是给私人的电报，中央如何知道我不清楚，没有告状。我讲完后，边区一位领导同志又讲了一些部队不遵守群众纪律的事。毛泽东同志说：“莫文骅检讨了，你们也要检讨检讨嘛！”又说：“你们军队要拥护政府，要爱护人民。你们做地方工作的，也要拥护军队，照顾子弟兵。”从这件事我领悟到，在军政军民关系发生矛盾时，军队应该首先严格检讨自己，作自我批评，决不能只强调自己的困难。军地双方应互相谅解，不能互相埋怨，互相指责。

还有一次，是1940年下半年，毛泽东同志在杨家岭接见八路军留守部队的一些领导同志，到会的有肖劲光、耿飏、阎红彦、甘渭汉、贺晋年、文年生、钟汉华、余飞、周仁杰、刘随春、李宗贵和我等10多人。毛泽东同志半开玩笑地说：“今天请各路诸侯来谈谈军民关系问题。”有的同志发言时带有怨气，埋怨群众态度不好，说有的老百姓动不动就要拉着部队同志找毛主席评理。毛泽东同志听了以后，耐心地开导我们说：“开天辟地以来，只有军管民，老百姓见了军队就跑。现在老百姓敢批评军队，这是大好事。从古到今，哪有老百姓敢批评军队的？你们懂历史，你们说说看，是不是这样？如今变成了民管军，这该多好啊！这说明我们边区政府的民主建政工作有很大成绩。军队有广

大人民群众当老师，你们做军队工作的才不会犯大错误，才能打胜仗。边区才有希望。”一席话说得大家豁然开朗，心悦诚服，怨气一扫而光。认识到军队要加强军政军民团结，这决不仅仅是方式方法问题，而是自觉保持人民军队本质的问题，是思想意识改造的问题。要摆正军队与人民群众的位置，自觉地把军队放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接受人民群众教育监督的位置上，彻底肃清剥削阶级军队的残余意识即军阀残余思想的影响，树立牢固的拥政爱民观念。

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后来春节前后，陕甘宁边区掀起了热烈的“拥军优抗”、“拥政爱民”活动。军地双方分别作出了决定，发出了指示，颁布了《拥军公约》和《拥政爱民公约》。边区政府颁布了有关当时军政军民关系具体政策问题的一系列法令、条例。部队则在教育基础上整顿群众纪律，进行遵纪守法大检查，强调爱护与节省民财民力，部队生产自给，减轻人民负担。在春节前后开展了大规模的军政军民联欢活动，整个边区呈现出空前热烈的军民团结一致，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高昂欢快气氛。这一活动的效果很突出，不仅增强了军民团结，加强了边区力量，同时对军队建设具有深远历史意义。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写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中要求全国各抗日根据地于1944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规定这一运动“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次年党中央的有关

指示称之为：“旧历年节中最重要的革命工作”，并延续下来，形成新的革命制度和光荣传统。

七

凡是有成就的军事统帅，无不从严治军，毛泽东同志也是如此，但他注意首先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党和从严治军。他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就是从思想上政治上从严治军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在我的记忆中，每当个别谈到军队建设问题时，他总是强调要学习贯彻古田会议决议。

1942年1月23日，毛泽东同志亲笔写信给谭政同志（当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和我，再次强调留守兵团要学习古田会议决议。信的全文如下：

谭 政
莫文骅 二同志：

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本〕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

毛泽东一月二十三日

当时我们留守兵团的几个领导同志看到毛泽东同志的信后，思想上受到很大的震动和激励，感到这封信的分量

不轻，要求很高，是针对当时留守兵团情况所作的重要指示。

留守兵团建立以来，是按照古田会议决议指引下形成的优良传统进行部队建设的，这是主导的方面。然而留守兵团部队是由红一、二、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的部分部队组建而成，由于王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由于红军各根据地长期隔离，各地区和经历不同造成不一致不统一，由于大量新成员对我军传统还没有系统深入学习，不少同志分不清正确建军路线和错误建军路线的界线，有的还不知道古田会议决议的基本思想内容。在当时严重困难形势的考验下，这一缺陷就更明显地暴露出来，部队中出现不少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以脱离群众为特征的军阀主义残余影响和教条主义影响，造成军政军民之间，部队内部上下之间、官兵之间的思想隔阂，工作作风不一致；在生产中，本位主义、个人主义有所滋长；有的单位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有力的纠正。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给解决这些矛盾指出了根本出路。我们积极认真地贯彻执行了这一指示，各部队很快掀起了学习和贯彻古田会议决议，以古田会议决议来统一建军原则、政治工作，深入整风学习的热潮，并取得很大的收获。以后又结合进行拥政爱民运动和部队内部的尊干爱兵运动，加强了军政军民和部队内部团结。部队政治工作也进一步摆脱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影响，在部队建设和对敌斗争中更好地发挥了作用。

从严治军首先要从干部做起，毛泽东同志对待干部是既严格又宽厚的，严格是出于对部队对干部的关怀和爱护。1937年在延安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时，有些四方面军的同志怀有不同程度的疑虑，认为是整四方面军的干部。少数同志还抱有抵触情绪，甚至少数的有越轨行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要把张国焘的错误同四方面军的干部区别开来。对四方面军的干部，既要求他们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深刻认识并自觉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又要耐心地教育团结，消除疑虑和隔阂，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做到一视同仁，正确使用。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中对四方面军干部作了正确的而且很高的评价，强调“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这种既严肃而又耐心的工作，使四方面军的同志深受教育和感动。即使少数思想抵触较大，甚至怀有对立情绪的同志，也都认识和悔改了自己的错误，团结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下，积极英勇地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对于违犯纪律的干部，毛泽东同志是决不姑息迁就的。在延安“抗大”时，一位负责同志违犯了不许与在校学习的女青年恋爱结婚的规定，青年学生议论纷纷，毛泽东同志知道后下了手令，给这位干部以降职处分。当时校领导念及这位干部对革命是有贡献有功绩的，想从轻处理。我写报告给毛泽东同志为这位干部说情，还用了个不当的词句，说：“请收回成命”。毛泽东同志把我叫去，严肃批评说：“你做出的规定，你自己又带头违犯，这怎么能行啊！”他纠正了这

种姑息迁就思想，强调革命纪律的严肃性，仍然决定给这位违纪干部以降职处分。另一件事是，“抗大”有一个队长黄克功，为了恋爱纠纷开枪打死一个女学生。“抗大”一位领导考虑黄克功的历史功绩，向毛泽东同志建议对他免于死刑，又被毛泽东同志狠批一顿。最后还是把这个红军长征时的团政委枪决了。这两件事的严肃处理，在群众中留下了很好的影响，有的知识青年开始不满意，后来觉得共产党、八路军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办事是认真的，感动得流泪，使他们受到一次深刻的纪律教育。

我军的纪律是建立在高度的政治思想自觉基础上的，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首先提高部队、特别是干部的政治素质。建国以后，我军的政治训练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各级军事院校都开设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课和政治时事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课。为了集中培养全军高中级政治工作干部，1954年创办了解放军政治学院，罗荣桓、肖华同志兼任正、副院长，我任副院长主持学院日常工作。毛泽东同志对学院工作很关心，每期毕业学员他都接见，向我询问教学工作情况，并关心学员中少数民族干部的学习情况，还给校刊题了“思想战线”4个字。刘少奇同志批准从党费中拨50万元作为学院的机动费。自1961年开始，政治学院组织学员通读《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并结合各门课程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周恩来同志在怀仁堂的一次干部会上提出：“外交干部要到罗荣桓院长和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学习”，政治学院即办了一期外事干部班。1963年6月23日，罗荣

桓同志逝世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同志在薄一波同志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各部设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后，并批示“地方干部到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学习”。因而政治学院又开设了地方干部班，并编印了系统的政治工作教材。彭真、叶剑英同志对这一工作都很关心和支持。因为学员大量增加，学院需要扩建，谷牧同志（当时在国家计委工作）表示在人力物力上都全力支持。后因军队院校整风，接着“文革”开始而中止。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同时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及中国史学、文学、诗词、书法等等多方面的渊博知识和精深造诣，是众所周知，令人敬佩的。他既是高瞻远瞩、振聋发聩的革命理论家、战略家，又是开天辟地、叱咤风云的革命实践家。他倡导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思想，自己又是胜利实践这一思想的楷模。在平时，他是一位风度翩翩、文雅持重的学者，在危急情况下，他又是胆略过人、镇定自若、应付裕如的指挥者。我作为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成长的军队干部，在与毛泽东同志这位革命伟人的接触中，一方面自觉水平很低而十分胆怯谨慎，一方面他那幽默风趣的语言和平易近人的态度又使我感到非常亲切，他那深邃的思想使我深受启迪。在延安时，有一次他亲自修改了我起草的一篇文章，并专门叫我去。一进门，他就“幽默”地说：“你

真比斯大林还行。”我一下愣住了，问：“报告主席，是怎么回事？”他说：“关于对德宣战，斯大林用不到一千字的文章，你的文章三千字，不是高明么？但是，他讲清楚了，你没讲清楚。”这我才明白，说：“我写不好，所以请主席改。”他说：“你不是当过宣传部长么？”我说：“战争时期的宣传工作，大多用口讲或写提纲，我文章写的少。”他“唔”了一声，对我讲怎样写文章，怎样抓住中心，做到简练生动，并告诫要象鲁迅讲的那样，文章写成后至少要看三遍。还有一次，一个工作问题我想了两个方案下不了决心，跑去请示毛泽东同志，请问他哪个办法好，他批评我说：“不能你出题目让我做文章，两个方案都可以考虑，你应该提出个倾向性意见。”我谈了倾向性想法后，他说：“这就对了，就这么办。”这是要求我独立思考解决问题。

又有一次，毛泽东同志要我去，我到之后还没坐下，他便说：“你对‘论持久战’有什么意见？”当时我吃了一惊，答：“报告主席，没有意见。”他又问：“那么，为什么不在留守兵团传达？”我答：当初稿出来时，主席给我一份，并附一封信说，要我阅后提意见。我读之后，觉得很好，有些地方了解还不深刻，准备再读，但叶子龙同志来电话收回去了。出版后，我成立一个学习班，调部队部分同志学习1个月，现在回去传达学习了。学习怎样，还未检查。他听后“唔”了一声。这时，我又问，这是谁报告的？他说是高岗。我听后火了，便把对高岗的意见说了。但毛泽东同志没有回答，问我：“你在什么单位工作？”我想，这就

奇怪了，他还不知道我在哪个单位工作？只好答：“在留守兵团嘛！”他又问：“在什么地区？”我答：“在边区。”他便说：“这就对了，你们驻在陕甘宁边区就要好好注意搞好与高岗的关系。你知道，中央的政策，高岗不点头在边区也是行不通的。”谈了一会，我告退，他送我出窑洞，用手搭在我肩膀上，边走边问：“你多大岁数了？”我说30了。他说：“过几年就好了，到底还年轻啊！”这样关怀亲切的态度使我内心深觉温暖和感动。

1951年夏天，我由广西调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路过北京。毛泽东同志在百忙中接见我，留我吃饭。他生活仍很朴素，留人吃饭也就是他自己吃饭的两样菜，一碟辣椒，一碗汤，只是给客人增加一副碗筷而已。不过那天加了一瓶葡萄酒，他敬了我一杯，我也还敬他一杯。这次见面，先是谈论广西剿匪等工作问题，后来谈到广西省人民政府准备重修“镇南关”，以保存这一古迹，并请毛主席题写关名。他说：“仍叫镇南关，胡志明同志高兴不高兴？”我说：“那就请主席考虑另外起个名。”（以后改为睦南关，又改为友谊关，这是后话。）我在政治学院时，他也关心着我的工作，特别是在教学方针等重大原则上给我以指示。“文革”中，1970年12月毛泽东同志看到当时中央军委给中央的报告，说我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开除党籍、军籍，长期在农村“劳改”。他便批示：“莫文骅似乎不算坏人，由于不会团结人，所以得罪人不少。我不熟悉此人底细（按：指大革命时期的情况），因此，请军委处理。”于

是，林彪、“四人帮”不得不把我从敌我矛盾改为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同志在重要关头又一次保护和教育了我，使我免遭进一步的迫害。

上述我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些零星简短的接触，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但都感人至深，使我永远铭记在心，终生难忘。

走出祁连山

赵正洪

“隆冬时节，冰天雪地，堕指裂肤。我军指战员，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苦寒气候，长夜行军，真是艰苦至极。‘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巍巍祁连山的雪山冰峰，笼罩在朦胧月色中。硬如铁石的戈壁滩上，响着我军坚定不移的步伐，像一道钢铁洪流，滚滚向前。这些来自鄂豫皖边、川陕边和宁都暴动的英雄儿女，赤胆忠心，顽强不屈，目标只有一个：为了胜利，为了明天。任何饥饿、严寒、风暴、伤病、死亡的阴影，都吓不倒他们。”每当我读到徐向前元帅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这些描述西路军悲壮历程的章节时，总不禁热泪盈眶。往事历历，恍如隔世，近在眼前。我仿佛又听到了红军战士的喊杀声、枪炮声，仿佛又置身于浴血苦战之中。当年的战友，走出祁连山时，已百不余一（全部西路军共两万余人，到新疆时只剩下400余人），如今在世的就更少了。百战余生，许多战斗、战役已记不清楚了，但长征和西路军西征却记得十分清楚，长征和西路军西征中又以浴血河西走廊中的几场恶战印象更为深刻。现在，我尽力把当年

的一些情况写下来，以纪念早已长眠地下的战友，更使后人永远记住先行者的功绩。

一、倪家营子血战

西路军过了3次草地以后，在甘肃同一方面军的先遣部队会合。中央命令我们过黄河打通国际路线。

西路军由红军的3个军组成。四方面军的九军和三十军，一方面军的五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1936年10月26日，我们强渡黄河，遇到国民党马家军的部队。所谓“马家军”，即马步芳、马步青、马禄、马彪等指挥的回民部队。他们驻扎在甘肃、青海、宁夏一带，有正规军9个旅及一些直属团约3万余人，十几万地方部队。而我们西路军3个军才不过两万多兵力。敌人多是骑兵，我们是步兵。

刚过黄河，就在一座山上同马家军部队打起来。战斗打得很激烈，我们打了胜仗，消灭了不少敌人。这下激怒了马家军，他们尾追不舍，企图报复。

我们的部队当时没有后勤保障和供应，也无医院，困难很大。古人云：“兵马未到，粮草先行”，而我们是子弹打一颗少一颗，人员伤一个少一个。敌人知道我们红军无后方，是以战养战，以缴获武器来作战，所以，他们打仗前，只给士兵发10至20发子弹，以防被我们缴获。一次

战斗中，我们消灭敌人 1 个团，缴获 800 多支枪，子弹却很少。我们不仅要用缴获的子弹来消灭敌人，还要以敌人的俘虏来补充我们的兵员。因马家军部队是回民士兵，我们俘虏了他们几百人，由于宗教和民族的关系，工作难做，让他们当红军一个也不干。所以子弹、兵员都无法补充。

当时听上面讲，我们要继续前进，到永昌建立根据地；又说要向西进到新疆；又说要回黄河以东。我当时是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一营营长。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九军军长孙玉清、王树声（后兼），政委陈海松；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

我们两万多人同 20 多万敌人作战，杀来杀去，打来打去，慢慢进入河西走廊。战斗打得异常残酷。我们这个营过黄河时有 360 多人，每个连有 110 多人，营部有 30 多人，打到最后只剩下几十个人。就这样我们同敌人拼杀了五六个月，边走边打，一直打到倪家营子。

倪家营子南北长十六七里，东西宽三四里，是个人口密集、粮食较多的大自然村。全营子共有 43 个屯庄，地处平原，每个屯庄都有三四米的高墙，便于防守。我们第一次进驻倪家营子是在 1937 年 1 月。西路军 3 个军声势浩大，走到哪里，敌人围到哪里。第一次血战倪家营子时，我因打四十里铺负了伤，在西路军总部被“保存”起来了。当时干部伤亡极大（尤其是团、营干部），为了使部队保证不失去强有力的指挥，西路军采取了团、营干部（团长、营长、团政委、营政委）轮流，由一人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办

法。当时我和一些营团干部看到前方浴血苦战，积极要求上前线。为了安慰我们，徐向前总指挥亲自给我们做工作，他说：“现在部队伤亡太大，特别是干部伤亡太大。因此总部决定团、营干部只留一个人指挥部队作战，其余人在总部休息，准备再战，完成中央交给我们打通国际通道的任务！”

1937年2月26日，我军再次进驻倪家营子。整整3个军和总部都驻扎在倪家营子各个屯庄里。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也住在这里。此时的倪家营子由于马家军的破坏，只剩下断壁残垣，粮食非常缺乏。军部分配我营驻在倪家营子西北方向一个叫邵家屯的村子，有百十户人家，位于倪家营子的突出部，是西路军布防的最前哨之一。此时营干部只剩我一个人了。全营一进驻，马上抢修工事，挖枪眼，堵围墙，忙了一个晚上没合眼。第二天全营还接着修。9点钟，敌人就追上来把我们围住了。因为我们走了一天的路，敌人的骑兵用两个小时就能赶到。10点多钟，敌人向我们打枪。我上炮楼一看，四周都是敌人。我们马上加紧修筑工事。当时屯子里的水很缺，水井被敌人填了几口，经老百姓千求万求才给留了一口井。我们营到倪家营子时不到200人，几乎损失了一半。我们营的任务是坚守这个屯子。第二天夜里我们听到村外敌营中稀里哗啦乱响，天一亮才发现敌人把老百姓的箱子都搬来装上沙土筑成工事。敌人的工事离我们只有几百米远，他们的山炮离我们也只有二三百米远。敌人知道我们的情况，欺负我们人少，既

没炮，子弹也很少，所以把炮架到我们跟前。敌人的山炮向我们直放平射，他们装炮弹、开炮我们看得清清楚楚。这种情况在战斗中是少有的。他们4门炮一起打，把围子打倒了一片。炮轰停止后，敌人的骑兵下了马，几百个敌人向我们猛冲过来。他们又喊又叫一拥而来。在敌人距我们三四十米远的时候，我们就跳出去同敌人拼杀起来。真是一场血战啊！完全是白刃战。打枪没有子弹，敌人有枪也打不了。我们与敌人短兵相接，用大刀、钢叉，你砍我，我砍你，你刺我，我刺你，与敌人厮杀在一块儿，抱着打，揪着打。就是这样打呀，杀呀，杀伤敌人二三百人。

我们有个排长叫周福清，是河南人，个子高大。他当过冯玉祥的兵，大刀砍得很好，他杀了很多敌人，敌人见到他就跑不了。还有我们二连的副连长，非常勇敢顽强。俗话说：“一人舍命十人难挡”，我们的战士打退了敌人数次冲锋。过了一会儿，敌人又开始打炮，一打打开了几个缺口。敌炮一停，敌人又开始冲锋。我带领战士们一起冲了出去。我们跟敌人抱在一起厮打拼杀起来。有的把敌人耳朵咬掉了，有的抡起大刀把敌人的头砍掉了。完全是用刀砍，用枪扎。

我和敌人拼杀时，卡住一个敌人的脖子，他也想卡我的脖子。我和敌人抱着，刀也用不上，在地上滚在一起。滚来滚去，都不得手，最后同志们救了我。开始是营部通讯员赶到我身边，他看我和敌人拼得很激烈，束手无策，不知怎么做才能救我。用枪打吧，怕打着我；用刀砍吧，怕

砍到我。后来排长周长玉同志赶到了。他有经验，一看见敌人穿着皮靴，就一脚踩住敌人的皮靴，伸手就是一刀，扎在敌人腿上，敌人一声叫喊，松了手。我趁势起来，拾起一把大刀砍死了这个敌人。我们和敌人冲来冲去，杀来杀去，一天杀了八九次。

敌人打了一阵子就撤回去了。第二次又来，第三次又来。有一次敌人冲进来几十人，我们全力以赴拼杀，战斗很激烈。敌人向我们的炊事员冲过来，炊事员就用扁担打，用刀砍。最后没办法，就把一大锅战士一天没喝上的热稀饭往敌人脸上倒。冲进来的六七十个人，死伤在我们围子里的就有50多个。就这样同敌人打了一天，从上午7点钟一直打到午后4点多钟。黄昏后，敌人停止进攻，退回去了。

敌人有个特点，他们怕打夜战，到了黄昏前就收兵。这时我们就得赶快抓紧时间整理队伍，打扫战场。这次敌人在我们邵家屯阵地前死伤好几百人。我们也伤亡很大。天黑了，一天没吃饭，二连煮的一锅稀饭也没了，再也找不到水来做饭。敌人今天退了，明天还要上来的，所以就得赶快修筑工事。我们一边修工事，一边派人去打扫战场，主要是到敌人尸体中去收子弹。在几百个尸体中才收到1000来发子弹，一个尸体身上只能找到两三发，不象过去打国民党，抓一个俘虏身上都是几十发子弹。马家军这支军队就这样刁。收了300多支枪，根本无用，堆在一起放着。当时收到1000来发子弹是宝贝，拿到各连去分，一个人分几

颗。

围墙被敌人炮轰，破坏得很厉害，打了4个大缺口，怎么办？全营200多人，伤的那么多，牺牲了一部分同志，再修复工事困难重重。我心急火燎。正在着急之中，营部司务长吴振东同志想了个办法。他说：“哎，营长，敌人炮轰开的缺口，用敌人的尸体来堵。”他这一说，提醒了我，看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大家一起动手，把敌人尸体层层码在围墙缺口处。开始把尸体横着码，不行，堆不住。后来就直着码，一个挨一个放着，还是不行，又倒了。干着干着就有经验了，横竖重叠码，一个缺口放五六十具尸体，共抬来200多具尸体，把敌人打坏的几个缺口都堵上了。那时西北很冷，用土是堆不了的。这个办法很好，摆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敌人又开始向我们发起攻势。这次不单是对我们营，而是对我们全线进攻，把整个西路军包围了。团部派通讯员来讲，二营政委陈德仁带一个连来支援我们，有五六十人，因我们营伤亡很大。当晚，陈德仁到，继续跟敌人打。这一天敌人的进攻不那么凶了。当时敌人可能是一个旅，有两个团的兵力。这一天敌人冲了3次，都被我们统统打下去了。敌人死伤在我们阵地前的有四五百人。我们在倪家营子又与敌人打了一天。

倪家营子血战，在我的记忆里是西路军打得最惨烈的一仗。我营指战员抱着决不后撤一步、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与敌人殊死搏斗。子弹打光了，就靠与敌人白刃死拼。

大家都明白，阵地一失守敌人就会冲进来，后方的师部、军部、西路军总部就会受到极大威胁，因此，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战斗！

最后，“经七昼夜血战，待援无望，军政委员会一致决定再次突围，沿祁连山向东转移。”^① 我们商定让陈德仁那个连在后面，我们一个连在前面。我们全营集中后，清点人数，只剩下28人，牺牲88人，重伤60多人。突围出去后，只有26人没受伤，大部分是炊事员。集中起来后，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重伤员每人一支枪，一个手榴弹，带在身上，敌人来了与敌人同归于尽。就这样与敌人拼杀了3天。后来中央决定，命令我们整个西路军突围。伤员真惨呀！有的打了眼睛，有的被啃掉耳朵，胳膊、腿受伤的都缠着绷带。他们拄着拐杖走，走又走不快，跑又跑不动，但也得向外突围呀！想起当时情景真让人落泪。

剩余的人跟大部队从倪家营子突围出来以后，为了摆脱敌人，又连翻几座山沟，于1937年3月13日晨，抵达离康隆寺40里的石窝一带。

我们用尽全力，刚跑到石窝，马家军四五个骑兵旅就追上来了。敌人来势凶猛，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分几路向我们阵地猛扑过来。我们便与敌人拼杀。这时西路军的人数已经不多了，一个团只有二三百人。特别是石窝战斗前两天，在黎园口、康马寺打了几仗，指战员既无吃的，也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546页。

无喝的，疲惫不堪。

我营和全团迅速抢占了后面的山峰，决心拼死也要守住这个山头，这是全军的退路。我们同时要保护西路军总部首长和机关上山。我们在山头上看到兄弟部队与敌人厮杀拼命，打得激烈残酷，一个个被砍倒在地。当时我真想带全营几十名战士冲上去，与兄弟部队一道打击敌人。但守山峰也很重要，又无冲锋命令，只有干着急，我把眼睛都急红了。

经过一天的激烈厮杀，到黄昏时，我们的战士拼杀得差不多了。到夜晚总部召集师以上干部会，全军就只有三四千人了。陈昌浩政委讲，他要与徐向前总指挥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去，其余部队组织两个支队。一个支队由王树声、朱良才率领，打游击。另一个支队由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率领，成立西路军委员会，由7人组成：李卓然任书记，李先念负责军事指挥，委员有程世才、黄超、黄火青、李特、李天焕。

后接中央指示，让我们经祁连山到新疆。

二、找 粮 食

西路军这个支队千余人在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的率领下，从石窝冲出后，进入了祁连山。没有敌人尾随了，又遇上了新的困难——整个部队缺吃少穿。我们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爬雪山，走戈壁。狂风骤起，飞沙走石，天

昏地暗。我们在冰天雪地里沿着祁连山西走。开始我们翻山越岭钻山沟时，还能用现大洋向牧民买到牛羊肉和青稞豆等食物充饥。后来敌人不尾追了，下令封山，把老百姓都赶走了，想把我们困死、饿死在祁连山里。

我们接连几天找不到一个向导，只能靠指南针辨别方向。三四月份祁连山仍是大雪覆盖，寒冷和饥饿严重威胁着我们。取暖的柴禾都很难找到。整个部队3天多没吃东西，实在走不动了，军部只好下令杀骑兵连的战马充饥。开始我们营两百来人杀1匹马能吃1天。虽然我们吃的很节省，但我们骑兵连只有几十匹马，后来只好两天吃1匹，3天吃1匹。在行军的时候，我们的战士经常前看看后看看，担心地说：我们骑兵连还有没有马啦？

在山里大约走了30多天，我们骑兵连的马和所有团、营级干部的马都陆续杀光吃掉了，再无马可杀了。有的战士啃冰块，吃雪团，饥饿威胁着每一个人。行军时大家互助拉着前进。有的同志走着走着就昏倒在地。部队实在走不动了，无法前进时，军部就下命令，就地宿营。我们找到了一块比较干的地方扎下营盘，看到有很多牛羊粪，还能看见稀稀疏疏的树枝，于是捡来烤烤火，取取暖。

在我们全营饥饿难忍时，二营政委陈德仁牵着一头骆驼向我们的火堆走来。他大声喊道：“老赵，我营还有两头骆驼，大家叫我给你营送来一头。你们营两三天什么也没吃，怎么能行呢。要走我们一起走，要饿死我们一块饿死。赶快把骆驼杀了，趁今晚有火，让战士们吃点吧。”

当时，我和营政委周纯麟同志都说不能要。他就发火了：“你们还有那么多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呢！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而是全营的活命大事。”

真是雪中送炭。这头骆驼帮助我们全营度过了饥荒，把我们从死亡线上拉回到生路上来。我们节省再节省，全营吃了3天多。

我军继续向前行，部队仍是饥饿难忍，每前进一步都要克服巨大的困难。这时，上级决定部队就地休息。我被叫到军部，李先念政委对我说：“赵正洪同志，现在部队又有两天没吃东西了，不能行动了。你带两个连出去想办法找点吃的。找一找附近有没有牧场，弄些牛羊回来。”又说：“我们部队经过艰苦行军走到这里来了，我们和中央已经联系上了，要到新疆去，也不远了。前途是光明的。”

我接受了这个关系到整个部队生死存亡的艰巨任务回到营部，找到营政委周纯麟同志一起商量如何去完成。我们决定由七连和九连各抽三四十个身体强壮的战士去，同时立即向连级干部传达军首长的指示精神，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和存在的困难。结果两个连共抽出百十来人。经过大家讨论决定，往山上去，分3路并进。天已黄昏了，谁知道哪里有牛羊呢？七连排长王民友同志说，我们上到大山上去看，哪里有火哪里就有牧场。哪里火大，哪里牧场就大，牛羊就多。这是个好主意。于是我们决定哪个山沟有火，就发放规定信号。正在讨论的时候，团长、政委来了，又向我们作了动员，并嘱咐我们把互助组搞好，大家要互

相帮助，努力完成这个艰巨任务。

我们每5人编为一个互助组，明确了信号：发现牛羊群就用机枪打3发子弹。下午，我们分3路出发，往山上爬去。为了便于指挥，左右各一路，我在中间这一路。

我手中有手电筒，就用手电向两边照。爬上第一个山坡没发现有火光，下到山谷，又接着爬第二个山头。爬上去一看还是没有，又接着爬第三个山峰。到半山腰，战士们精疲力尽，实在走不动了，每迈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力气。营部通讯员对我说：“我口袋里有点盐，营长你吃点吧。”我抓了几粒盐吃了，又抓了几把雪吃了。嘿，真管用，不一会儿就觉得有点精神。我就让通讯员把盐送给卫生员，看哪个体弱走不动了，就给他几粒盐吃。这点盐还真解决问题。我们继续往上爬。爬着爬着，有个战士实在支持不住了，说了声“营长我不行了，实在走不动了。”往下一坐就再也起不来了。我们知道，同志们都在受饿，等着我们找回吃的东西，我们强打精神继续往山上爬。大概到了下半夜，发现前面山沟里有火堆。我发现了，七连也发现了。我怕他们打枪，所以我就用手电筒使劲向左右摇晃。因为我在中间，就向他们发信号，指挥着大家往山下冲。不知道哪里来的劲，我们就象增加了两条腿，一股劲儿就冲下去了。我们发现这个牧场有不少羊。在我们往下冲的时候，牧场的人发现了我们，向我们打枪，看样子有几十支枪。我们一接近牧场，就打开了。他们怎么能打过我们呢？我们的机关枪一响，他们就吓跑了。到了五更天，我们就到牧

场了，看见一大群羊，还有百十匹马，有 20 多个蒙古包。我们进了蒙古包一看，里面很漂亮。有一个蒙古包地上铺着地毯，还有缝纫机和其它一些衣物。那时我们只要两样东西，一是食盐，二是吃的东西。我派了两个通讯员立即回去向军部报告。我们吃了点东西后，天就亮了。在搜查中，发现有两袋面、一袋米。马都跑了，但在马棚附近发现有 3 匹马拴在那里，上边还有马鞍子。再一看在马棚里关着 3 个人，手脚都被捆着。我们一问情况，一个是蒙古人，是小牧主，是这个牧场的佃户，交租没交够，被抓来了。另两个是奴隶，是给牧主放羊、干杂活的。可能是放羊时丢了羊，被牧主捆起来了。问明情况之后，我们给他们松了绑。我说：“把他们放了吧。”连长说：“营长，不能让他们走。他们是放羊的，会赶羊。他们一走，我们是赶不动这群羊的。羊一跑散，就坏事。”我说：“好，留下他们 3 人。”并让他们 3 人给我们赶羊。一群羊有四五百只，还有两袋面粉、一点大米和食盐，捆起来放在马背上。

我们出发前，我们经理部（现在叫后勤）受军首长指示给了我 100 块大洋（银元），我们弄到东西后，就写了张条子放在东西主人的家里。条子写道：“我红军过路，买了你们一些羊，现留大洋 100 元钱，可能不太够，请你原谅。”我把条子和银元都放在桌上。又转念一想，这家人是个“富业”（即地主），我们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嘛，怎么能给他留钱呢？又把条子和钱收起来了。我叫战士带那 3 个放羊的人把羊赶出圈。那里有两群羊，每一群有几百只。赶多

了也无用，所以我们只赶了一群。我们牵着 3 匹马，带了一些粮食要走，大批羊都出了羊圈，可是有七八只羊就是不动。怎么回事？我们进去一看，原来是七八个妇女披着羊皮蹲在那里。我们把她们叫出来，向她们宣传红军的政策，然后就让她们回蒙古包去了。

因为牧主有几十支枪，我们做了他们追来的准备。我们赶着羊群顺着山沟走。这群羊很老实，牧主也没来追。第二天快接近部队休息的地方，我便骑着马快跑，赶到部队驻地一看，部队已经走了。我就赶紧追，一面追一面喊：“去找粮的回来了！去找粮的回来了！”

追上部队找到李先念政委，并向军部首长作了报告。原来军部首长并没有见到我派回去送信的两个通讯员，等到下午 1 点多钟，感到不能坐着等死，所以部队就出发了。见到我们回来了，李先念高兴地下命令：就地宿营。部队听说弄回吃的，那高兴劲甭提了。大家问这问那。李先念把我表扬了一番，说：“你们弄回来救命粮，救了部队，救了战士，把部队从死亡线上拉回到生命线上。”正在高兴之际，后面部队赶着羊上来了。听到羊群“咩、咩”的叫声，大家都眉开眼笑。我把弄来的两袋面、一袋大米分给军首长一半，剩下的分给团部和各营部。赶羊的 3 个人当天没让他们走，怕他们走漏消息，让他们帮着杀羊一块吃。等我们出发才放他们走，给了他们每人 10 个银元。

还剩下 100 只羊，让几个干部轮流看着。有一个干部夜间值班睡着了，结果这 100 多只羊都跑掉了。大家知道

后，都很气愤。军部首长也很生气。大家围上去要枪毙他。最后，李卓然主任说：“羊也跑了，枪毙一个人，也找不回来羊。人是宝贵的，算了吧。”

第二天，我们继续向新疆方向前进。

三、西路军的最后一战

在饥寒交迫中，部队整整走了45天，才跨出了祁连山西路。我们终于在4月中旬到达甘肃西北边境的黄菇台村，距安西县约有20多里。

这时，西路军左支队由原来的千余人减少到800多人。部队很久没有好好休息了。不要说住在房子里，就是房子也许久未见到了。部队住进了房子，大家情绪高涨起来。

据了解，当时安西县城里只有200多个民团团丁，我们有800多人，军部决定攻打县城，补充些粮食，为部队继续行军作战增加必要的给养。并决定我们营担任主攻。我们分析，当时敌我双方力量之比是1：3，能攻进去。晚上9点钟，开始攻城。

我们的人爬上城墙和敌人一接触，敌人的重机枪、轻机关枪、迫击炮一起开了火。我当时判断，城里200来个团丁不会有机枪、迫击炮，敌人一定是增加兵力了。我们在几次冲锋中伤亡了几十个人。

因为敌人增加了兵力，拂晓时，军部来了命令，部队后撤。我们一撤，敌人就追上来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我

们部队到安西的时候，敌人增加了1个骑兵旅，两三千人。这是马步芳的主力“黑马骑兵旅”，完全是黑马，是很能打的部队。这时，我们就依靠村落围墙、石头做掩体，边打边撤。拼杀了几次，整整打了一天。当我们撤到城东南靠新疆方向几十里地的白土屯时，敌人又追上来了。军部命令我们坚守。

我们组织部队利用土坎子、围墙和房子做为工事和屏障，与敌人一次次地拼杀。我们用大刀、钢叉、手榴弹，与敌人反复冲杀，战斗很激烈。我们营200多人已经伤亡不少。团政治处钟主任也牺牲在我们的阵地上。持续到黄昏，完成了阻击任务，部队才突围。我们一夜跑了90里，第二天早晨到达百墩子。敌人骑兵又追上来了。

这时，有一支敌人骑兵向军部首长冲去，我们全力拼死命阻击敌人。敌人往哪里冲，我们就往哪里堵。我们对敌人猛打猛杀，有子弹就用枪，没子弹就用刀。

敌人开始是骑着马和我们打，我们专门打他的马。后来敌人就下马攻我们的山头，他们一边冲一边哇啦哇啦叫喊，气势汹汹。我们怀着对敌人的仇恨，不管你怎么叫，我们趴在阵地上不动。当敌人冲到我们跟前，离我们十来步远的时候，突然站起来向敌人猛扑过去，用大刀、钢叉、木棍跟敌人进行肉搏战，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补充上来，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夜间与敌人混战更为残酷，你抱我，我抱你，双方滚在一起，我们的战士都是好样的，个个英勇顽强。我与敌

人抱着搏斗十几次，用手扼死了几个敌人。战斗到最后，双方都有很大的伤亡。我们一个连只剩下七八个人，七连副连长侯韶中、指导员黄方权都牺牲了。阵地上的尸体，有被砍掉耳朵的，被砍掉膀子的，被砍掉鼻子的，也有没有脑袋的。真是一场恶战。

我们完成了掩护军部首长撤退的任务后，部队突围。我在突围的时候，背上被敌人砍了两刀，因为我身上穿的是前不久宿营时在草堆里发现的一件国民党的军棉衣，没砍透。我和敌人又抱在一起滚打起来。营部小号兵赶来，用枪托一下把敌人的脑袋砸碎了。那时年轻，我很有劲，接连又和敌人肉搏格斗3次。最后和我一起冲出来的只有20多个人，其中有七连副连长吴占海、九连指导员邵吉祥和侯少吉等。

我们营突围出来以后，到红柳园时只有小号兵叶英和通讯员王小山跟着我。我们3人都受了伤。路上，叶英因伤势过重，走不动了。当时红军有个规定，负伤的同志在当地留下，轻伤的每人发给3块钱，重伤发给5块钱。当时我身上有五六块钱，都给了他。我让他沿着电线杆子慢慢往前走，我就带着通讯员沿着电线杆子跑，整跑了一夜。天亮时，渐渐靠近新疆了。

到了离新疆50里之内的地方，敌人就不敢来了，他们跟盛世才有矛盾。当时盛世才搞投机，和苏联关系较好。

四、到达新疆

到达新疆之前，在马连井子我一查，我们营里就剩下几个人了。一个连长陈福海，一个指导员侯少吉，三个战士王崇国、张太升、何明德。就在这个村子，我见到了我们团长杨秀坤、政委刘庆南，还有我们营政委周纯麟、一营营长郑玉良等几十个人。当时我们又饥又渴，就用身上背的一点粮食做了些面汤，大家吃了一点儿，然后继续往前走。路上又遇到一些人，如译电员、炊事员、公务员、参谋、干事等。

在离星星峡不远的地方，新疆驻星星峡边防部队发现了我们。我们这些人衣衫褴褛，有的骑马，有的骑骆驼，有的骑毛驴，有的骑骡子，实在不像一支部队。他们警惕起来，全部进入工事。因为离得近，我们看得很清楚，于是停止了前进，团长杨秀坤派人前去联系。团参谋长饶子建、一营政委陈德仁和我骑马去了。我们3人边跑边喊：“我们是朱毛红军！我们是朱毛红军！”此时新疆方面已接到莫斯科的指示，派了一个办事处主任王孝典（后来才知道此人是共产党员）住在星星峡。一听说是红军，他们就下来热情地和我们一一握手。我们高兴地向后面的部队又喊又招手，让他们上来。后面的人上来后，他们把我们让到屋里坐下，同时向他们领导做了汇报。办事处主任王孝典对我们很热情，问我们谁是负责人。我们介绍了团长杨秀坤、参

谋长饶子建。他们赶快向迪化（现乌鲁木齐）方面做了报告。当时陈云和滕代远代表党中央从苏联途经新疆边境到了迪化。第二天团长派一营政委陈德仁和我，还有另外几个人到后面去找其余的部队。

后面的部队又陆续来了一些人。当时我们枪支不多，子弹也用光了，盛世才派飞机给我们运来了粮食、枪支、弹药。部队到了三四天之后，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等军首长才到。原来敌人追他们的时候，他们跑到沙漠里出不来了，几天没喝水没吃上饭。我们用缴来的一辆汽车把他们接了回来。然后又用这辆汽车去收容掉队的伤病员。

红军前前后后来到星星峡。原来是一千五六百人，到安西时剩下七八百人，现在只剩下四五百人了。现有的人编成了三个大队，一大队长简佐国，政委周纯麟；我是二大队长，政委陈德仁。5月1日，陈云、滕代远同志代表党中央到星星峡来接我们，对我们十分关心，想得很周到，开来了几十辆汽车，穿的用的都带来了。我们换上了新军装，心里特别高兴，激动得流下了热泪。从苏联回来的冯铨、段子俊、李春田同志看到我们换下的衣服，对我说：“你们的部队穿得这样破破烂烂的，太艰难了，太苦了。我们建议把你们的破烂衣服送些到莫斯科军事博物馆展览，请苏联人民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看看中国工农红军是在多么艰难困苦地战斗。”陈云同志给我们讲了话，他说：“同志们，你们太辛苦了！你们经过千辛万苦走过来了。现在有你们几百人，将来就不愁有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将来革

命一定胜利。”之后，他又讲了形势。

陈云同志讲完话，我们编完队就开始上汽车到迪化去。出发前告诉我们，汽车遇到城市要绕着走，不准进城，这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

我们到迪化后，在名义上编为盛世才部队的新兵营，对外管我们叫新兵营。我们不准外出，不能暴露身份。盛世才是辽宁人，对外说我们是东北招来的新兵。

住下后我们一边休息，一边学习文化和技术。到这里后，生活很好，吃的是白面、牛羊肉。陈云同志讲得很明确，中央非常关怀我们这支部队，原打算叫我们去莫斯科学习，但由于苏德战争打起来了，就决定不去了，留在新疆学习。有两个大队学习坦克和汽车，先学开车，然后学开坦克。一个大队学习炮兵。从各大队选身强力壮的90人学飞行和地勤。

在学习文化技术时，陈云同志对我们十分关心。他亲自教我们学习文化。在学习写毛笔字时，陈去同志隔一天来检查一次。毛笔字写得好的，就划红圈，写得不好的，就打“×”。他常给我们讲形势，讲科学知识，讲故事。他把讲故事叫作“吹牛皮”。有时来到大队部就喊：“赵正洪、陈德仁，叫干部来我们吹吹牛皮。”我们干部战士都很喜欢听他讲历史故事，实际上他是从各方面来教育我们这支部队。

1937年12月，党中央来命令调一部分干部回延安，到抗日前线去。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三十军军长程世才、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团长

杨秀坤、营级干部陈德仁、简佐国和我都跟随中央副代表滕代远乘坐苏联飞机回延安。

我们到达延安后，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和我们4个团营干部都到中央党校学习。这也是我当红军以来第一次进正规学校。1938年毕业后，我和杨秀坤、陈德仁被分配到抗日前线的冀中军区打日本鬼子去了。

回首当年，感慨万千。如今我国已经成了一个日益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西路军的这段艰苦卓绝的历史将昭示后人：胜利来之不易，未来仍需努力！

抗战时期在皖南

李一氓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开始了。国民党把散在江南各省的红军游击队的编制和防区，当成一个问题向我们提了出来。我们只想把它变成当地的保安团队，国民党则坚持要把这些红军游击队集中起来，调离本地。因此，就有编一个新四军的说法，又有要叶挺当军长的说法。

1937年10月底叶挺到了延安，11月初项英也到了延安，可能都是涉及到江南游击队的事情。他们两人在延安的时候，我没有去看他们，因为这件事情同我没有关系。他们走后，李富春才把我找去说，江南游击队准备编为新四军，由叶挺当军长，项英当政治委员性质的副军长。叶挺临离开延安时，向中央要求派几个与他在大革命时期熟悉的干部去新四军工作。他曾点名要周士第去当参谋长，他们都是广东人，都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都经过南昌起义，但中央没有考虑。另派了张云逸（广东人）去当参谋长，周子昆（广西人）去当副参谋长。周是叶挺当独立团团团长时独立团里的一个排长，后来当连长、营长。冯达飞，

广东人，是黄埔一期学生，也被派到新四军工作。还有我去当秘书长。武汉时期，我们都同在一个军队党组织。李富春还提了一个问题，因为项英、叶挺我都熟悉，要我作为他们之间的缓冲人。当时我听了也没有什么大的反应，但后来真正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了。

我们在延安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中央为新四军配备了一些中级干部。军事工作人员由赖传珠带队先走，约30人左右。政治工作人员由我带队后走，约30人左右。1938年1月，我们从延安到西安，从西安到汉口。安顿了一下，根据武汉办事处的要求，这批干部先送南昌。于是又从武汉到九江，由九江到南昌。在武汉我见到一些长久不见面的朋友和同志，如郭沫若、潘汉年、梅龚彬等，也见到由四川到武汉的韩伯诚，当然也见到了叶挺。在我们到武汉以前，新四军军部已在汉口大和街26号正式成立，挂有军部的牌子。新四军的战斗序列属第三战区，因此军部第一步由武汉移南昌，准备第二步由南昌移安徽歙县的岩寺。南昌军部设在南昌的三眼井1号，那是北洋军阀时期著名军阀张勋的私宅。军部移至岩寺以后，就把它当作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了。

新四军的作战区是在皖南，面对长江和京沪线的左侧面，所以军司令部也设在皖南。1938年4月5日，军部从南昌搬到安徽歙县的岩寺。

岩寺是歙县的一个大市镇；明朝李日华的《礼白岳记》就曾记了一条：“十里至岩市镇。街衢纵横，车毂凑集，

聚落之雄胜者，以礼岳，故不敢迟徊流览。入一小肆中午餐，几案楚楚，薰炉砚屏若苏人位置。壁有文太史画一帧，题句云：秋色点霜催木叶，清江照影落扶疏。高人自爱扁舟稳，闲弄长竿不钓鱼。长洲文璧。”一个酒店居然挂上文征明的山水，可见崇祯年间这个地方商业是很繁荣的。查弘治本《徽州府志》卷二地理部分，即有岩寺镇之名，是宋代设官收酒税的地方，李日华把“寺”念为“市”是错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了全军的集结和整编工作。任务完成以后，5月初又搬到太平，住了将近一个月，国民党不答应，认为那个地方太靠近大路。最后，6月中旬进驻泾县章家渡以北的云岭。军部在这里一直住了两年半的时间，到皖南事变前夕为止。云岭是一个小山村，周围有同样规模的村庄，如罗里村驻军部，丁家山驻东南局，章家渡驻总兵站，新村驻战地服务团，汤村驻政治部，肖村驻军医处，还有陈家祠堂、南堡村等地方，也驻有新四军的部队。

皖南这个地方明清之间是雕刻、印刷出版业比较集中的地方，其中又以徽州为最。同时，由于山上的古松树很多，所以用松烟制墨的手工业也很发达，集中在休宁和歙县，这就是有名的徽墨。宣城还出产有名的宣纸，泼墨作画，挥笔写书，唯此纸最佳。同时徽州商人还经营茶叶、食盐。这些商业资本，又在各地经营典当业，进行高利贷盘剥，所以徽商在全国的商业市场上是很有名的。

皖南多山，满山都是很高大的松树，但不值钱，可能是战争的原因，100块钱就可以包一座山。部队就是这样包

山取得炊事燃料的。但要砍成烧柴，颇不容易，还得花 100 块钱包给农民。他们把树全部砍倒，树枝锯掉，这些树枝就无偿归属他们了。然后把树干锯成两尺长一段，再劈成木柴，很整齐地码在山上。这个过程的劳动量是很大的。部队还得自己上山去运回营地。都是些上百年的松树了，木质很好，现在想起来，也就算是不可避免的浪费了。

青弋江流经皖南，到芜湖入长江。水产丰富，物价也很便宜。鱼很新鲜，不过一角钱一斤。叶挺曾经花 10 块钱，买了 100 斤鱼，慰劳教导队的学生，大受欢迎。

皖南产茶，主要是绿茶，也有人做花茶。从军部到太平，不论是乘竹筏或步行，一般都经麻岭坑小河口。到太平前大多在铜山的山门歇脚。那里有一位刘敬之老先生，拥有大片茶园、林场，在屯溪、芜湖等地设有茶庄，在山门自置一座陈设讲究的庄院。他对我军友好，是一位开明士绅。从军部到太平路上，军部人员来往经过，都在刘家吃饭、休息，有时还在他家借宿。刘家从不收取我们的钱粮报酬，完全无代价供给。1939 年 2 月下旬，周恩来一行到军部。3 月 14 日从章家渡返回，途中曾在刘家用餐、休息。周恩来见过刘家父子，还题了词送给他们。刘老先生送他的儿子刘寅参加新四军，刘寅在皖南事变后，长期在苏中、苏北工作，现离休在南京。我因公离开军部外出，或从外面回到军部，都要经过他的庄园门口，都在他那里休息和吃午饭。这个庄园，三面是茶山，出门隔一条大路就是青弋江。客厅很堂皇，家俱非常雅致，墙上有些字画，阶前

还有盆栽的花草。看起来不单是地主兼资本家的住宅，还带有书香门第的味道。刘家所供给的午饭，菜很丰富，味道也很好，临时能做到这样也很不容易了。皖南事变当中，我们从阵地上跑出来，曾设想过先到刘家，看看他有什么办法。但随即听说国民党军队曾到他家里搜查过，所以最后我们还是没有去。1958年泾县在陈村建陈村水电站，中间曾停建、续建，1975年全部建成。水电站就在陈村以南拦河筑坝，坝高76米，长419米，上游成为太平湖，山门和更上游的小河口（新四军后方）都被淹了，刘家那座清雅建筑也被淹没在湖底了。

从岩寺到太平要经过黄山脚下，可那个时候没有游山的雅兴，也没有登山的时间。我同邓子恢两人曾经过黄山脚下，从汤口进山，在中国旅行社的招待所住了两晚上，除了洗温泉之外，没有上山。

皖南的山水景色优美，黄山是很有名的了，还有九华山、齐云山。从地区来讲，宣城、广德、旌德、绩溪都有山水名胜。春天满山的杜鹃，秋天都是红叶的乌桕，松林很密，山径弯窄，当然还有一些小桥流水，看来是很好的风景。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优美的地区，1941年我们万般无奈，被迫地把它作为战场，攻不能前，退又无据，只落得一个全军覆灭的悲惨结局，至今想起来，还是一件恨事。

新四军是由南方各游击区的红色游击队组合起来的。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进行长征，留下来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就地坚持斗争。这些游击队分布在江西、福

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 8 个省 15 个地区。跨省界的有 8 个游击区，为赣粤游击区、闽赣游击区、闽粤游击区、皖浙赣游击区、湘鄂赣游击区、湘赣游击区、鄂豫皖游击区、鄂豫游击区。不跨省的独立游击区共 7 个，为闽西游击区、闽北游击区、闽东游击区、闽中游击区、浙南游击区、湘南游击区、琼崖游击区。各游击区的红色游击队集合起来，组成了新四军。长江以南的编成了三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包含湘鄂赣傅秋涛部队和浙赣、湘赣各部队；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包含闽西、闽南、闽赣各部队；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包含闽东、闽北和闽北黄道的部队；长江以北编成一个支队，即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包含鄂豫皖高敬亭部队、鄂豫周骏鸣部队。湘南李林、刘厚总两部约 300 人编为军部特务营。刘厚总的游击习气很浓，部队改编时曾把他调出来拟送到延安学习，他到了武汉就不愿走，甚至要求回家，武汉办事处无法，又把他送回军部。皖南事变时他谋害项英，而当时项英却认为刘那点游击习气正对他有好处，所以就出毛病了。

新四军跟八路军的兵力构成大不相同。八路军是由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的正规部队组成的。主要成份是来源于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的农民，这些农民不但抗日坚决，而且经得起大的战斗。这一点八路军比新四军强。新四军装备差、新兵多、游击习气浓厚，抗日战争的政治军事思想准备不够。其次，抗战一开始，由

于国内政治生活的要求，新四军从上海、江苏、浙江吸收了上千的男女青年知识分子，从文化水平的构成来看，八路军就不如新四军了。八路军知识分子主要来自当时的北平，但为数不多。

新四军的领导机构——军部，主要领导干部是从延安派来的，勉强可以组织成一个参谋处及后勤部、政治部的一部分。因此形成了这么一种情况：由个人介绍来的干部较多。如医务处的医务人员全是由叶挺介绍来的，没有一个党员，当然业务水平比较高。延安派来的一个医务人员戴济民，业务水平不高，年纪比较大，只能负责教导队的医务工作。不过这些医务人员后来有很大发展，全国解放后，在医务行政部门、医务教育部门、解放军医院里，都担任了领导工作，全都入了党。新四军军医处的吴之理医师，在抗美援朝时成为志愿军的卫生部长，他对近代战争的战地救护工作有着很丰富的指挥和组织经验。新四军军部的副官处成员也是叶挺介绍的，有的还是他的亲戚。后勤部门，包含兵站，有叶挺的叔伯兄弟，还有上海煤业救护队的主要工作人员，延安来的同志如宋裕和等，实际上占少数。政治部的宣传部、组织部、民运部、保卫部的负责同志，如李子芳，朱镜我等倒都是党员。敌工部长是由叶挺介绍的，任用林植夫当部长。说来奇怪，林植夫是国家主义派《孤军》的总编辑，在国家主义派里面是极为反共的，但他参加了1933年的“福建事变”。因他是日本留学生，日文不错，由于叶挺的介绍，而他本人又愿意参加

新四军对敌宣传工作，于是参加了新四军。1941年皖南事变时，他被国民党俘虏，1945年日本投降他才被释放。后来他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解放后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又是福建省政协副主席。

从上面情况看，八路军和新四军指挥机构有很大的不同。开始时，应该说统一战线的色彩是比较浓厚的。当然经过抗日战争的整个过程，把这批同志锻炼得甚为成熟了，其世界观发生了显著变化，从爱国主义思想发展到共产主义思想，并且都入了党。

军部在南昌时，正是上海煤业救护队由上海战场撤退到南昌的时候。这个救护队，是上海煤业工会组织的战地救护队。开始的目的是支持在上海作战的国民党部队。等到上海一放弃，它也跟着国民党部队西撤，先到金华，后到南昌。为着工作方便，他们又在煤业救护队前加上一个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意在标明自己是中国红十字会领导的一个上海煤业工会的救护组织。他们到南昌后，知道新四军成立了，这个组织里面有的同志就想把救护队归属新四军，为新四军服务。但当时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也看上了他们的几十辆汽车，想把他们划归江西省政府管辖。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后，就找了他们的负责人叶进明，这是个老党员，但那时还没有党的关系。通过他居然说服了全队，摆脱了熊式辉，跟新四军合作。那时叶挺、项英都在南昌，由他们两个人出面，请他们吃了一次饭，并且讲了些抗日道理来争取他们。

上海大小煤炭业的经营店主都是宁波人，因此这个救护队的成员，自然就都是些宁波人。但他们于抗战开始后，在上海、浙江进行工作的时候，吸收了一些上海、浙江的青年来参加工作，因此其成员到后来也不完全是宁波人。全队总数约一百二三十人，其车辆都是当时上海煤店营业的运输车辆捐凑成的。自从这个救护队归属新四军以后，首先利用这些车辆，从福建、江西、浙江把参加新四军的红军游击队接运到安徽的岩寺集中；以便进行整编。利用这些车辆，我们建立了浙江温州到安徽太平的兵站线，太平到军部没有公路，是不通车的。在兵站的建设上，除了一个延安来的同志当站长外，其它工作都由他们负责了。

其实他们对于新四军建设贡献最大的还是筹建了一个印刷所。设备最完整的时候，有全套的铜模，有一二三号的轮盘机三台，有四开机一台，石印机一台，甚至还有打纸板和胶板的全套设备。排字、铸字、刻字、印刷、装订、校对这些工种都是完备的。它承担的任务主要是印《抗敌报》三日刊。这是一张八开报，后来又增加成两张。“抗敌报”三个字是请周恩来写的。这个印刷机构，名为战地文化服务社，除了印《抗敌报》外，还印《抗敌》半月刊，这是政治部宣传部编辑的一种综合性刊物；还印《理论与实践》，全是翻译涉及联共党史、马列主义的文章；还印《学习》半月刊，这也是政治部编辑的指导政治工作的刊物；还印《战地青年》，这是东南局青年部与政治部合编的；还印《抗敌画报》，这是在新四军工作的一批画家和木刻家共同

编辑的，也是政治部宣传部的刊物；还印一个《建军》季刊，是军部自己编辑的。无论写稿和译稿都是利用延安的材料重新编的。当时正是学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的热潮时期，因此印刷所还印过《联共（布）党史》及一些马列主义理论和文艺方面的小册子。不过《抗敌报》的影响最大，在那么一个农村地区能发行好几百份。它主要宣传八路军在华北的胜利和新四军在江南的胜利。后来纸张用量大，从上海买报纸不容易，我们就利用本地出的竹纸。但是需把纸幅的宽窄、纸张的厚薄加以改善，使它适合印书报。这不但降低了成本，同时还支持了皖南山区特有的手工造纸业。煤业救护队的叶进明当印刷所所长，忻元锡当副所长。

我同救护队从南昌开始就有接触。救护队列入新四军的编制后，除了兵站系统以外，他们的成员，特别是年轻的，都送到教导队学习半年，然后分配到军部的其它单位工作，以到政治部的人为最多，也有少数人调到东南局，这时他们大多数都已经入党了。他们几个负责人如叶进明、忻元锡、陈昌吉，有什么事都来找我。因为我对办印刷所的兴趣很大，也就找他们一起想方设法把印刷所办起来。他们来往于上海和皖南之间，对这个工作出的力量最大，也最有成绩。后来印刷所只有陈昌吉一个人负责，他当所长，我们又调黄源去当副所长。

《抗敌报》是政治部为了搞好对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对群众的政治宣传而创办的。开始印刷条件不具备，出的是油

印报。后来在屯溪弄到了几台石印机，就出石印报，还是不定期。大概在1938年底，才从上海弄来铅印机，改出铅印报。因为印制条件不好，开始出的是五日刊，后来器材、人员、技术条件都有所改善，就正式改出三日刊了。现查1939年6月的《抗敌报》还是五日刊，那么出三日刊可能是1939年下半年的事了。这个报一直出到1940年底皖南事变的前夕，它无论在新四军当中，还是在安徽、江西、江苏新四军力量所及的群众当中，都有很大的影响。它报道了欧战中苏联红军的胜利、华北八路军抗战的胜利，对新四军的各个支队对敌作战的胜利，更做了详细的报道。对全国的群众运动、统一战线的发展，也作了同等重要的报道。政治部的宣传部长朱镜我主管报纸，对于它的编辑、设计，特别是一些社论、专刊、署名文章的组织安排，都费了很大的力气。

我对于这个报纸也很感兴趣，有时也在报纸上发点议论。现在这个报纸无论南京、合肥，都找不全了。据我所知，现在安徽博物馆藏有《抗敌报》8期，其中有1期是1939年的，有7期是1940年5月的。安徽省档案馆藏有96期，其中1939年5月——12月的共约20期，其它都是1940年各月份的，共约70多期，最迟的到12月13日（第214期），已经是皖南事变前夕了。《抗敌报》的总期数大概接近220期，现在保存下来的不过是一半罢了。

我记得当时给报纸写了好几篇东西，如今只找到四篇。第一篇文章是1939年10月11日为纪念新四军成立两周

年而写的。就在这时候，欧洲战场发生了重要的战局变化，希特勒进军波兰，同时苏联也命令红军进占波兰的东部。当时在新四军中对苏联进军波兰有一些糊涂认识，为了澄清事实，有必要对这个事件作一次分析，于是我就写了《漫谈苏联红军向波兰进军》的一篇短文，结果很解决问题，在全军得到较好的反映。第二篇是1939年11月11日为祝贺团参谋长王槐生五十大寿而写的。我引用了当年3月斯大林在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老干部的评论，并借此对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对比作了一点发挥。第三篇是1939年11月16日写的，题为《皖南的粮食，农民与军队》。因为当时国民党地方势力不准农民把稻米卖给新四军，国民党CC派的报纸《东南日报》也造谣说新四军压低粮价，并强迫封仓。对此，我们不能不公开予以反击。第四篇是1939年11月26日写的《两种说法，还他两个例子》，涉及到满洲国和波兰的问题，做了对比。

这个小报几乎每期都有社论，其中涉及国际问题和欧洲战争形势问题的我写过一部分。但是因为社论都不署名，现在也很难回忆和分辨出哪篇是我写的，哪篇是别的同志写的了。我当时给我在《抗敌报》和《抗敌》杂志上发表的那些短文章起了一个统一的标题，叫“运甓营房随笔”，并且编了“之一”、“之二”、“之三”的号码。现在仅在《抗敌》杂志上找出了一篇。我把在军部睡觉、办公的地方，叫做“运甓营房”，意思是学陶侃。现在听起来，可能幼稚可笑，而我自己则认为当时确实是正正经经的。我在《抗

敌报》上发表署名文章用的都是李一氓。

《抗敌》杂志是个综合性的刊物。主要内容以国内的抗日战争为主，尤以新四军的抗日战争为主，也涉及新四军战时政治工作，有些文章则转载自延安的出版物。大体上是有关全国性的政治问题或者战术性的军事理论，也发表一些涉及战斗的或地方的文艺通讯。这个杂志有一个编辑委员会，一共7个人，他们是：朱镜我、林植夫、夏征农、黄源、冯达飞、薛暮桥和我。基本上是以政治部为主，教导队也参加。从创刊到停刊共出了19期，18本。现在缺7期，实存12期。

这个杂志说是半月刊，实际上并没有按期出版。它是在1939年“五·一”出的第1期，加上1940年全年，应该出40期，实际上它只出了19期。根据现有的目录，我在第3期上写过一篇《在游击区内用军事方法与日寇作经济斗争》，主要是主张破坏敌占区的铁道、公路和水运，以瘫痪它的交通运输。在第7期上写了《民主、宪法、抗战》，在第8期上写了《反汪述旨》，在第9期上写了《炸药和哲学》，主要是反对张君勱的理性主义和二元论，因为他在《近代思潮的特征》上，针对辩证唯物论进行攻击，我的题目之所以叫做《炸药和哲学》，不过是拿炸药的物性作为比喻来反驳他。在第10期上我写了《我们的艺术和我们的艺术家》，在第11期上写了《泛论思想》，在第12期上写了《欧战新形势》。我在第2卷第2期上写过一篇《认识和拥护中共中央的“七七宣言”》，这篇宣言的正式名称叫

做《中央为抗战三周年对时局宣言》，我不过用 4000 字来阐述我的认识和表示拥护，也算是在全军内部进行一次宣传。

19 期中我可能不只写了这 8 篇，但现在其它的查不到了。这些文章不过都是为了当时的实际问题提出一点看法，没有离开现实的空论。文章除署名“李一氓”之外，还用两个过去用过的笔名，一是“叶芒”，一是“德谟”。提起这些报刊，我总回忆到煤业救护队的同志，替我们作了很好的物质安排。而朱镜我则是这两个刊物最尽力、最有见识的总编辑。他原是日本留学生，后来在上海主持党的文化工作。抗日战争开始后被党派到新四军来，一下就适应了军队的特殊环境，这是颇不容易的。

关于皖南事变的全过程，我曾向中央有一个系统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我到香港以后请廖承志同志代发的，但要把各方面的情况都包含在内，还是不够的。40 多年之后，各种文字材料发表了不少，特别是当时的档案材料（包括国民党部分），尤为丰富。此外，当时一些亲历其事的同志的回忆和一些研究新四军的历史学家，对皖南事变做了历史性的分析和论断。现在我更没有必要去追述那 11 天的更为详细的过程了。因此，我的回忆就从战争的最后时刻说起。

我找机要员译出叶挺署名的向延安发的最后一份电报，并要求电台立刻拍发。拍发完这份电报后，我就招呼电台台长立刻把这套电台的所有设备全部砸毁。回头我又招呼机要员把所有的密码本全部烧毁，为求烧得快些，分成

两处烧。等到我去检查完电台砸毁情况，回头来那些密码本已经烧光了。我就带着这两批人从后院出来。但是作为军部指挥所的前院，上至军长下至勤务员，一个人都没有了。

当晚天色很暗，伸手不见五指。出大门后，只看见山坡上密集的人影很纷乱地在奔跑。最后我也爬上山追上了一个战士，我问他军长他们哪里去了，他就用左手指了一下。我要跟着上去的时候，后面的人也不知是谁把我挡住，不准我向那个方向去，说：“不要去增加他们突围的困难，人多了，目标大。”那时已经跑得很乱，我身边报务人员已经没有几个，机要人员也跑散了。我就同少数人跑到一个山沟里面。我估计现在乱跑也跑不出名堂，还不如找个茅草多、树木多的山腰隐蔽下来，等天明了再想办法。

在行动中，我遇到了一个警卫班，我立刻要他们跟我一路走。住下来的时候，在路上捡到一支全新的俄国式的手提机关枪。同行的还有几个干部，我就说服他们同我在一起，反正只要我们没有什么动静，不被国民党的包围部队发觉，是绝对安全的。当然，从这时起只好挨饿了。听到山沟里有流水的声音，找人弄点水来解渴还是完全办得到的。就在这个时候，听见左面二里外的山上山下枪声非常密集，但是没有几分钟枪声逐渐停止了，我猜想叶挺去的那个方向发生了问题。后来证明，大概就是那阵枪声后，叶挺就被俘了。叶挺是怎么被俘的，有不同的说法，我不在场，也弄不清楚。当天晚上，我把图囊里面所带的一些重要文件，如我回四川时毛泽东写给我的指示信，叶挺和

项英之间互相不满意，叶挺写给我的一封长信，还有我那本仅仅整理了《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一段的，其它还是素材的长征日记，都埋在皖南的山上了。埋的时候是很舍不得的，现在也还是很后悔的，但是后来下山的时候，也未必能把它们带出来。

实在太疲劳了，我也就在茅草里睡熟了。但醒来向左右一望，又少了好多人，各奔前程去了。特别是那个警卫班都是短枪，是很有战斗力的。当时我留他们在一起，意思是即或冲不出去，有这么一班人，我们也会在皖南的山里活下来。他们这一走，使我全然不知所措。我问那时还在一起的人，这个警卫班怎么走的，说是因为李志高。他是军参谋处的作战科科长，以后他跟项英他们碰在一起，等到刘厚总谋杀项英，他又从皖南渡江到皖北，到了新四军第七师，后来不知为什么他又自杀了。因为他已经自杀了，我也就不愿说什么了，反正在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偶然的事情太多了。

在这个时候，我依然想的是多找些人在一起，找到地方党的关系，做有组织的突围。但是白天只能躲在茅草丛中忍饥挨饿。注意一下周围山头的情况，看来国民党的部队已经开始撤出战场。当天晚上，我们就试着摸下沟去，想找个单独的农家去弄饭吃。但是就在那个沟里面，这个山坡、那个山坡都下来一些人，有二三十个。这些人中有胡金魁，他原来是江西国家保卫局的人，长征以后在瓦窑堡入党，后来在保安当中央的交际处处长。斯诺访问陕北时，

所有的接待工作都由他安排。《西行漫记》的中文版上有他的照片，但是他的名字却译错了。新四军成立的时候，他当三战区所在地的新四军的上饶办事处主任。这时我们大家就都推举他带一两个人，到农民家里弄饭，弄到后拿到这个山脚下来。但是我们左等他也不来，右等他也不来，究竟过了多少时间也很难算定。一下要弄二三十个人的饭也不容易，但是这些饿了一两天的人，总觉得等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因为在战争环境下，有人怕出问题，所以这顿饭没有吃成，大家就散到各自的山上去了。据他后来说，他把菜饭都弄好拿来时，一个人都不见了，他还非常惋惜。这个同志解放后一直当湖北省委的统战部长，工作做得很不错。

这顿饭没有吃成，又爬上山去过了一个夜晚，等到天亮就陆续下山了。山沟的水很清凉，大家都饱喝了一顿。有的人又洗脸，又漱口。当然今天遇见的人，也不完全是昨天晚上等那一顿饭的人。估计周围已没有国民党的军队，就想大胆地闯进农民家里去弄饭吃。去的人还算警觉，看出有个小村有地主武装，就赶快回来了，说不行。但为时已晚，他们已经被地主武装发现。地主武装跟上来了，虽然人数不多，不过两三个人，但我们不能公开抵抗。他们首先开枪，这一来在水沟旁边的人就乱跑一通，把原来那个没有形式的组织打乱了。不知道为什么跟我跑在一起的是余立金、钱俊瑞和三个教导队的学生。今后这6个人就要共同度过一个短暂时期的困苦生活。而且由于钱俊瑞在内，

使余立金和我两个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糊里糊涂地白白吃了一场长达5年之久的官司，这是后话。历史就开了这么一个玩笑。虽然当时地主武装开枪没有伤人，也没有继续进攻，却把我们的一顿饭给弄吹了。我们在山沟里隐蔽了一会儿之后，决心转移目标，到另一个山沟里去。大概在新的山沟里住了两三天（1月20—22日），找到一家对我们很同情的农民，每天晚上都能弄到饭吃。

我们估计国民党部队已经撤走了，于是商量一起下山到徽州，然后分散。我决定去桂林转重庆，余立金、钱俊瑞去宁波转上海回苏北，3个青年要求回家去，这样也比较好。时间离过旧历新年不远了，我们白天躲在树林里，晚上到一个农民家里吃饭。我们向他提出要下山的计划，要求找几套冬天农民的衣服来改换便装，他满口答应好办。果然，在晚上他拿来一些棉衣棉裤，大家选择了自己适合的棉衣，当然都是粗布的。我们脱下了军服，并把所有涉及军队嫌疑的东西，不管有用没用全丢给主人了。其中包括我用了10年的一支红色派克笔，实在有些舍不得。有些短武器，没有告诉主人，都悄悄塞进他的粮食堆里面去了。主人还替我们设计了一些道具，如钱俊瑞提个竹篮子，里面放一些香烛，表示要回家过年。我拿一个竹杆子，上面挂了一些小的野兽皮，如黄鼠狼之类的皮，可以冒充上山收皮毛，现在年底应该回家了。余立金搞个什么名堂，那3个青年又是怎样装扮的，时间过得太久我也说不清楚了。

这些事情办妥以后，由主人带我们走了三四里路，指

给我们一个去太平的方向。为感谢主人，我们送给他 50 个银元。我们 6 个人分为 4 起，一个教导队学生在前，余立金、钱俊瑞第二，我第三，再有两个教导队学生殿后。中间各相隔二三百米。只要前后能够照顾到就行了。这不过是一空话，实际走起来，前边的人是走得很快的，有时你根本看不到前面的人。一个晚上，一个白天，这 4 股人就各不相顾了。我是走得最慢的。第二天下午绕过太平城下山上公路，就连走在我后面的两个青年都超过去了。我拼命地赶，傍晚到了公路旁边一个小茅店的时候，他们已在那里吃过饭睡觉了。当然我们装作不认识，互不相干，他们睡他们的。第二天早晨，他们比我起得早，从此之后一直到徽州，我就再没有见到他们了。

一路只有我一个人，为着不使自己过份引人注目，我连那皮毛杆子都丢在公路旁的草丛里了。走了两天，脚上打了泡，越走越慢，但也无可奈何。最担心的是有两次遇见国民党七十九师向浙江撤回的部队在公路旁边休息，为了防止出现意外情况，我拼命地赶到他们前面，摆脱他们。原来相约第三天都到徽州，但我实在走不动了，天已经黑下来，我才赶到潜口。

潜口镇外有一个小茅店，是人力车夫晚上寄宿的地方。我就要求在那茅店里借宿一晚上，店主显然分辨出来我不是一个人力车夫。他就说这个地方过些时候是会来查店的，查起来不方便，不如我先借一个烘炉给你，你到对面山坡下面一个茅棚底下去等一下，等查过店，我再把你找回来。

我向他说，我也没犯什么事情，怕什么，我实在是走不动了。也不知他怎么想的，就说那好，我们到街里找个地方去住。随后他把我带进一个面馆说，你反正饿了，先吃饱我们再去找住的地方。饥者易为食，我居然吃了两大碗，吃得饱饱的。然后他把我带上街，摸黑走进一所象是祠堂一类的大院。

在一个空空荡荡的厅堂里，隐隐约约地看见有几张缝衣服的案子。当时正是阴历12月的最后两天，当然不会有月亮。房屋又大又深，有点什么声响，外边也不会有人听见。他让我等一下，他去租两床棉被来。我们就睡在一张缝衣服的案子上，他睡一头，我睡一头。我自然难以入睡，心里暗自盘算，他会不会怀疑我身上总有点什么钱。假如他心术不正的话，要谋财害命是很轻而易举的事。我想还不如透露一点给他，看他有什么反映。皖南驻有两个军的四川军队。我就说我是川军的，因为想家开小差了。他反而安慰我一句，说你安心睡吧，有事情明天早晨再说。我就更拿不准他在想什么了。从他说话的口气听来，似乎还不至于拿刀对付我。可还是睡不着。由于一连走了3天，实在太疲劳了。最后精神还是松懈下来，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我自己设想的那一场谋财害命的血案，并没有真演出来。

醒来后，他又要我等一下，他去把棉被还了，回头就向我要棉被的租钱。并说他有办法搞到通行证，问我究竟要去哪里。我就说回四川总得经过桂林，你就给我搞一张

从潜口到桂林的通行证。他说这个通行证恐怕要多费一点钱。我问他要多少，他伸手就要 80 块，这种事情也不好讨价还价，我就给了他 100 块钱，包括棉被的租费在内。然后他又提出来，说是明天就过新年了，大家交个朋友，能不能让他把新年过得宽裕一点。我心想，昨晚那样天黑地寒，没有死于非命，总算大幸了。我又拿出 100 块钱送他，看样子他是很满足了。因此又带我去吃了两碗面，算是一顿早餐。然后，把我送出潜口。

那个店主为我雇好了一辆人力车，可以一直坐到徽州。临分手时，那个人明白地告诉我，你不是川军，你是新四军的，我们没有恶意，你放心走吧。我既不能承认也不能否认，只是含糊其词，感谢他帮了许多忙。我就一个人坐人力车到徽州去了。

这时，就是我一个人。余立金、钱俊瑞他们在我前面，现在都不知到哪里去了，等我下了人力车，进到徽州街上，才看到他们两个人。他们已在徽州的估衣铺换了一套新衣服。两个人匆匆忙忙地对我说，他们立刻就要上船去宁波转上海。我们事先曾经讲过，他们两个人去上海，再回到苏北军部，我一个人直接去桂林，准备回重庆，向办事处报告事变经过。他们那时好象很怕我连累他们的样子，极力摆脱我。从部队失散，我们 3 个人突围出来，一路下山，到此就分手。

我也学他们，在徽州街上买了一套新衣裳，又买了一个小箱子，买了一些徽墨和一些茶叶，准备作为做贩卖茶

叶生意的借口。但那时已是阴历除夕（1941年1月26日），不仅当天没有交通工具，就是第二天（正月初一）也没有交通工具可以去金华。我只好租住在徽州城外的一家旅馆楼上，熬过年初一，到初二再说。因为要过年，旅馆的店员都把大门关上赌博，也没有什么人来，我一个人耐着寒冷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就这样平安地度过了除夕和初一。

第二天请旅馆的人帮忙，在去金华的出租小汽车上买了一个位置。大概9点钟的时候，就上车去金华了。车上有4个客人，跟汽车司机同排的人大概是个普通人，同我坐在后排的两个人就是七十九师段茂霖部的两名下级军官，大概是战事结束以后他们回浙江去。两个人还议论谁缴获得多，但是都说想不到新四军的装备这么坏。我同他们坐在一排，只好听着。车子到了金华，下车以后，我就住到金华的花园饭店。乘机又在金华街上买了一件绸面的丝棉袍子，还买了一床丝棉棉被，那时物价不高，总起来不过20多块钱。临走时，在徽州买的那件布棉袍就丢掉了，这件丝棉袍我一直穿到香港。以后我就坐浙赣路的一段火车到了江西的鹰潭，这一段火车没有煤炭作燃料，烧的是木柴，因此车速很慢。窗外一片战时的后方景象。从鹰潭又改乘长途汽车到湖南的衡阳，又坐火车从衡阳到桂林。

在徽州买了旅行皮箱，在金华换了衣服，而且在潜口已经弄好了一份通行证，所以一直到桂林旅途上还算顺利。即或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检查，有了一张通行证，也就能够大胆地敷衍过去了。

1941年春节过后，元宵节（2月10日）前几天，我从衡阳乘火车到桂林，时间已很晚了。我要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找李克农同志，但八路军办事处在哪里，我不知道。于是我想，先去找桂林的救亡日报社，找着救亡日报社自然就会找着八路军办事处。但救亡日报社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救亡日报》是公开的报纸，报头上印有报社地址是不成问题的，而报纸是可以从报摊上买来的。我下了火车，在车站站口不远的地方，买了份《救亡日报》。看清报社明确地址是桂林太平路21号，但我没有来过桂林，不知道如何走法，于是叫一辆人力车，把我拉到救亡日报社。

报社大门是关着的，我敲门进去，看见一位工作人员，我既不能自报姓名，也没有问他姓甚名谁，我就说想打听一下八路军办事处在什么地方。他随即回答我：“办事处已撤退了。”这一回答使我心凉了一半。我就又问夏衍呢？回答：“到香港去了。”又问长江呢？回答：“也到香港去了。”这两个回答使我另一半心也凉了。当时我想，只好铤而走险，直接告诉他区区何许人也，请他想法帮忙；或者即刻离开报社，去找李济深的桂林行营。又一想，觉得两者俱不妥。于是我又问总还有什么人留在桂林，没有去香港。他沉默片刻回答：“秋江没有走。”听了这句话，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立刻请他把秋江找来。他打了个电话，一下就把秋江找着了，我和秋江通了话，作了我是谁的暗示。过了一会儿，秋江来到报社，见面后不需三言两语，就把我带走了。

这位和我在救亡日报社对话的人，我始终不知道姓名，也说不清其像貌。大概在1983年有一个人偶然向我透露，就是他，诗人、擅长写日本俳句的林林是也。我感谢他，要是没有他的帮助，我可能在桂林会碰壁的。

当晚，由秋江安排了一个临时住处。一个小院落，似乎没有人，进入一个房间，仅一桌一椅一木板床，幸好我还带有勉强可以过得去的卧具。他则替我张罗了两碗面，然后告别说，明天再想办法。

第二天一早，他来了，给我一个资源委员会的证章，冒充资源委员会的职员，并搬到当时在桂林算是上好的旅馆——环湖旅馆。这个旅馆在桂林环湖路，可以说是仕宦行台，谨慎一点，可以掩护下去。因此我大部时间住在旅馆，不大出去，以免碰见熟人。我的原设想是从桂林到重庆，向周恩来同志报告皖南事变经过。我托秋江找李济深，要求利用桂林行营和重庆来往的交通工具，或至少利用这个关系办妥交通手续。但李济深认为去重庆太冒险，还是回苏北新军部好，他保证把我送到香港。事情只能如此。他要我在桂林等一个人，由他送我去韶关，再转乐昌机场乘去香港的飞机。等的人是李章达，我认得他，是广东人，曾任孙中山元帅府的警卫团长，1927年夏天北伐由广州出发时，他正任广州的公安局长，曾请客为我们送行。他来送我正好。

在桂林闲住，不想去找什么人，以免麻烦，只弄到一本什么词，闲翻。有个晚上忽然发现是元宵节，从元旦在

徽州度过，第二天离徽州，辗转到桂林，一下就半个月了。不无感触，就写了一首《绛都春》的词，写好后忽然决定不加上下款，寄给在重庆的郭沫若，他定会猜出来写此词者为谁，可以代报平安。后来知道，词真的寄到了，他也猜出写词的人了，并汇了几百元钱到桂林来接济我。可惜我已离开桂林，没有亲收。但我还是感谢他，所以1942年底在苏北解放区时，我又曾寄给他一首词《念奴娇》，其中有“桂林邮汇，感君慰我穷蹙”之句。

秋江把李章达领来和我见面后，也没有更多的什么寒暄，一切由他定。第二天，我们就搭火车由桂林返回衡阳，又由衡阳搭车到韶关。李章达似乎很熟悉韶关情况，我们到韶关后，租住在一条作旅馆的大木船上。那是战时的新发明，住在北口的船上，一有空袭警报，就把船撑离韶关，摇到人少、目标小的下游，等空袭警报解除了，又摇回到韶关市岸边抛锚。把船包用了，也不会有别的旅客，因此船上又清静，又安全。我们把三顿饭包给船上，广东船娘极会做菜，色清味香，李章达这位广东人都大为称赞，我则更为欣赏了。去香港的飞机不是什么班机，说有就有，说没有就得等好几天甚至十来天，所以我们在韶关等了将近一个星期。

在韶关的时候，广东省委书记张纯清（张文彬）不知怎么得到了消息，知道我到了韶关，托李章达转告，他要见我。李章达的说法是：“你们党有个姓张的同志找你去，他会派人来接你。”于是约好联系办法，在一个下午，来一

个人先见李章达，李让我随他前去。我随他走出韶关城，在一个郊区进入一家瓦房民居，张纯清热烈地同我握手。安顿下来后，问起皖南事变的情况。我简要地叙说了事变经过，并附带说明我突围出来的情况，他深为震动。听完我的简要叙述之后，他把皖南事变后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给我看了。

自突围以来，大概已近一个月了，由于切身关系，这个决定对我有很重要的意义。我就要求他替我发个电报给中央，说：“我已安全脱险到粤，经过间接关系找到了文彬同志，我对中央的决定完全接受和拥护。由孟秋江介绍李章达送我到韶关，即准备由韶关飞香港，转道上海回苏北。”

他答应将这个电报发中央，就先离开这个民房走了。还是那个同志把我送回到韶关船上。这时是2月24日。这个电报广东省委替我向中央发了，即作为我打给中央电报的第一号。张纯清是湖南人，在江西苏区我认识他，因为他当三军团的保卫局局长，在保卫局系统有工作关系。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前，广东省委在韶关遭受国民党反动军阀破坏，他被捕入狱，从广东转押到重庆。他患有严重肺病，后病死在狱中。廖承志被国民党拘押在重庆的时候，曾和张纯清同在一个监狱。

在韶关，李章达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个好朋友，名字叫什么现在忘记了。那个人也要去香港，就托他在路上照顾我。在韶关等了一星期后，终于有飞机去香港。那时飞机场并不在韶关，而是在乐昌，还要坐汽车向北走好几十公

里。飞机是中美航空公司的一架小飞机，不过坐三四十个人。下午从乐昌起飞，晚上才到香港。因为我在桂林就已问好了夏衍他们在香港的电话，所以一到香港，我就在航空公司的办事处打电话找到夏衍他们。他们就从航空公司的办事处把我接到半山道的半山饭店。

后来，在我还停留在香港的时候，大概是1941年4月，李章达本人也到了香港，廖承志要我向他道谢。我在半山饭店请他吃了一顿饭。解放后，他常因公来北京，我都去住处看他。李和廖承志很熟，廖很尊重他。因为在同盟会期间，李常闲住在廖家，当过廖承志的启蒙老师，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朋友。

那时在香港负责的是廖承志和潘汉年，我有责任向他们详细地报告皖南事变的经过。他们两个人大概听了我好几次报告，听完以后，要我写成电报报告中央。我把电报编了号，以在韶关发的电报为第一号，在香港发的就从第二号算起，一共发到第六号。现在依顺序把这些电报稿抄在下面：

报告第二号

一、我军之编组：

(一) 第一纵队以第一团、新一团编成，人数约三千，司令傅秋涛，副司令赵凌波（原军参谋处长），参谋长赵希仲；

(二) 第二纵队以第五团及军部特务团编成，人数约二

千余，司令张正坤，参谋长黄序周（军副官处长）；

（三）第三纵队以第三团及新三团编成，人数二千余，司令黄火星；

（四）军直属队（包括教导队一个营）人数约一千。

二、敌军军力：

（一）总指挥上官云相，原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副总指挥唐式遵，原二十三集团军司令，在太平设指挥所；

（二）第一四四师唐明昭，川军，隶五十军；

（三）第一〇八师戎纪五，原东北军，隶二十五军；

（四）第五十二师刘秉哲，中央军，隶二十五军；

（五）第四十师方日英，中央军，由苏皖边调来；

（六）第七十九师段茂霖，中央军，由浙江诸暨绍兴前线调来；

（七）第六十二师冷欣；

（八）新编七师（预备队）田仲毅，川军；

（九）野战炮总队之一部，附炮六门；由浙江前线调来。

三、我军行动路线：

（一）走原来三战区指定到苏南的路线，必须通过五十二师及一〇八师的防地，那时该两师兵力及六十二师冷欣部，已分别集中。同时，经过地区均已筑好工事。

（二）稍偏南走五十二师及一〇八师之背面，仍须打两个师。

（三）再南，走泾县、宁国以南，旌德之北，脱离五十二及一〇八师，有与四十师遭遇之可能，但只打四十师，我

估计力量有余。

(四) 故决定走第三条路。

四、我军行动迟缓之原因：

(一) 自决定北移后，项英同志始终动摇不定，有时想苏北，有时想皖北，拿保全力量作为不坚决迅速行动之掩护。我个人曾三次进言，催促行动，少数损失可毋庸顾忌，皆被拒绝。且以“从苏南你可以穿便衣走，而枪杆子不能化装”之语加以斥责。并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暗中指出某些干部不顾保全力量的观点不正确云云。而叶希夷始终想得点子弹，后来闹僵。战区则非行动后才发子弹，而叶则非子弹到手后才走。虽中央电到：谓得到战区的子弹与饷款只能认为是例外，叶笑语说“留一点情（指顾祝同），就发一万也是好的”。

(二) 只有到后来中央书记处给项袁周的斥责电到了之后，同时得到情报四十师已进到泾县、旌德之线，才决定行动。那时还是十二月二十九日，但如果决心快，在三十一日或一月一日就出发，事情也不会闹到如此之糟。

(三) 我三十日曾往催语袁国平促项行动，并向周谈，行动既决定应即作行军部署。但不知何故，决定到四日晚出发。

(四) 四日大雨，晚间青弋江水涨，原来决定徒涉，此时不得不搭浮桥，而工兵计算河幅有误。搭好后还差二十米，又拆后重搭。加以军部由云岭出发到过渡点竟会走错了路。由云岭到茂林四十里，连过江耽搁，到五日正午才

到齐。

(五) 五日又大雨，晚上未能行动，到六日晚才行动，又迟了两天，使敌人有时间准备好而我反变为被动。

报告第三号

一、六日下午决定作战部署，以第一纵队出涵岭向南攻击榔桥河，以第二纵队出高坦向北攻击星潭，并且箝制三溪之敌，以第三纵队出中岭直攻星潭。军部随第三纵队前进。

二、七日晨，第三纵队下中岭，为百户坑，坑口已为四十师以工事及火力所阻塞。道路窄狭，山势陡峭，攻击不能得手。而当天第一纵队攻击虽已冲出求岭、剪刀口，但终为敌所阻止，并为当前河道（雨后水涨）所箝制。而五十二师后军亦到，遂不能南攻星潭，至第二纵队亦在高岭坑口，与敌肉搏。至此，战局已出意料之外，处于被动及不利地位。

三、当日下午开会二小时，叶希夷提出二个方案：

(一) 立即后撤，循来路回茂林，再渡青弋江，打太平、洋溪、石埭、青阳，甚至再南出祁门、景德镇。袁认为可以考虑，项反对，认为政治上说不过去。叶反称此时求生存第一，政治上说得过去否，其次。但终被打消。

(二) 翻百户右侧山梁，由另一坑口打出，但要翻无路的山，右侧坑口是否亦为敌所封锁不知道，待侦察地形与敌情后再出发，此时天已黄昏，非次日晨不能决定，耽搁

时间而无把握。亦被打消。

四、参谋处李志高及叶超提出第三方案，决心继续攻击正面，任何牺牲在所不惜，项亦反对，认为损失力量。

五、至此不得不提出第四方案，即由高岭南之园岭翻出，避免与四十师作战，可与第二纵队会合，以便转至太平、洋溪间丘陵地带，而任第一纵队与四十师及五十二师相持，但必须与七十九师遭遇。会议情形并不顺利，反复讨论而项本人则无具体意见，但又反对别人的意见。

六、七日午夜撤退，选派第五团于八日占领园岭，下午我虽占领园岭，而七十九师亦于当日到达山脚，向园岭攻击前进。

七、现在战局更形不利，园岭既占不成，正面攻击星潭之机会又已失去，遂迫得只有向原路退回茂林，进至铜陵、繁昌，相机北渡皖北之唯一出路。

八、此时在军部掌握中的队伍，只有一第三团，一特务团及一教导队了。七、八日晨（还是九日晚记不清楚了）得情报，刘雨卿已令一四四师由茂林封锁我之来路，以收夹攻之效。我遂仓惶出动，此时三团尚未吃饭（特务团尚未撤下，第五团尚在园岭），军部与教导队先行，距离茂林十五里遂与一四四师发生战斗。时深夜大雨，敌情不明，第三团赶上很迟，项袁动摇脱离部队而去，亦在此时。

报告第四号

一、打星潭未奏效，转移阵地。又因七十九师赶到园

岭，未如愿。同时又接到情报，上官云相令一四四师由茂林堵我后路合围，以收夹击之效。故于十日晚，决定先期由来路退回茂林，仍转至铜（陵）繁（昌）地区作战及准备渡江，但此时军部已与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及第三纵队之新三团失去联络，同行动者只有教导队及第三团。项于是日晨即丧失信心，命令军需处将现金进行分配。自己并将马背上的行李分交四个卫士随身携带，一切机要文件，概行烧毁。

二、晚上行动至离茂林二十里山谷出口处，即与川军（一四四师）接触，我军实行动太迟，但时当黑夜，敌我不分，且下大雨，而第三团尚在军部序列之后，久等都没有赶上，使战局增加困难，不可能当晚达到突围企图。

三、我此时因情况不明，同时多次离开队伍，向前去探听消息。晚十时左右，项忽派人叫我几次，皆未找着。等我回到我的位置，知道项派人来找过我，遂去项处，那时袁国平、周子昆皆在。项一手握我，一手握袁，周在其前左不作一语，即匆匆向后走，此外同行者仅二三卫士。我初不知他是何用意，我还以为找地方开会，决定最后处置。但又不见有老叶，行数十步后，袁始说他的卫士没有来，周又自语说，他没带钱，我才恍然，项又要来他三年游击战中在油山那一套。我即追问项叫过老叶没有，项仅答叫了他不来。此时我对项此种行动不大赞成，我当即表示我不同意他们走。项即反问，那你怎样办？我说，我另想办法打游击，也要带几支枪脱离队伍，也要想法救出几个干部，我

还想把军法处、秘书处及胡立教等设法从铜陵、繁昌过皖北，项当即表示赞成，与我握手，并说把××（电文不清）也带走，他身上还有钱。袁当时表示愿同我走，又听说今晚无把握，须等明天看清情况再决定。结果仍与项、周同走，因同行之猎户是他们唯一之向导，于是分手，他们继续前进。

四、我一个人转回后，因找张元培、胡立教及军法处、秘书处的人未找着，首先遇见李步新（皖南特委书记），我告诉他说老项他们走了，后走到河边祠堂叶之指挥所。当时我想告诉他这个消息，但又觉得太突然，刺激太甚。我想留下与叶一块，但又觉得项袁周党军政都是负责的，我没有与叶共存亡的责任，即或算开小差吧，也是奉命的。遂决定不告诉叶，仍然退出。找着张、胡、杨（帆）（军法处）等，并与李步新的地方党同志共三十余人，也就离开了队伍。过了一晚，十一日下午，在石井坑的谷道中，我们下山吃饭，遇见第五团全团撤退出来，向石井坑口出去，大家遂决定不管其他队伍在哪里，我们决定随第五团打游击。十二日后出至坑口才晓得，军部也打到石井坑来了。

五、项袁周他们也在附近山上，跟在第五团以后，下来与军部会合。

六、我承认我当时没有坚决反对项袁等的动摇，只是简单不满意、不与他们同行动而已。

七、我受了他们的影响，没有到最后时机，便脱离部队，这是我的错误。

报告第五号

一、经过几天行动及连续战斗与转移后，大部分部队已失去联络。军部于十二日晨转到石井坑时，教导队也不知去向。又当日五团三团特务团教导队及一团之一部皆会合于此。总计人数尚有四千，唯已建制零乱弹药缺乏。

二、石井坑口有居民百余家，地形相当开阔，四围山地可守，粮食可吃一星期。

三、此时项袁初回，对整个局势不能表示意见；小饶（漱石）不懂军事；叶坚主守，以为能拖延四五天看延安有无办法，或能从蒋身上得出一线希望。

四、唯当日六个师已将我团团围住。仅石井坑南之东流山尚在我手中，守兵只有一排，且未筑工事。

五、合围为一圆形，大坑（茂林北）系我特务团阵地，稍形突出。但在十二日战斗中，为五十二师所截断，特务团牺牲殆尽。

六、当日得情报：上官命令当晚总攻击。未见实行。十三日上午八时起，枪炮声齐作，总攻击开始了。上午特务团阵地既失，而东流山亦为敌所夺（固守兵过少，增援过迟）。此时我毫无突击力量，加以敌已重围，突围全不可能，而弹尽粮绝坚守亦不易矣。

七、下午军部指挥所也无法移动，延到黄昏前，指挥阵地上亦流弹纷飞，至此叶亦不得不提出分散突围。会议未定。而任光（音乐家）为流弹所中，人心动摇，即草草

分批四走。

八、此时四面阵地仍在我手中。天渐晚，我已艰苦坚持二日一夜，战至天明，手榴弹打完，且未退一步，不惜与敌人拼刺刀，敌牺牲亦大，疲困亦甚，故当晚战斗稍松。

九、十四日战斗当系各自为战，我军或被俘或牺牲或冒险冲出，总之战斗于此结束。

报告第六号

(二十四日午)这次战役的失败主要的当然是项的政治领导的错误，但如单就军事来说，也犯了极大的错误。

1、出动太迟，假如能提早四五天，结果也不会如此之难堪；

2、估计敌人太低，估计自己太高，以为四十师不堪一击；

3、在地形选择上当把自己放在高山上，放在深谷中毫无作用；

4、战斗准备不足，非战斗员太多，行装太多；

5、行军过久，行军力不强，敌人是每天一百里路，我们仅四十里路；

6、使用兵力不恰当，兵力分散，假如全军作一路攻击，不会感到兵力不足与彼此脱节；

7、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过去三年，战斗都是团为单位，这次六个团一齐打，毫无协同作战可言；

8、因过去子弹多，不注意节省弹药，到后来有枪无弹；

9、参谋长工作差，周子昆只能管后方勤务与教育工作；对作战部署与指导毫无把握；

10、项毫无指挥山地攻坚作战之经验；

11、战时工作全无计划，对连指导员只要求单纯的鼓动工作，缺乏整个战役的组织工作。

这是我对于这次战役失败的意见，中央军委如别有查问的，我当据实回报。

皖南事变是从1941年1月4日起到1941年1月14日止，历时11天。我写电报是3月间的事，中间隔了不过五六十天，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大事变，因此记忆非常清楚。要我现在再做详细的回忆，达到电报的程度就很困难了。

皖南事变是有结论又没有结论的问题，在项袁错误决定上，已经指出了那些错误，但最后又说这个问题要由党的七大作出决定，而七大和七大以后的各次代表大会，都没有涉及这个问题。现在争议很多，我不愿意卷进去，我的看法还是保持我向中央作出的报告。因为那是我亲身经历的实际情况。我承认在新四军当中工作的错误，没有在叶项之间做好工作，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了项袁准备离开队伍，既没有劝说他们不能这样做，也没有去找叶挺报告这件事情，反而自己学他们的样子，也找了几个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脱离了部队。其实也没有跑出包围圈，被迫依然返回军部。虽然时间很短，从黄昏到半夜，不超过10个

钟头，但总是一件这一生都感到遗憾的错误。后来华中局向中央报告，要给我一个口头警告的处分，我二话不说，决然接受下来。所以 1942 年以后，党内多次填表，在处分一个栏目上，我总是规规矩矩地写上皖南事变口头警告。至今想起来，不知为什么当时会错走这一步，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可能还差点什么。

就这样在香港住了大约 1 个月，依照潘汉年的提议，说是他不久要去上海，他陪我一路比较保险。他也警告我在香港不要一个人乱走。由他介绍认识了好多我原来不认识的朋友，如金仲华、羊枣（即杨刚的哥哥）、陈此生、恽逸群、郑森禹；原来熟悉的朋友，除廖承志、潘汉年，还有梅龚彬、夏衍。照潘汉年的说法，早晨可以找这些人去饮茶，晚上可以同这些人打牌，这就是最保险的方法。对香港我也不熟悉，也不会讲广东话。从皖南来，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又准备去苏北，要添一些日常用品，廖承志就请他的姐姐廖梦醒陪我去逛那些大百货公司，当广东话的翻译。就在这 1 个月内，我既到了香港又不得不去澳门一次，去慰问叶夫人，同我一路去的是潘汉年和梅龚彬。对叶夫人我也无话好讲，只能说打败仗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怪不上叶军长。他在国民党军队中有那么多老朋友，还有个共产党跟国民党的战时关系问题，料定叶军长不会有什么事。

4 月中旬，潘汉年决定回上海，我就跟着他走。离开香港的时候，我把在徽州买的墨全部留下来送给廖承志的母

亲何香凝作绘画之用。我们坐的是美国的柯立芝总统号游船，买的是一等舱。在海上度过几天，安全地回到上海。到了上海之后，潘汉年把我交给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刘晓，由刘晓安排我去苏北。刘晓把我安顿在一家不包伙食的寄宿社，并把我介绍给王纪华，说是交通安排定了以后就来找我。因此我就在上海稽留了将近 20 天。

终于有一天王纪华把我领到他家里，说晚上等交通员来了就坐船走。但是条件却很苛刻，不准带什么惹眼的东西，好多香港买的東西都不能带，特别是冬季服装只好丢掉。我打扮成一个商人，由一个交通员带着，在黄浦江码头上了一只小火轮，两个人装作互不认识。船出长江口沿海岸线向北，走南通附近的任家港口岸。那里还是敌占区，宽度不大，不过 10 多里，那儿没有日本人，只有伪军。中间在一个什么地方吃午饭，被伪军检查了一通，因原来就在上海办好了敌占区的通行证，所以很顺利地通过了。步行经过陈家酒店，然后到掘港（东台）、栟茶，就进入苏中解放区了。当天黄昏到角斜（即海安），那里有我苏中二分区的兵站，专门接待上海来的人。交通员把我交给这个兵站，他的事情就算完了。事后我曾经问过王纪华，那个交通员叫什么，但他也不知是谁，大概为保守秘密起见，这些交通的姓名也没有告诉他。不久前我几经周折才打听到，这个同志是鲁平，回想当时我能坐船、走路，从上海顺利地到达苏北，真要感谢这位交通员鲁平同志。

此后即由苏中区的兵站继续派人把我送到盐城华中

局。

我离开延安的时候，李富春要我作为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缓冲人。当时，我也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过什么设想，也没有向李富春提出过什么要求，就这样很轻率地答应下来。到了军部以后，一直到皖南事变，你说他们之间一定有什么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也很难说出来。在日常情况下，项英还是很识大体的。军部的正式会议都由叶挺主持，前方部队的报告、请示，项英都请叶挺首先批注意见。1940年春季反日寇对皖南（南陵、繁昌、泾县）的“扫荡”，作战计划是叶挺定的。凡是叶挺介绍到军部工作的非党干部，不管人数多少，项英都表示欢迎和信任。至于说一些小事如叶挺单独有的厨房，项英从未表示异议，甚至项英还在叶挺的一些生活细节上做了适当的处理，维护了叶挺的威信。

对于叶项的关系问题，后来我做了考虑，有人说是叶挺作为部队首长，不习惯政治委员制度，因此，叶项矛盾好象应该由叶挺多负些责任，这个理由不是事实。因为大革命时期，叶挺当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在武汉时期当第四军二十五师师长（1927年1月），后又改当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南昌起义时，又改当第十一军军长，团、师、军都有党代表，也就是政治委员。南昌起义的时候，聂荣臻就是他的党代表，他们合作得很好，不能说叶挺不习惯于政治委员制度。但是新四军的这两位——部队首长和政治委员，却在平常情况之外，另有两个特殊情况：（一）大革命时期叶挺和他的团、师、军的党代表，两个都是共产党

员，他们之间的问题，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得到解决。而在新四军，部队首长叶挺却是脱党 10 年之久的非党员，叶项之间只有行政关系，只有抗日统一战线的关系，没有党的关系。这就使得两方面之间难于自处一方面和对待另一方面。(二) 更重要的是，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的关系与叶挺当团长、师长、军长时不一样了。那时，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关系属于叶挺方面，而派去的党代表跟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却没有历史关系，或很少历史关系；而新四军的情形却恰恰相反，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关系属于以副军长名义出现的项英方面，而派来的叶挺跟部队构成和直接指挥不仅历史上没有关系，而是毫无关系。这种基本情况，自然会在叶项两方面发生各自的影响。但两方都不能明白地摆出来，叶挺摆不出来，项英更不能摆出来。因此叶项之间的关系，要是非常具体，有如《红楼梦》里探春所说的那样，一个个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那倒好办了。可以一个一个地根据双方是非，以大局为重，一个一个解决好了。但是这个矛盾却是来无影去无踪，双方都没有直接向我表示过。我当时也没有完全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程度，而且我无权把他们拉到一起进行仲裁。

隐隐糊糊的叶挺总想借口离开军部，采取躲避的办法回重庆，回澳门。隐隐糊糊的项英总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并且帮助他离开新四军。1938 年初叶挺离开过军部，从武汉去香港回澳门，后又携同李夫人回到军部。同年秋

天又离开军部送李夫人回澳门。大约就是这个时候，叶挺跟余汉谋商量了东江游击队的事情。12月到宝安县深圳墟（即现在的深圳特区）任广东东江游击指挥。事先他同项英商量过，项英大为赞成，并且送了叶挺300支步枪，运到韶关去了。又答应抽调一些广东籍的军事政治干部去加强他部队的工作。叶挺也居然在那里活动了一个非常暂短的时期。但终被蒋介石发现，加以指责。余汉谋也就只好把这个名义撤销了。这支部队后来归曾生同志领导。叶挺只好回到重庆。

1939年春，周恩来从重庆亲自陪着叶挺把他送回皖南军部。周恩来和项英有几次私人谈话，无第三者在场，他们肯定谈到叶项关系的问题。周恩来走后，叶项之间开始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但这种状况可能不是真实的，而是互相克制的结果。

同年5月，新四军成立江北指挥部（皖中），以张云逸为指挥，叶挺亲自去主持了这项工作，并到四支队检查工作，顺便处理了高敬亭的问题。地处江北的第四支队原不归军部指挥，而是归中原局指挥；战斗序列也属于第五战区（廖磊），而不属于第三战区（顾祝同）。高敬亭的那些罪名，大概是廖磊向蒋介石报告，又由蒋介石批准执行的。军部事后才知道。现在这件案子中央做了平反。叶挺8月才回皖南。10月他又去重庆，项英也同意，去向蒋介石要求增加军饷，增加弹药配给，增加五、六两个支队的编制，但蒋介石都没有同意。恐怕叶挺认为没有达到目的，回军

部不好交待，所以一直拖在后方，到1940年8月才回军部。叶挺离开军部若干次，当以这次时间为最长。不久皖南事变就发生了。

皖南事变前，他们曾议论过，把皖南部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军部直接率领，不声张地从皖南渡江到皖北；另一部分留在江南，俟机转移皖北或苏北。但由谁率领军部过江，谁率领留皖南部队，两人都非常客气，并且都承认率领留皖南部队是一项更艰苦、更负责任的任务。项英认为叶挺应该带着军部过江，这支部队有一个指挥部，人数比较多，叶挺以军长的名义过江，更为适合；项英自己带领少数参谋、后勤人员留皖南，直接依靠一个指挥部，人数少活动方便，这个地方又有地方党和很好的群众基础，作为政治委员留下来自认为适合。叶挺则认为项英应该带领军部去皖北，及早靠拢江北部队，留下的部队虽然人数少，但由他来公开以军长的名义应付第三战区，可能更为方便。各自都谦让一番，各自都不愿意承担把困难任务丢给对方的责任，因而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見，也就没有形成一个行动方案。现在看来，无论谁过江，谁留皖南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可惜他们过于谦让了。叶挺曾经下过一次决心离开军部，以后不再回来，他亲笔写给我一封信，表示他有很多苦恼，看来这种苦恼也不完全是和项英的个人关系。他说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就是暗示一个非党员不适于当新四军军长。这封信我给项英看过，项英没有太大的反应。我得信后他已经离开了军部，我作为缓冲人，

明显地是失败了。可惜原信也在皖南事变中埋在山上了。叶项之间关系固然很紧张，其实这种情况在别的地方也有。

关于皖南事变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国民党蓄意反对共产党的问题。而它反对的手段是针对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采取军事措施。它的总的借口是华北十八集团军的部队多次与山东省政府部队发生摩擦，新四军部队又渡过长江进攻江苏韩德勤部队，并追溯到陕甘宁、晋察冀、晋绥、苏鲁、苏皖等地过去的事件。它把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罪名归结为四项：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

这种争执，要是事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进行，无论如何两党是一个平等的地位。共产党不仅在立场上不让步，即或在语言上也可以直率地针锋相对。糟糕的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平等的争执，在形式上表现为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与重庆中央军事委员会两个总参谋长之间的不平等的上下级的争执。即使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立场不动，在语言上就难以那么直率地针锋相对了，不得不选择那些在官僚主义文牍上所惯于使用的“恭顺”字眼，就是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利了。譬如在所谓皓电上说：“关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之作战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

对于这个提示案，中共中央通过周恩来有一个反提示

案，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的协议。国民党根据它单方的提示案就下命令，很明显我们是不应该接受的。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却没有办法向何应钦、白崇禧提出，限你一个月怎么怎么，又怎么怎么切实遵行。可是换成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解决问题，国民党就不敢用限一个月怎么怎么，又怎么怎么切实遵行的文牍语言了。不要认为是一个文字问题，从文字上所表达出来的含义，实际上是对我们有一定程度的威胁性。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总参谋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请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叶参谋长剑英即转朱总司令玉阶、彭副总司令德怀、叶军长希夷一电，就是上文提到的有名的皓电。照《佩文诗韵》中上声韵的分部，皓字韵是第19个韵，拿这些韵的编号来代替日期，“皓”字刚好编在19，皓就是指的19日。

20天以后，1940年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电复何应钦、白崇禧，即所谓“佳”电。这个电报是在延安起草的，分为6点：甲、关于行动。说明八路军、新四军是对敌抗战的，至于如尊电所指，与他军一部发生齟齬，皆责不在我，拟请中央派员查明，以求公平。乙、关于防地。认为本军部队，均属本地战士，如概行北转，这些战士志在保家，乡情极重，调遣为难。且转动以后，家乡毫无保证，如平江惨案等，新四军部队深受其祸。所以我们要求，允许大江南北各部队，仍以就地抗战为宜。重要的这里有一段说“兹奉电示，限期北移。德等再三考虑，

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輿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从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等无穷之罪”。这就是我们承担统一地把新四军调到长江以北的允诺。对于江北部队则说了一句很灵活的话，叫做“暂时拟请免调”。丙、关于编制。丁、关于补给。戊、关于边区（指延安）。己、关于团结抗战之大计。这些问题都不直接涉及新四军，更同新四军北移没有直接的联系。但这封佳电却在原则上同意新四军北移。不过究竟从什么地方渡江，渡江最初时间，集结地点，渡江以后的作战区域等具体问题都没有规定。这样想来重庆当时恐怕也没有做具体的谈判。延安对新四军北调当然要有一个具体打算的问题，新四军则有一个根据中央的承诺如何遵行的问题，自然又有一个新四军在现行战斗序列下，跟三战区如何讨价还价的问题。

中央对国民党做出这个承诺，显然是一种妥协。国民党的要求是：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悉数北调至黄河以北，指定防区在河北、察哈尔、山西一小部、山东的黄河以北部分。而我们的对策既不是完全对抗的全部不动，也不是屈从于国民党的要求，全部北移至他指定的区域，而是把新四军的江南部队，渡过长江进入长江以北的战区，就算把皓电所提出的要求，应付过去了。这样我们就依然保有长江、黄河之间广大的抗战地区。

对于佳电，1940年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又给朱

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来了一个齐电，用了很长的篇幅，在部队行动方面、在政治方面、在防区方面、在华中敌后的游击武装方面、在补给方面、在边区（延安）方面，尤其对于我们说“国民党正在策划反共高潮，肃清投降道路”等等，均以中央口气多方辩解，全是国民党中央向共产党中央的政治反扑，都不是单纯的两个参谋长与一个集团军和一个军之间的问题。我们是让了一步，但从齐电上看不出国民党让了什么，总是摆出中央的架子，企图压服我们，把佳电都一一“驳斥”了。照理我们还应该有一个什么电，加以反驳，不能够他把我们的电“驳斥”以后，我们就一句话也不说了，这样反而在两党关系上好象国民党占理了。其实这种论争应该继续下去，一方面可以表示我们对抗战到底的严肃态度，一方面可以把新四军北撤的时间条件拖延下去，不能让国民党限期一个月就一个月。

江南这个阵地是放弃了，但是应该说党中央不是自愿的，而是和国民党妥协的一种手段，一个结果。是不是不放弃对党来说更好一些呢？因为要皖南新四军北撤，并不是出自共产党中央的主动的战略考虑，更不是出自共产党中央直接下的北撤的命令，不过是我们顾全大局，维持国共两党的抗战团结。国民党的顾祝同从他的局部来讲，把新四军赶过江北，他会是非常高兴的。国共之间既然已经形成了这个妥协，新四军的叶挺和项英自然应该服从中央的意图，应该想尽妥善的办法达到安全过江的目的。

但事变的进程却转变成另一个结果，恐怕主要是我们

把国民党想得太好了。在何应钦、白崇禧给朱、彭、叶、项的齐电（12月8日）之前，12月3日何应钦已向蒋呈报称：“若江北异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12月4日，徐永昌也向蒋介石呈报“3、若江北匪伪竟敢进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立即将江南N4A（新四军）予以解决”。蒋介石对这个第3点批了“可”。跟着12月10日蒋介石给顾祝同密令称：“（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置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12月31日）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表面上顾祝同还在跟叶挺讨论什么北上的路线问题，其实他们在齐电以前的三四天，已做好解决新四军的计划，在齐电以后的两天，蒋介石已下定了解决新四军的决心。所谓以江北新四军进攻兴化为条件，完全是一种借口。真正的说法是如蒋介石密令第二点所提的那样，要在12月31日以前解决新四军。

当然，我们在江北并没有打兴化城，但却于12月13日开始打了韩德勤的老巢，兴化以北的曹甸、车桥，打了18天之久。可惜这一仗并没有打好，攻坚不利，就主动撤下来了。顾祝同、上官云相等已把跟叶挺的保定（军官学校）同学之谊，早就抛在九霄云外，这批反动分子，决心要消灭新四军，决心要反对共产党，也就顾不得叶挺了。蒋介石以七师之众，布置在皖南新四军的周围，形成一个大包围圈，他们肯定是要动手的。我们没有看重7个师比3个团的军力悬殊问题，而是认为我们可以对付某1个师，置

其他6个师于不顾，安然就道。然而我们兵力不集中，地形不熟悉，所以栽了一个大跟头。可是现在想来，即或我们能够相机地、巧妙地、或者顽强地突破这一个重围走向苏南地区，但其前途还是困难重重。如何跨过水网、公路、铁道，躲开伪军、日寇，而又能自由驰骋地接近大江南岸是很不容易的。宋裕和的先遣队只有1000人，虽然零零散散的，不成队伍地都过了江，但他带的两三百担物资，却都留在江南，不知下落了。真正送到江北盐城军部的不过几担而已。最奇怪的是这个队伍当中的某些干部，还买了良民证，坐火车从镇江到上海，再由上海党组织经过秘密交通坐小轮船把他们送到苏北。我并不是说皖南事变新四军遭受了这一场极大的损失是命该如此，就把我们指挥上的错误掩盖起来了。我只是想说，在这个军事活动的客观条件上，明摆着一个跟着一个的困难。没有一个料敌如神、当机立断的高级指挥员，是难以完成这个任务的。

皖南事变我们失败了，国民党兴高采烈。在1月17日用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撤销新四军番号的通令，说“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又在1月30日用行政院的名义把这个通令转发一次。其实委员长也好，行政院也好，都是那个蒋介石。

历史的进程总是朝着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与反动派所预期的相反方向前进。国民党并没有达到它所要

达到的目的。有如毛泽东所总结出来的那条规律所说的那样，即“坏事变好事”。国民党这个命令一发，事情就好办了。他没有料到，这样他就给中国共产党一个独往独来的自由。事已至此，中国共产党于1月20日（号电）自行宣布：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他们随即于23日（漾电）宣布就职。国民党决心解决皖南新四军的时候，不知道他们考虑过这个后果没有，显然他们是没有考虑过的。前面所讲的国民党行政院1月30日发的通令，是在陈毅他们建立新四军新军部并宣布就职以后的事。国民党无非追说一次新四军的番号已被撤销了。但它却不敢下命令再解散新四军，通缉那个代军长。他们那时可能过低估计了中国共产党反击的决心，认为共产党无可奈何，只有忍着把这个苦果吞了。

如此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这个新四军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新四军，完全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国民党没有这个编制的番号，也不属于哪一个战区的战斗序列，跟国民党的军政部不发生任何补给关系，并且这个新四军从4个支队一下就改为7个师，比原来国民党答应新四军编两个师的编制还要多出5个师来。只要是敌后，它愿意去就去，跟国民党的军队不发生任何友军关系。在长江以北的江苏地区和安徽地区，在皖南事变以后我们有权利去打那些和伪军、土匪勾结的国民党军队，我们打了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江苏省政府主席的韩德勤，还生俘了他，并且

肃清了他底下的两个保安司令，第一个王光夏，第二个徐际泰。把我军、国民党军、敌伪军这个三角关系，简化为我军和敌伪军的单纯对抗关系。就在这个广大的苏北和皖东地区，我们建立了以新的新四军为主的根据地。当然我们也还得遵守中国共产党 1937 年 7 月 7 日《对时局的宣言》，“我们约束自己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将其行动限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这样我们就道逍遥地、无拘无束地一直打到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了，蒋介石要勾结美帝国主义，发动反共的内战了。但事先美国的马歇尔还出面，作出调解的样子。这样就有所谓调解执行部的组织在北平成立了。这个时候国民党的忘性也太大了，它不是连续两次宣布把新四军的番号撤销了吗？但这个执行部还在新四军作战地区成立了 6 个调解小组：山东济南小组，我方代表为邝任农；泰安小组，我方代表苏岗；青岛小组，我方代表姚仲明；烟台小组，我方代表仲曦东；德州小组，我方代表符浩；江苏淮阴小组，我方代表韩念龙。这些小组都有美国代表上校 1 人，国民党军官 1 人。可见国民党 5 年以前对于他已经宣布不存在的新四军作战地区的这些调解小组，自己还是派人参加了。皖南事变的苦果不是我们吞下了，而是它自己吞下了。

至于项英问题，这是皖南事变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问题。接着皖南事变以后，1941 年 1 月 15 日中共中央就做出了《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做决定的时间距战斗结束的 14

日仅隔 1 天。这个决定的最后一条说“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因此，项英的问题没有最后解决，七次代表大会并没有提上日程进行讨论，八次代表大会也没有讨论，后来一直到 1987 年的十三次代表大会都没有讨论。现时只好让中国党史学家去议论了。至于我个人，很难有什么意见。

北线第一个大胜利

杨斯德*

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和地方武装举行淮海战役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这一战役中，我军共歼敌55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使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暴露在我军的直接威胁之下。1948年11月8日，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率该部1个军部3个半师共23000余人于徐州东北贾汪地区起义，使我军得以迅速穿过该部防区，切断正在西撤中的黄百韬兵团与徐州之敌的联系，继而包围并歼灭了该兵团，顺利实现了我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企图。这次起义的成功，是我党对该部长期工作的结果，是华野领导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在强大的军事形势配合下，依靠政治争取取得的胜利，它对赢得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曾在致该部的贺电中称这次起义

* 作者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淮海战役期间，任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兼民运部长。

“极有助于革命战争的发展”，说它是淮海战役的“第一个大胜利”。

—

1948年秋冬之交，解放战争已进行了3个年头，我人民解放军在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之后，在全国各战场上转入了全面反攻。国民党军队的5个战略集团被我军牵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5个战场上，陷于被动挨打境地。华东我军连续取得了豫东战役、济南战役的胜利。济南的解放极大地震动了华东守敌。徐州“剿总”刘峙所部奉蒋介石的命令，急忙收缩兵力，并以徐州为中心，在津浦路临城至蚌埠、陇海路郑州至海州段形成“一点两线”的部署，妄图依靠这一地区的坚固工事固守，并凭借发达的交通线机动，寻机同我决战。济南战役之后，我军即决定举行淮海战役，由华野、中野及地方武装协同作战，全歼刘峙集团，以实现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关于歼灭敌军主力于长江以北的战略设想。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规定：“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当时黄兵团驻运河东新安镇至海州一带，战役开始前奉命向徐州收缩。要实现“中间突破”，歼灭黄百韬兵团，割断黄兵团与徐州之敌的联系，分割包围黄兵团是夺取胜利的关键。

当时，国民党第三绥靖区驻守徐州东北韩庄至台儿庄

运河沿岸，其任务是利用运河一线既设工事固守以屏障徐州，同时保障黄百韬兵团与徐州之敌的联系。因此，要实现战役第一阶段的企图，就必须或者歼灭该部，或者争取其起义，为我军让开通道，以便迅速通过该部防区，切断黄百韬兵团与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的联系。

第三绥靖区辖第五十九、七十七两个军共四个师，原是冯玉祥西北军一部。抗日战争爆发后，该部在卢沟桥、大名、台儿庄各次战役中英勇作战，赢得了人民的尊敬。但是这支部队在国民党军队中却一贯倍受歧视和排挤。抗战期间，该部长期驻国民党第五战区第一线，兵员得不到补充，武器弹药、粮饷供给也受到百般刁难。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又把该部派到内战前线，以达到既利用其打击我军，又消耗杂牌军的目的。该部官兵中反蒋厌战情绪十分强烈。济南战役后，刘峙担心这支部队步吴化文后尘，强令该部所属之一三二师撤出徐州城内，代之以李弥部队。同时强令该部家属全部迁往江南，意在留作人质。战争形势的急转直下和蒋集团的猜忌排挤，使该部官兵中悲观不满情绪日益严重，普遍感到大势已去，人人自危。华野领导分析了当时全国以及华东战场形势、该部官兵的思想情况和我党在该部已有的工作状况，遂决定采取通过积极工作、力争该部起义的方针，以配合我军第一阶段行动。并派我以陈毅司令员代表的身份执行这一任务。

二

1948年，我在华野十三纵队政治部任联络部长兼民运部长。9月，济南战役前，接到上级通知，要我到华东军区所在地益都受领新的任务。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在向我布置任务时指出，华野和中野要配合打一次大的战役，歼灭以徐州为中心的刘峙集团，为了配合这次战役，要策动驻徐州东北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部队在战役开始时起义。我的任务是以陈毅司令员代表的身份去向与我党久有关系的何基沣、张克侠将军传达陈总指示，了解历年来我党在该部工作的情况，摸清该部高级将领的态度，争取该部一部或大部起义。舒同同志特别强调，陈毅司令员要求力争动员冯治安能和部队一起起义，以便扩大政治影响。受领任务后，我即赶到曲阜华野前指。在曲阜，陈士榘参谋长又向我介绍了敌军的态势及我军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意图，并和我研究了我军如何配合起义行动的问题。随后，我即经兖州、济宁，到达在滕县境内活动的鲁中南军区前线办事处，由办事处敌工科副科长孙秉超同志陪同，经第三绥靖区七十七军三十七师张兆芙的一一一团防地，秘密进入贾汪，与何、张两将军取得了联系，分别向他们转达了陈毅司令员的问候和指示，并同他们研究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问题。为了保密和活动方便，我化名陈惠国，为该部高参，孙秉超化名李梦云，以我的秘书名义出现。

何基沔当时在贾汪，为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兼前方指挥所主任。在我转达陈毅司令员指示后，他表示决心率部起义，并认为七十七军大部较有把握，但有些军官尚有疑虑，需要深入做工作。五十九军困难较大些，张克侠当时在徐州，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兼徐州市城防司令，他表示要继续做五十九军的工作。他认为冯治安顾虑较大，说服冯较困难，但他仍表示将尽量动员冯同部队一道起义。

根据何、张两将军及其他一些军官的态度、确定以七十七军一三二师及三十七师一一一团为基础准备起义，同时力争五十九军共同行动，并研究了最困难的预备方案。为了保证起义的准备工作顺利进行，按行前计划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我为负责人，成员有孙秉超，何基沔的副官、地下党员李连城，一一一团三营营长、地下党员王世江，二营炮连连长、地下党员冯治中，随即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

作。首先是摸清主要军官的态度，并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工作。当时，第三绥靖区中高级军官的思想大致可分为4种。第一种是以何基沔、张克侠为代表的进步分子，政治上倾向我们，并掌握着一定的实权，是我们的依靠力量。第二种是不满足于蒋集团的独裁内战政策，同时看到大势已去，出于个人和团体利益而想另谋出路，但对我党、我军的政策疑虑重重。我们工作的重心实际上是这一部分人。一般是由何基沔先分别找人谈话，然后我再出面。主要内容是分析形势，使他们认清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

非正义性，因而注定要失败，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只有加入人民的行列，才有光明的前途。同时，针对他们的顾虑，着重宣传我党、我军对起义部队的政策，保证起义后成建制改编为我军，列入正式序列，军官保留原职，消除他们的顾虑，坚定他们的信心。当然对于坚定的进步分子，也有一个阐明政策、解除顾虑、坚定信心的问题。第三种是对蒋集团的排斥异己虽有不满情绪，但是对蒋集团仍有很大幻想，又特别迷恋旧的生活方式，如冯治安、王长海、刘振三等。动员他们起义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也设法尽了一切努力。第四种是以副司令李文田、参谋长陈继淹为代表的顽固分子，主要是特务、政工人员，他们是起义的主要阻力和危险。我们对他们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

其次是安置家属。如前所述，当年10月蒋介石已下令将该部军官家属全部迁往江南留作人质。担心起义后家属受迫害，衣食无着落，是军官们的普遍顾虑。安置好家属已成了促成起义的关键问题之一。因我去时并未随身携带钱款，由何基沣先拿出自己积蓄的百两黄金，派专人分赴江南安置主官家属（起义后，华野偿还了何所用的款项），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何基沣、张克侠两人的家属当时均在北平，后经华野电告中央，中央命北平地下党将他们安全接出，护送至解放区。

再次是必须确保行动时通讯联系畅通而保密。国民党对杂牌部队素有戒心，这些部队中的通讯部门都是国民党

军事交通部门派来的，负有监视、控制杂牌部队的任务。如果不能切实控制通讯部门，就无法取得起义成功。为此我们专门下力气做了该部总部通信主任樊云门的工作。其后樊在起义中表现较好，起了重要作用。

三

我在贾汪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摸清了第三绥靖区主要军官的态度并做了初步的宣传、组织工作。根据我的调查和初步工作情况，我认为，华野领导关于争取这支部队一部或大部起义的意图是可以实现的。10月底，我返回曲阜，向粟裕代司令员、陈士榘参谋长汇报。粟裕、陈士榘两位首长听取了我的汇报后指出，战役将在11月8日发起，届时将由七纵、十纵、十三纵从三绥区正面渡运河南进，分隔徐州同黄百韬兵团的联系。要求何、张部按计划战役发起时起义，让开运河防线，并力争控制运河上桥梁，以便确保我军顺利渡河。同时，还研究了联络方式、夜间识别标志、开进路线以及我方几个干部的位置。决定：起义部队联络口令为“杨斯德部队”，夜间反穿棉衣，手电明灭3次；起义后分两路开向解放区，一路由韩庄至兰陵，另一路由台儿庄至兰陵；起义时，我在指挥所协助何、张统筹指挥，孙秉超在过家芳师，李连城在一一一团。粟、陈首长并强调要向他们重申对起义官兵的政策一定兑现，决不食言。

11月初，我与孙秉超同志经韩庄一一一团三营再度进入贾汪。在三营短暂逗留时，我告三营营长王世江同志，我军行动在即，请他早做准备。王世江同志的老母亲当时在徐州，他原曾提出希望地下党组织能在起义前将老人接往解放区。但因为时间紧迫，已无法办到。王世江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态度很坚定，表示一切服从党的决定，坚决按时起义。我到贾汪后，随即向何基沣传达了华野首长指示，但未告战役发起的具体时间，只是暗示他速做准备。此后，我方几名同志即分别进入预定位置，起义的组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

组织起义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始至终充满着斗争。随着战役发起时间日益迫近，斗争也越来越尖锐。10月下旬，华东我军各部开始向南移动，徐州外围形势益见紧张。三绥区内中下层军官另谋出路的要求日益强烈。何基沣、张克侠均希望尽快行动。五十九军军长刘振三，劝冯治安把部队拉走，为冯拒绝后一气之下离队到上海。冯治安及七十七军军长王长海等人仍想顽抗，于10月下旬开始调整部署，加强运河一线火器、兵力，准备凭河坚守。同时还以封官许愿等方式笼络部属，力图稳住部队。10月底冯治安从南京匆忙返徐，先后找一八〇师师长崔振伦及一三二师师长过家芳谈话，默许崔、过将来接替两军军长。此前崔振伦及三十八师师长杨干三曾向孟绍濂表示同意起义，至此时，崔又发生动摇，并影响到杨干三的态度。经孟绍濂再三劝说，崔、杨仍犹豫不决。其实这种反复也很

自然。必须指出，这支部队虽然是西北军旧部，在历史上曾受我党影响；虽然该部官兵对蒋集团排斥歧视怨恨不已，但它终究是一支旧军队，要使它下决心脱离反动营垒，站到人民一边来，不经过斗争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军适时攻取万年闸的战斗，对于促使该部起义起了很大作用。

至11月6日，我们正式通知何、张起义日期。而此时五十九军态度仍未明朗。我同何基沣等紧急议定，派孙秉超同志再次返回部队（十纵）报告，待我部队行动时，如三绥区前沿部队仍未起义，就采取果断行动。同时请我军对五十九军施加压力，以配合内部争取工作，促其起义。

此前，11月4日，华野司令部下达了战役进攻命令。各部队正兼程赶赴攻击出发地域。5日，北线右翼十纵已过滕县、官桥，正向韩庄急进。6日夜，十纵宋时轮司令员和刘培善政委因看地形误入敌前沿，幸为——一团三营防区，营长王世江同志当即向宋时轮、刘培善同志报告了地下党员身份，随即奉命提前起义。同时，七纵、十三纵分别进逼万年闸、台儿庄。至7日，三绥区一线守军连连报告我军动作异常，尤以发现我军准备帆布船后，即判定我即将开始渡河战斗。三绥区贾汪指挥所内气氛立见紧张，五十九军军部内也明显惊慌。7日夜，我七纵开始渡河战斗。二十一师于8日晨2时许攻占万年闸桥北阵地，五十九军一八〇师五三九团一个营部分被歼，余部撤至南岸，我二十一师即完全控制万年闸南北两桥。万年闸以西我十九师也已强渡成功，并在万年闸至韩庄间架起几道桥，大部队正源

源渡河。万年闸以东，我十三纵业已包围台儿庄，逼近桥头。五十九军三十八师连连告急，运河全线动摇。万年闸失守后，冯治安严辞切责，限时夺回，否则将对参谋长刘景岳及杨、崔等“军法从事”。至此，五十九军原本动摇的军官在我军事压力及冯的严令下已慌乱无主张。7日夜8日凌晨，经孟绍濂再次工作，五十九军参谋长、副参谋长、两师长及各处处长均决心起义。于是何基沣来到五十九军军部，对当时在场军官讲话。何从该部历史上在喜峰口、卢沟桥抗战说起，历述该部如何英勇抗战，牺牲惨重，又如何受蒋嫡系排斥歧视，部队越编越少，供给越来越差，讲到动情之处，声泪俱下。同时明确提出和我军联系，退出内战。在场的军官十分激动，均表示愿意起义。但因何与五十九军渊源不深，众军官对与何共事尚感忐忑，何亦自知这一点，随即宣布张克侠即将来前线，与五十九军同行，人心于是安定下来。接着，由何基沣签署了部队向解放区开拔的命令，并有孟、崔、杨等人副署（杨不在场，由副参谋长顾相贞以电话征其同意）。虽然如此，但因除孟绍濂外，其他人尚不知我在贾汪，均担心如何与我军取得联系。于是按计划，何让副官处长关宪昌接我到五十九军军部讲话。这些人都是第一次见到共产党代表，又是面临决定命运的关头，因此见面时态度严肃而略显局促。我介绍了当时全国的战争形势，并详细说明了我党我军对起义官兵的政策。在场的军官终于打消了顾虑，同我握手，气氛十分热烈。

五十九军问题解决得出人意料地顺利，令人兴奋。何基沔随即给过家芳打电话，告他按计划行动。我则给张克侠打电话，请他尽快离徐来贾汪，并尽最后努力争取冯治安能同来。当时张正在冯处开会，无法明言。事后张讲，起义前他曾数度劝冯早定大计，另谋出路，但冯终不能抛弃对蒋的幻想，不能舍弃旧的生活方式，始终未下决心。至8日凌晨，张克侠冒险乘车离徐，经一三二师到贾汪。

给张克侠打过电话之后，我同何基沔决定一切仍可按原计划进行，待张到后下午2时开始行动。由张先率五十九军从东路北行，七十七军部队为西路，何同我最后率指挥所向东沿五十九军路线行动。当时急需将情况报告我军，以便取得配合。因孙秉超同志已返回部队，我便带一部电话、两个电话兵乘何的吉普车到万年闸，与我方接通电话。很快便要到七纵成钧司令员，我向他简要报告了情况，请他迅即报告陈毅司令员并请指示。成钧同志很快回复说陈总指示仍要尽力争取冯治安一同行动，以便扩大政治影响。随后成钧同志派一营教导员，由我带着同五十九军接通联系。

遵照陈毅司令员指示，我们为争取冯治安尽了最后努力，由何基沔亲自打电话，请冯到贾汪指挥部队，并派车去接。但冯终于没有来。在行动开始时，我们派车把冯的东西送往徐州，对冯做到仁至义尽。事后冯治安到刘峙和蒋介石处请罪，痛哭流涕，请求处分。蒋为使三绥区残部继续卖命，当即又给了冯原两军番号，要他另组部队。直

到黄百韬兵团被歼后，蒋又迁怒，撤销了冯部两个军番号。

8日晨，张克侠来到贾汪，立即到五十九军军部讲话，然后即率五十九军军部按预定路线行动。贾汪指挥所随即也开始行动。指挥所各处均表示愿随何行动。樊云门按计划带人制服了蒋嫡系交通部门派来的通讯人员，控制了电台，管制了通讯，切断了各部对外联系。原本令人担心的是教育长刘自珍所率“干训团”两千余人，但在形势急转直下的时候，刘的态度也转变了，终于率部共同行动。

下午2点，何基沣对贾汪指挥所及干训团官兵讲了话，随即出发，向东沿五十九军行进路线开进。此前，三十八师已与我十三纵取得联络；一三二师及三十七师的一一一团也先后按计划行动，与我十纵取得联络。至9日夜10日凌晨，起义部队全部渡过运河，并相互取得了联系。至此，国民党第三绥靖区1个军部3个半师共23000余官兵，从国民党营垒中解放出来，加入了人民的队伍，开始了新的征程。这支部队起义，对我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具有重大作用。粟裕同志曾说：“我南下部队如在贾汪耽误4个小时，黄百韬就可能退到徐州，那战局就不一样了。”由于该部起义，为我开放了台儿庄至微山湖运河防线，使华野3个纵队迅速渡过运河，并迫敌徐州“剿总”急调掩护黄兵团西撤的李弥兵团回防徐州，从而又让开了不老河防线；使我军得以在无敌火力威胁的情况下渡过不老河，于9、10日完全截断了黄、李兵团之联系，并威逼徐州。同时我东线追击黄百韬兵团部队完成了对该敌包围，顺利实现了军委、

华野第一阶段的作战企图，对取得歼灭黄百韬兵团这一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其次，这支部队在战役发起时起义，一下打乱了国民党“徐蚌会战”的部署，对蒋军官兵思想震动很大，直接引起他们的心理动摇。杜聿明曾说，他是在从北平赴徐州接任指挥职务前听到这一消息的，当时他是“怀着上刑场的心情上战场的”。同时，由于这支部队是西北军所余最后一支主要力量，它的起义表明，国民党营垒内部已到了分崩离析、众叛亲离的地步。

四

国民党第三绥靖区贾汪起义成功决不是偶然的，这是我党在该部长期工作的结果，是华野前委和首长正确组织指挥的结果。

该部原系西北军，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即派出刘伯坚、邓小平同志协助冯玉祥将军在部队中开展政治工作，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抗战爆发时，该部是宋哲元的二十九军，驻守北平，曾在卢沟桥奋勇抗击日军进攻，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的第一枪。其时，我党对该部的爱国行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大力支持。1938年，我党应何基沣的要求，从延安派出一批干部，到该部（时为第三十三集团军，驻鄂西北）七十七军工作，并成立了党的工委，受中原局领导。负责领导该部党的工作的先后有：朱军、邱

静山、王西萍、布凤友、张执一等同志。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该部同我新四军第五师保持了友好合作关系。我党还帮助该部培训基层军官，传授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新四军第五师还为该部护送过武器辎重。该部则为我过路干部、家属提供方便，并曾支援五师寒衣费两万余元。1938年至1939年间，何基沣在我党协助下，先后组织了“七十七军工作团”和一七九师搜索队，分别由我地下党负责同志朱军和我中原局友军工作部驻鄂西北代表王西萍同志领导。后因形势所迫，这两支力量均撤入我根据地。“七十七军工作团”编为我鄂豫边挺进支队（新四军第五师前身）第三团，一七九师搜索队则成为陶铸同志领导的鄂中武装的骨干。1940年何基沣被调到重庆受到国民党审查，我在该部的党组织被迫撤退，该部同我党联系也一度中断。抗战胜利，该部调往徐州地区后，新四军第五师领导立即设法恢复同该部的联系。原从该部撤出的地下党员，第五师某部营长李连城同志奉李先念同志之命，冒险回到该部，恢复了与该部的联系。解放战争初期，中原军区部队突围后，对该部的工作经中共中央批准改由华东野战军负责。华野在该部建立了秘密支部，并在鲁中南军区设立了鲁南前线办事处，负责对该部的工作。办事处敌工科副科长孙秉超同志建立了进出该部的安全交通线，并具体负责与何、张间的联系，徐州市委还积极开展了对该部的政治宣传工作。此外，华东局、中原野战军也在该部五十九军及随营学校“自忠中学”中开展了工作。这些工作，在该部起义的关键

时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中我党工委发展的党员，我党领导下的军训团培养的干部以及华东局、中野派入的干部及地下关系，均在起义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者、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何基沔、张克侠两将军是我党特别党员，他们在我党的领导下，平时即在官兵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最后关头，他们在官兵中的威望和影响对起义的成功具有关键的作用。何、张两将军是该部著名的爱国进步将领，后来成为我党党员，并曾得到我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教育。何基沔同志在抗战初期曾先后直接指挥了卢沟桥、大名保卫战。大名失守之后，他因痛于寇深祸亟、报国无门而拔枪自戕，以死明志，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后幸而被救。1938年春，何基沔同志在武汉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赞扬他是“卢沟桥上坚决抗日的将军”，并根据他的要求，安排他去了延安。在武汉和延安1个多月的时间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都亲自做他的工作，使他深受教益，认识到中国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诚恳要求留在延安工作，后按照中央领导的意见仍回旧部。根据他的表现和他个人意愿，我党于1939年初吸收他为特别党员。当将决定通知他时，他深庆自己有了光荣的归宿，表示要为党的事业贡献一切。何在部队中的进步言行，招致国民党内一些右派当权人物的猜忌。1939年底，我党鄂西北省委委员、分管友军工作的项乃光叛变，供出何支援我新四军钱、枪的情况，国民党当局调他去重庆审查。他在极端

险恶的形势下，首先报告党组织，从容安排党员、进步分子撤退。为了保全党在该部的工作成果，他冒着生命危险应召赴重庆，并以大无畏的精神和机智的策略挫败了右派的阴谋，脱险回到部队。解放战争初期，何以保存实力为借口，力阻冯治安派兵进攻解放区。后因向我军进攻不力，被撤去七十七军军长职务，任三绥区副司令，解除了兵权。1946年秋，何父在北平去世，正在北平的军调部我方首席代表叶剑英同志亲临致祭。叶剑英同志向何传达了中央指示，勉励他继续留在国民党军中工作。何基沄同志不负党的重托，在军官中开展联络，在部队中进行反内战的宣传，为后来起义的成功打下了基础。何为人正派，作风朴素，平时带兵严，有声威，有号召力，该部的军官对他大多敬而畏之。在起义的紧张时刻，他果断细致地处理了各种复杂情况，成功地实现了预想计划。张克侠同志历任该部师、军、集团军参谋长。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即向往真理，拥护我党主张。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与党保持着联系。解放战争初期曾在华东前线和南京先后秘密向陈毅、周恩来同志汇报，接受了他们的指示。他与何基沄一道，以保存实力为借口，坚决反对冯治安派部队进攻解放区。他曾积极参与策动郝鹏举部起义。他还利用兼任徐州城防司令之便，主动向我军提供徐州城防地图。他在该部长期抓军官教育工作，在军官中宣传进步思想。他为人正直，严于律己，加之足智多谋，在该部上下声望很高，尤其是与五十九军渊源较深，可以起左右局势的作用。冯治

安平时对张防范很严，长期将他留在徐州，使他脱离部队。但因张是冯玉祥的连襟，所以冯也无可奈何。张在起义前即在军中宣传进步思想，在五十九军军官中进行联络，对五十九军最后决心起义起了关键作用。他在困难的处境中为动员冯治安尽了最大努力。三绥区其他一些进步将领，如五十九军副军长孟绍濂、一三二师师长过家芳等，也都为起义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为起义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一些曾经犹豫动摇的将领，在关键时刻，也终于作出了正确的抉择，为起义的成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还应指出，我军在全国各战场上的胜利，在淮海战场上的有利态势，以及对国民党军起义官兵的政策感召力，也是促使该部起义的重要因素。1948年10月，张克侠曾赴北平亲晤傅作义了解华北局势，回徐州后即向各级军官打了招呼，告诉他们华北已无可挽回，要他们早做准备。10月底11月初，辽沈战役已近尾声，东北全境解放，我军即将入关。华东、中原战场上，9月我华野举行济南战役，除青岛外山东全境解放。10月我中野解放郑州、开封。徐州刘峙集团已处在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威胁之下。当时第三绥靖区的军官普遍收听新华社广播，对战争形势是明了的。他们明白，我党在全国的胜利和国民党统治的彻底崩溃已经为期不远了。一切有正义感的及不愿与国民党反动集团同归于尽的人都必须作出最后的抉择。三绥区部队在国民党军中历来被视为杂牌，饱受歧视与排挤，官兵们对蒋的中央都是离心离德的。在国民党统治还稳固的时候，

他们没有能分得一杯羹，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行将覆亡的时刻，又把该部推到第一线，因而广大官兵的反蒋厌战情绪愈加强烈。济南战役后，该部广大官兵纷纷议论，说下一个被歼灭的就是他们。而济南战役中我军对起义的吴化文部实行保留原建制改编的政策，对该部官兵尤其是中高级军官有很大影响。他们感到，起义有保全自己团体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我华野前委和首长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淮海战役作战方针的指示，确定了在北线山东兵团3个纵队行动的配合下，依靠我党在该部长期工作的基础进行政治争取促其起义的方针，充分运用政策的力量，经过周密的组织指挥，使起义一举成功。

1948年11月28日，何基沣、张克侠率三绥区起义将领通电全国，强烈谴责蒋介石集团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呼吁蒋军官兵与蒋介石集团决裂。12月9日，陈毅、张云逸、粟裕、谭震林复电慰勉该部全体起义官兵。10日，毛主席、朱总司令也电慰全体起义官兵，并指出该部在徐州前线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极有助于革命战争的发展”。

1949年2月，起义部队正式编入人民解放军行列。五十九军与渤海纵队合编为三十三军，张克侠任军长，韩念龙任政委；七十七军与苏北军区部队合编为三十四军，何基沣任军长，赵启明任政委。改编后即参加了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后三十四军驻守南京，三十三军担任淞沪警备任务。全国解放后，起义官兵在部队和地方各自的岗位上勤

勤恳地工作，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有不少同志在全国或地方政府、政协中担任了领导职务。现在，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何基沣、张克侠同志已相继去世，但他们以及广大起义官兵在中国面临两种命运决战的时刻为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将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他们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我军第一所炮兵学校的组建

郭化若

1944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转入大规模战略反攻的一年。欧洲战场，苏军给德军以连续毁灭性打击；太平洋战场，美军进逼马利亚纳群岛和菲律宾，并轰炸日本本土，日军在太平洋和中国战场上连连失利。我国抗日战争已度过了最艰难的相持阶段，战略大反攻的阶段将要来临。我军的第一所炮兵学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大概是 11 月底的一天，天气很冷，我接到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的通知，说贺龙司令员约我去谈话。我知道一定是关于创办炮兵学校的事。因为 1 个月前贺老总给我打过招呼，说抗日战争就要转入战略反攻了，我军已开始进行攻占大城市和夺取交通要道的正规战，迫切需要加强炮兵力量，必须很快培养一大批炮兵干部，为此想调我去炮兵团工作。当时我军只有 1 个炮兵团，是 1937 年在红军山炮连基础上成立的，由于游击作战用不上，一直呆在南泥湾搞生产。我认为加快培养大批炮兵干部是具有战略眼光的作法，但靠炮兵团培养干部是很有限的，建议把炮兵团扩建成一所炮校。

我到了联防司令部接待室，还没有坐下来，贺老总就出来了，他握着我的手说：“化若同志，你提的建议军委批了。炮团改为炮校，由你当校长。”接着徐向前同志也来了，他是联防副司令。我们一起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认为炮兵干部很快就要派上用场，必须尽快建校，尽快开课。贺老总叼上烟斗，问我半年内开课怎么样，我说争取3个月就开课。接着研究了炮校班子的组成、开办经费、供应保障等问题。贺老总再三强调一要做好教员，二要做好学员，三要尽快开学，中间有什么困难，尽管找他。我建议由军委给各军区发个通知，筹建炮校要调教员、选学员，请他们支持。

第二天，我带着满脑子创办炮校的问题，打着背包进了南泥湾。我和炮兵团长邱创成进行了一次长谈，然后就一面找人谈话，了解和熟悉情况，一面铺开工作。因为在炮团基础上扩建炮校，除了我这个校长外，其他干部都是炮团的原班人马。邱创成同志任炮校政委；原炮团副团长匡裕民任副校长；原参谋长张志毅任训练部长；政治处改政治部，刘何任政治部主任；后勤处没变。成立炮校临时党委，进行了首长分工。我抓总，创成同志负责思想政治工作，裕民同志负责开学的物资准备。训练部负责教学计划、教材、教具、教学场地的准备；政治部负责调干和招生；后勤处负责物资保障工作。各个部门还成立了一些临时组织，如教材编写组、招生组、接待组等。我要求各部门按分工进行工作，每星期汇报一次进度，校主要领导坚

持天天碰头，有问题及时商量解决。

南泥湾号称“陕北江南”，山青水秀，土地肥沃。在这里办校有很多有利条件，山上可以砍柴，不缺烧的；炮团已搞了两年生产，储备了大量的粮食、蔬菜，暂时不缺吃的；炮团的同志挖了许多窑洞，住的地方也有。只是这里的水，是从山涧的枯枝败叶中流出的，吃了容易得一种大关节病。还出现过一个怪现象，有段时间，喂的猪突然死去，因此开始怀疑水有毒。后来我和饲养员仔细观察，才知道是乌鸦传染的病毒引起的。当地乌鸦很多，成群结队，它们在山上啄食了死人后，又飞来猪圈啄食猪食盆。我们每次喂猪，等猪吃饱了就把猪食盆收藏起来，就再也没有死猪了。

炮团的干部在我传达了上级关于创建炮校的指示精神后，对办好炮校的决心是很大的。但我去之前，有的干部对建立炮校不大理解，因为那时八路军、新四军的装备很简单，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说要发展炮兵，简直有点“天方夜谭”。当时炮兵干部没处安排，炮团教导营有近200名知识青年干部分不出去，再办炮校，干部不是积得更多吗？更大的问题是大部分干部在康生搞的“抢救运动”中受到冲击，90%的人被划为“两条心”干部，其中有个模范连的干部竟100%被打成了“特务分子”，有的干部还挨了打，相当多的干部不安心工作，有的打报告要求调动。针对这些情况，临时党委认真进行了分析研究，决定一是根据中央书记处5月13日关于纠正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的

指示，处理好整风中的遗留问题；二是加强形势教育，认清发展炮兵的战略意义。我在个别谈话的基础上，召开了干部大会，宣布了两条：一是凡属运动中搞错了的，一律予以平反；二是暂时还未完全查清的（实际只有2名干部），也不影响使用。我还给大家讲了国际形势和全国抗日战争形势，说明发展炮兵的必然性、重要性和培训炮兵干部的迫切性。炮团的干部思想基础都很好，文化素质也相对高一些，有不少在苏联学习过。大家工作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只是长期工作在基层，对全国的情况了解较少，中央的指示传达到这里也慢一些。道理讲清了，思想很容易打通。他们对我这个从总部派来的人很信任，我讲的话也能起作用。创成同志反映，说我讲话的第二天，有的人简直是换了个人，工作姿态、情绪都变了。有个参谋，叫徐昭，因父亲在国民党的煤窑上管财务，被打成了特务，整天愁眉不展。我就对他讲，一个人要经得起委屈，我也曾被错误地打成托派。他说：“你是总部来的，政策清楚，我相信你的话，包袱已经放下了。”这个干部以后一直表现不错。另外，这个炮团成立后，党中央、中央军委是很重视、很关心的，朱德、刘少奇同志来这里参观、视察过；周恩来同志亲自从武汉带来了炮队镜；毛泽东同志在炮团成立1周年时还送了锦旗，写了指示信，鼓励炮团全体官兵要努力学习政治军事，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有力兵团，达成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之目的，“为民族争光荣，为八路军争模范。”回顾炮团的历史，大家都很激动，他们说，党中央、中央

军委这样重视炮兵建设，现在炮兵要发展，怎么不叫人高兴呢？为了尽快培养大批炮兵干部，拼上命也要把炮校办起来。有的同志还说：“我要干一辈子炮兵，调我走也不走了。”

不久，中央军委下达了炮校班子和任职命令，炮校牌子也就正式挂起来了。12月6日，中央军委专门为创办炮校一事给各军区并转各分区发了电报指示：“军委为了准备反攻，准备加强我军装备，俾能由游击战转到运动战，由乡村打进城市，决定创办炮兵学校，立即训练大批炮兵干部，并决定在边区全党全军动员党员与干部去学习炮兵。望你们即在前方搜集炮兵人才、器材、书籍等送延安参谋部。这是政治任务与战略任务，望各军区负责人认真执行为要。”电报强调“立即训练大批炮兵干部”，“这是政治任务和战略任务”，可见把创办炮校摆的位置很高，时间要求很急。军委电报对我们是支持，是鼓舞，更是鞭策，筹备工作要求更快地进行。

隆冬的“陕北江南”，到处冰封雪盖，但炮校园内却显得春意盎然，开学准备工作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着。教员问题，由炮团教导营选出了10多名，“抗大”三分校及后来军事学院的教员情况我熟悉，能任炮兵教员的人选我很清楚，要过来一部分。每个教员我都谈话，提出要求，生活方面请后勤的同志尽量给予照顾，有的教员放下包袱就投入了工作。教材问题，当时收集到一些零散的日军的、苏军的、还有阎锡山的晋军的，但都残缺不全，只能依靠自

编。于是分别召开了兵器、基础理论、战役战术教研组会议，我和他们一起研究好提纲，分头着手编写，最后由我定稿。开学前总算编出了一套教材，在印刷上也下了功夫，搞得比较精美。教学器材很缺乏，只有10多门山炮，有几门是阎锡山仿造的“41”式，有几门是日本“13”式，都是老掉牙的。我要训练部的同志抓紧抢修，并做好实弹射击的准备。教学场地、黑板、桌椅板凳问题，由后勤的同志负责解决。校园内许多窑洞的灯光通宵不灭，我有空就到处走走，请大家注意劳逸结合。可是一些干部总是说，想到炮兵要发展，越干越有劲。有的还说：“校长，你劝我们休息，你自己也不要累坏了。我们见你也一天天瘦了。”那时候的干部都很单纯，互相关心，互相体贴，一个心眼干革命。邱创成同志带着政治部的同志也很忙，他们派出一些同志到各军区去选干、选学员，一部分同志清查运动中的遗留问题。另外，原炮团几百名战士，一部分选为炮校学员，一部分继续为炮校做饭、喂猪、站岗放哨，有许多思想工作要做。当时一些基层干部都担心战士想当学员不愿当炊事员，会闹矛盾。但是经过动员教育，全团战士带上背包紧急集合，当场宣布名单，由各单位带走，没有一个不服从命令，没有一个闹情绪的，表现出非常高的觉悟。

各军区、军分区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后，都很重视，很快从“抗大”总校、七分校，延属分区各机关和陕甘宁边区各旅，选拔了许多优秀学生和干部来炮校学习和工作。到1945年2月中旬，正好3个月，调来的干部和学员陆续到

齐了。于是召开全校军人大会，我做了第一次编队动员。全校编为3个炮兵大队：第一大队队长张志毅（兼），副队长邵明银；第二大队队长宋承志（兼），政委张英，副队长江共；第三大队队长张量，政委文击。3个大队下设9个炮兵队。除了3个炮兵大队外，还有1个工兵科，主任是唐哲民，副主任韩连生；1个迫击炮队，队长是赵章成。另外，还有1个秘书室，1个警卫连，全校共1300余人。

一切准备就绪后，我向贺老总作了汇报。他非常高兴，笑得胡子都不停地抖动。他说：“这样快就办起来了，真漂亮，真痛快。”我说这和中央军委及联司首长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我这句话一点也不是恭维，是实话。因为当时前线战事很紧，谁能把办炮校的事看得那么重？没有中央军委的重视和支持，光调干、调学员都不知要拖到猴年马月呢。贺老总说：“还有啥子事要我做的，尽管说吧。”我请示举行开学典礼，贺老总说，这是件大事，要报告，我马上办。他给朱总司令通了电话，朱德同志在电话里也高兴地说，没想到这么快就可以开学了。现在党中央正在准备开七大，都抽不开身，炮校可以先开课，开学典礼等七大后再补。我又向贺老总汇报了学校下一步的工作打算。临行时，贺老总笑呵呵地说：“你是我军大大的功臣。不过，我看你的气色不太好，可能是这一阵累的，一定要注意休息。”

为了提高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带着敌情练兵，2月底进行了一次实弹射击。选择一个山头做为假设阵地，并做了一些草人作为假设的日本鬼子。射击时，由神炮手赵章成

进行了迫击炮射击表演。山炮射击，由我指挥，原炮团的干部战士操作，由于当时炮弹很紧张，只打了两个齐射，打的是间接射击，从校正射到齐射都打得不错，命中率、覆盖率都很正常。射击后组织学员参观，使他们增加了炮兵的感性知识，有的学员说：“一定要好好学习，让日本鬼子好好尝尝中国的铁拳头。”

3月14日，再次召开了全校军人大会，我做了第二次编队动员，传达了全期8个月的训练计划。要求大家克服困难，为革命而学习炮兵知识，要学习革命最需要的东西。会后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学习热潮，出现许多好人好事。到这个时候，我确实感到有点累了，常常感到头晕，腰酸背胀，四肢无力。但我看到大家学习劲头那么足，又得到莫大的安慰。我虽然为筹建炮校跑了几个月，但做的工作毕竟是有限的，原炮团的同志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这些同志在创办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没有这个集体的努力，炮校的创办是不会这么顺利的，他们才是“大大的功臣”。

4月中旬，我带着炮校排以上干部到延安参加“七大”，毛主席还抽空单独接见了炮校的干部，勉励大家要认清形势，为了展开抗日战略反攻，努力学习炮兵专业知识，将来象种籽一样到各个部队去生根开花结果。不幸的是“七大”没有开完，我就病倒住进了医院，一连18天昏迷不醒。以后医生告诉我，得的是全身衰弱症。我身在医院，心在炮校，非常思念炮校。炮校的同志也很关心我，他们常来医院谈炮校的情况，谈工作。6月中旬，中央军委调朱瑞同

志任代理校长，他也常来医院商讨工作。11月底，炮校奉命迁往沈阳，我仍住在医院。直到1946年3月22日，朱瑞、创成、裕民、继钢、登涛同志还从东北给我发来电报：“极盼你快点回来主持校政，你的病情如何？我们在念。”但我的病仍然未好。可爱的炮校，留给我的的是美好的记忆，但以后再也没能回炮校工作了。

（执笔：樊昊）

1973年周恩来回延安*

刘 静

总理要回延安来了

周总理要回延安来了。尽管上边一再通知要保密，但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延安城乡，传到了安塞、子长、甘泉、延川……年逾花甲的老人、正在田间劳动的社员、很少出门的老大娘、正在上学的中小學生……一齐从四面八方涌进了延安城。天还没有亮，就伫立在街道两旁，从飞机场到延安宾馆，从宾馆到南关招待所，堵得水泄不通。交通警察手持喇叭筒不停地踱来踱去，喊着不要下街道，但很少有人理睬，前拥后挤始终安静不下来。等候在街头的数以万计的人群，共同怀着一个心情，都想抢前一步靠公路、靠街道近一些，待总理坐的车子穿过时，能够看一眼在艰苦岁月里和延安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亲人、延安人民的贴心人——敬爱的周总理。

* 此文为《延安一日》征文。作者曾在延安工作、生活了20年。1973年周恩来回延安时，作者在延安地委工作，参加了周恩来在延安23小时的活动。

组织起来到飞机场欢迎的队伍，举着彩旗敲着锣鼓，昂首阔步地穿过延安大街、延河大桥，直奔飞机场。站在街道两旁的人群，以十分羡慕的目光注视着他们，贴耳相语：“他们多幸福呀，我们要是也能到飞机场去欢迎总理，那该有多好呀！”

延安宾馆和南关招待所的工作人员熬了几个通宵后，神情十分紧张而愉快，不时来到传达室门口，探头探脑向外张望，焦急地等待着总理的到来。

1973年6月9日，延安人民完全沉浸在无限欢乐之中。

“我回到老家来了”

大约10时左右，一架银白色的飞机出现在宝塔山的上空，全城顿时沸腾起来。“总理回来了！总理回来了！”的欢呼声震撼山谷。集聚在街道两旁的人群不约而同地昂首招手致意。少许，飞机徐徐降落；机舱门一开，第一个走出来的就是敬爱的周总理。他站在舷梯最高的一个台阶上，满面笑容，频频举手，向延安人民致意。他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情不自禁地连声喊道：“我回到老家来了，我回到老家来了！”从1947年3月蒋介石胡宗南进攻延安，他和毛主席一起撤离延安，到这次回来已有26个年头了。“回老家”三个朴素而亲切的字眼，蕴寓着总理对延安人民多么真挚多么深厚的感情！

总理徐徐步下舷梯，在停机坪上和前来欢迎他的省、地、市党政军负责同志一一握手。刹时，锣鼓声、口号声响彻云霄。戴着红领巾的少年儿童们穿着最心爱的裙衫，手捧鲜花，上前献给了总理。伴着锣鼓声，人们不停地喊道：“欢迎总理！欢迎总理！”这欢呼声道出了150万延安人民的心声。总理乘车穿过机场，已经走得很远了，欢呼声还在山谷里回荡。

飞机场平静下来了，公路两旁、街道两旁又沸腾起来了。鼓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几万双眼睛，盯着一个方向，盯着迎面驶来的一辆辆轿车，人们伸长了脖子仔细地看呀看，看哪一辆车里坐着敬爱的周总理。向来以讲礼貌守纪律著称的延安人民，再也顾不了那许多，前挤后拥地一齐拥下了人行道，宽敞的公路、街道突然变得狭窄起来。平时从飞机场到延安宾馆乘车只要几分钟，这一天花了20多分钟才驶到宾馆。车子过后，交通警察和被临时抽来维持秩序的民兵，才长嘘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今天的秩序真难维持。”其实，当总理乘坐的轿车从他们身旁驶过时，他们哪里在维持秩序，而是目不转睛地看总理，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职责。还是多亏了群众的自觉，不管他们如何热爱总理，想让总理的车开慢些，在公路上、街道上多停些时间，总还是让开了路，让车子顺利地驶过去了。让车子开慢些，何止是延安人民的心情，和人民骨肉相连的总理也想让车子开慢些，借此机会看看在艰苦的战斗岁月中同党和军队鱼水相依、患难与共的延安人民。事后，据

总理的随从人员讲，这几年他从来没有像在延安这样高兴过，他高兴终于实现了他许久想实现、然而因工作繁忙未能脱身的探家夙愿。

总理从不表白自己

总理在宾馆稍歇后，即步行到凤凰山麓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旧居参观。

凤凰山麓昔日是延安城一个偏僻的普通居民点。零星几排石窑洞，住着姓吴姓李的几户人家。小坡上杂草丛生，十分荒凉。1937年1月，毛主席从保安下来，搬进延安城，就借居在一家姓李的窑洞里。旁边有一个较大的院子，盖了两排平房，朱总司令和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住在那，一直住到1938年11月，才搬到杨家岭。党中央住在这里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这一段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逼蒋抗日，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托，从延安飞到西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进国内和平的实现；1937年4月党中央决定放弃土地革命政策，改为减租减息政策，将陕甘宁苏维埃政权改为抗日民主政权；8月召开洛川会议，公布抗日救国纲领，同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这一桩桩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决策，大都是在这个偏僻的普通居民点作出的。当时，周恩来是军委副主席，这些重大事件他都是参与了的。当总理

来到凤凰山麓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旧居时，讲解员紧跟在总理身旁，盼望总理能详细讲述他在这里所经历的一切。她看一看总理，回头又看一看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期望他们能提醒提醒总理。但等呀等，盼呀盼，直到总理离开凤凰山麓旧居，对他自己没有吐一个字。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完全理解讲解员的心情，但更了解总理。他们亲切地告诉讲解员：“总理走到哪都是宣传毛主席，从来不表白自己。”讲解员怀着失望然而却十分崇敬的心情，目送总理离开凤凰山麓旧居。

在南关招待所的谈话

约 11 时，总理驱车来到了南关招待所。原想总理到了招待所总该休息休息吧，没想到他一进会客室就同几位在场的地方上的同志滔滔不绝地攀谈起来，一直谈到开午饭。这次谈话，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

一件事是总理关心北京支延干部。1969 年来延安的北京知识青年约两万多名。为了加快延安建设步伐和加强对北京知识青年的教育培养，总理曾指示北京市委抽调 2700 多名干部来延安。谈话中总理首先问到的是在延安插队的知识青年和北京驻队干部的生活情况，并提出为更好地发挥北京支延干部的作用，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在县、区、社以及各部门可以兼副职。北京驻队干部原来都驻在大队、生产队，根据总理的指示，后来分别在地、县、社和各部门

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这不仅使北京支延干部对延安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和培养地方干部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而且密切了北京支延干部和当地干部之间的关系。很多同志离开延安后，还始终和延安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在各方面给延安以支援。

第二件事是关于总理侄子上大学的事。总理有一个侄子原在枣园插队，后经群众推荐上了大学。在谈话中，总理突然问在场的地方同志：“我的侄子是怎么上大学的？是不是因为是我的侄子你们庇护了他？”问得在场的地方同志无言以对。当时来延安插队的知识青年中有很多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弟，他们都是保密的，除个别同志外，其他地方同志并不完全知道。总理的侄子上没上大学他们也不清楚。总理这样一问，在场的同志都愣住了，踌躇了半晌后，揣测地回答说：“是群众推荐的。”但总理并不相信，下午到枣园参观时，约见了枣园大队党支部书记雷治富，又查问了这件事。雷治富向总理汇报了全大队北京插队知识青年的表现和历年推荐上大学的情况，说明上大学的不只是他一个，而是许多人，他也不是走得早的，而是走得晚的。总理听后，当着雷治富面讲道，他上大学回来，一定要他回到枣园来，继续接受锻炼，并为延安人民工作。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在京的很多老同志的子女统统下放到农村，身边无人照顾，由他亲自批准调回去不少人。敬爱的周总理，对别人是那样关心，却从不考虑自己，对自己的亲属要求得那样严格。

午餐——吃小米饭

午饭时间到了，总理走出会客室，约在场的几位地方同志和他一起就餐。餐桌上摆得很简单，四个菜二荤二素，主食是小米饭和乔面饅饅。到延安一定要吃“家乡饭”，这是由总理亲自安排的。在一般人看来，这好象是一件不足挂齿的生活琐事，其实，这正是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的生动体现。“陕北好地方，小米熬米汤”，这是在30年代艰苦岁月里和中国人民、延安人民战斗生活在一起的一位外国朋友对延安的赞颂。小米曾经是革命的象征，艰苦奋斗的象征，我们党正是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也正是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总理回延安吃小米干饭，喝小米稀粥，是寓意深长的。它告诉我们为了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论是身经百战的革命老战士，还是未来年轻的接班人，都永远不能忘记与人民同甘共苦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敬爱的周总理是保持艰苦奋斗优良传统、一心为党为人民、唯独没有自己的典范，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延安粮食翻了番我一定再回来！”

总理对延安人民的生活是十分关心的。1968年在“文

化大革命”最乱的时候，延安群众受了“四人帮”煽动进行激烈的武斗，是周总理明确指出，延安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在解放军的帮助下，两派很快实现了大联合。1970年当总理听到北京知识青年谈及解放20多年了，延安人民生活还很苦，文化很落后，封建包办婚姻仍很盛行时，他心里十分难过。就在这一年，由他亲自决定让中央各部直接帮助延安建设五小工业，以支援农业的发展；让北京市委抽2700名干部来延安帮助建设。也就是这一年，由总理决定从北京各大医院抽人组成医疗队，连续10年给延安老区人民看病，培养地方医务人员，发展延安地方医疗事业。到1971年，又由他亲自指定王震同志和霍士廉同志草拟了改变陕北面貌的规划……在不明底细的人看来，总理这次是专程陪外宾来的，其实，他“回老家”的真正目的是出自对延安人民的关心，对延安建设的关心。在进午餐的时候，他向延安地方同志详细询问延安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他关心种草、养羊、栽树，更关心粮食生产。他深思了半晌后，向延安的同志提出：“五年粮食翻一番，可以吗？”五年粮食翻一番，每年要净增20%，增产幅度够大的了，延安地方同志尽管有些胆怯，但完全理解总理的心情，还是答应下来：“我们一定努力办到。”刹时，总理发出了爽朗的笑声，并让服务员拿酒来，和省、地同志共同为延安粮食翻番而干杯。本来，总理当时已重病缠身，医生是不准他喝酒的，但当他看到延安地方同志有尽快改变延安落后面貌的决心时，完全不顾医生对他的禁忌，异常兴奋地说：

“延安五年粮食翻了番，我一定再来延安。”顿时餐厅里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人民为什么那样热爱周总理，从几百里路以外背着干粮徒步来延安欢迎总理，看望总理，从这里就可以找出答案。他事事处处都在关心着人民。他是延安人民的贴心人。

在宝塔山上的怀念

午饭后，正是下午1时。人们想总理总该休息一下吧。但总理是个不知疲倦的人，他又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秘密相约驱车上了宝塔山。在宝塔山的草坪上车子停下来，他健步登上宝塔前的古钟台。他挺立在古钟台的前沿，从东到西，从北到南，蓝家坪、杨家岭、王家坪、北关、南关、东关……俯瞰了延安全城。他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他在沉思，仿佛在回忆延安过去的一切。他更怀念千千万万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和在他身边工作过的牺牲了的普通战士和亲密战友。在宝塔旁他沉默许久之后，突然提出来要上清凉山去。清凉山汽车上不去，山又很陡，同志们劝他不要上去。但他却执意要上去，谁也说服不了他。后来还是因为陪同外宾参观的时间到了，才没有上去。总理要上清凉山干什么呢？以后才知道，1937年总理由延安到西安商谈国共合作后红军改编的问题，途经劳山遭土匪的袭击，有两位同志不幸牺牲了，埋在清凉山，他要上清凉山为这两位烈士扫墓。“不要忘记每一个对人民作过贡献的人”，总理是这样

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总理对革命同志的感情，就是这样真挚深厚。

“主席太孤单了”

从宝塔山下来，总理随即驱车到宾馆，同外国客人一齐出发，参观了延安纪念馆和杨家岭、枣园旧居，约见了30多年前的老邻居，和高同有一家合影留念，向枣园党支部书记雷治富了解了枣园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在延安纪念馆，他听讲解员唱了《游击队歌》和《南泥湾》。杨家岭、枣园都有他的旧居，按理讲，他回到老家来了，应该进他的旧居看看。说也奇怪，当外国客人问总理你住在什么地方时，总理却说他没有住过，绕过他的旧居走了。本来，周总理在延安的旧居一贯是开放的。总理得知后，在1970年邓大姐来延安时，总理却特意指示关闭了。他强调要宣传毛主席，宣传集体，宣传群众，反对宣传他自己。他主张宣传毛主席，但他不赞成宣传毛主席一个人。总理看了纪念馆陈列后，他的结论是“主席太孤单了”。晚上和省、地同志座谈时，特别提出这一点，亲自点了许多人，其中有陈毅、彭德怀、贺龙、徐向前、王若飞、刘志丹等，并表示他回到北京要亲自报告毛主席。在他点的人中有不少在当时已被林彪、“四人帮”打成“叛徒”、“反党分子”，有的还在受审查。周总理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尊重历史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为什么不给我向延安人民讲话的机会？”

周总理从1947年3月在战火纷飞中离开延安，到1973年7月回延安，有26年零4个月了。这次有机会重返延安，他该有多少话想对延安人民讲呀。但基于他这次来延安是陪外国客人，不便单独集会，也没有时间单独集会，因此，他很想借招待客人的酒席会表达他重回老家的心情。请总理讲话，本来延安地方同志早就作了安排的，但不知什么原因被取消了。事后，总理对这件事很不高兴，晚上和省、地负责同志座谈时，质问中央和省里的同志，你们为什么不给我向延安人民讲话的机会？这是谁决定的？在场的中央、省、地的同志都面面相觑，无言相对。接着总理以十分沉重的心情，一字一句地讲道：“延安人民用小米哺育了我们，全国解放24年了，延安的经济文化落后，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在延安你们不让我讲，在西安我一定要讲。”开始，总理提出要讲话谁都不知道要讲什么，原来总理是要向延安人民公开作“检讨”。在场的同志听了无不感到内疚，地方上没有把工作做好，总理不责备我们，反而责备自己。我们敬爱的总理，就是这样关心人民，对人民负责，严以律己。

送 别

7月11日晨，总理要走了。南关招待所的服务人员不约而同自动排成队为总理送行。总理亲切地和每一个服务人员握手告别。突然，有一个服务员噙着激动的泪花高喊希望总理再回延安来，总理紧紧地握住这位服务员的手，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掉了泪。总理离开招待所，穿过大街上成千上万送行的人群，穿过机场的欢送队伍，怀着依依惜别之情告别了延安。

总理在延安只逗留了短短23个小时，但他给延安人民留下的记忆却是永恒的。

陈延年同志二三事

徐彬如

我与陈延年同志 1925 年就相识了。当时，我是广东中山大学的党总支部书记，兼搞青年团学生运动，延年担任两广区委书记，直接抓我们的思想工作。我们经常向他汇报学生运动情况，他也不断给予指示，指导我们如何开展斗争。他作风深入，联系群众，对工作认真负责。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中山大学开群众大会，会后向他汇报时发现他对情况知道得一清二楚。我奇怪地问他：你是不是也参加了会议？又一次开会时，我看到他化了装站在群众中，我说，这一回可给我看到了。我们和右派斗争的一切经过，他都了如指掌。我们向他汇报工作，一点都不能掺假，只有老老实实地说实话。这种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时，戴季陶对陈独秀讲他想到广州当中山大学校长。但他不和我们商量不敢前来，因为那时左派势力已占优势。陈独秀给广东打了电报，说你们还是最好要戴季陶来，但要对他提条件。戴季陶自己也说：你们可以提条件，要我干什么，我一定照办。于是延年就代表共产党答应戴季陶来，并提出下列条件：我们党要抓政治思想工作，要组织

一个政治部，要设立一个政治教官。另一方面我们要派人接任教授，秘书长要由我们的人担任。那时，秘书长主要是管政治部和学生政治训练教材，主要由延年自己管。正式参加学校工作的有邓中夏、叶剑英。管宣传工作的是任德全，以后还有青年团的李秋石。恽代英是学生委员会的书记，管中山大学教员和学生的思想工作。我们青委各地委员会，主要由陈延年和任德全管。李济深后来当了政治部主任。还有邓中夏、叶剑英、苏兆征等党内去的一批人，在那里当训育教官、教务主任。陈独秀、苏振通后来当了秘书长。文学院院长是郭沫若。当时正值北伐，郭沫若不想当文学院院长，要求参加北伐。以后他就到政治部任宣传科科长。文学院院长空缺，延年就提议要鲁迅去干。那时鲁迅还在上海，我们通过教授、学生与他间接取得联系，并要戴季陶聘请鲁迅当文学院院长。

听说要鲁迅当院长，戴季陶提了一系列条件，要我们派人谈判。我们去谈判的有恽代英、邓中夏、李秋石，我是最后出面的一个，主要由学生毕磊出面。谈判妥当后，鲁迅到校任职。

延年对鲁迅的看法很有远见。当然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开始他的看法有些“左”，说鲁迅是“自由论”，对他并不怎么重视，只是想利用他的声望，到广东来壮壮我们的声势。延年向我们布置工作，要我和毕磊、李秋石及中山大学党总支，做鲁迅的工作，争取鲁迅站到左派的观点上来。经过一阵子工作后，鲁迅的态度还是比较好的，这从他的

日记中可以看出。从这以后延年对鲁迅抱很大的希望，说他可以转变。他认为鲁迅是彻底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以后，延年越研究鲁迅的著作和思想，越觉得深刻，于是要我们党内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鲁迅。他带头提出要研究鲁迅，要大家把鲁迅五四运动后写的所有著作认真看看，进行研究。延年经常问我们：你们到鲁迅那里去了没有？谈了些什么？一问起这些，毕磊就详详细细地讲给他听，延年听了很高兴。

鲁迅是很敏感的。他一到广州就打听共产党的中央委员，问我们陈延年是不是你们党内的负责人？开始我们不敢讲。后来毕磊向延年汇报，说鲁迅问起你，他在北京看到过你，说这小孩很有出息。意思是说延年还是我的晚辈。鲁迅要求和延年见一次面，延年答应了。以后见面没有，我不太清楚，但从延年以后的谈话中好象他和鲁迅见了面，谈得很投机。所以我们党最早做鲁迅的工作并不是30年代以后的事，鲁迅最早和我们党正式接触，陈延年是起主要作用的。我们那时还是小孩子，对于鲁迅的认识是很浮浅的。当时我们只是实用主义，就是想让鲁迅最好站在我们这一边，替我们说几句话，把右派打下去。但是鲁迅说话是委婉曲折的，他不会这样直讲的。开头他还接待右派青年。鲁迅和老年人感情很生疏，他不跟老教授来往，其他来往的人也很少。国民党官员、有势力的人，他根本不理。他只是和青年打交道，在左派和右派青年斗争的过程中，他看清了右派青年是胡闹，才和我们一天天接近。党的“五

大”召开时，延年要走了，在安排工作时，他又谈到了鲁迅，对鲁迅很留恋。他认为我们争取鲁迅的工作做得还不错，说鲁迅有很大的转变，现在不能说他是“自由论”了。他有可能发展。他的骨头还是很硬的，越压迫，他越反抗。后来我们在延安听毛主席做报告，他在评论鲁迅时，回忆到陈延年，觉得陈延年的思想水平还是很高的，对鲁迅是看得比较准的。

延年立场坚定，斗争性强，和戴季陶斗争很坚决。当时右派势力很猖獗，戴季陶经常散布反动思想，毒害青年。延年指示我们利用各种机会揭露戴季陶的反动面目，同右派进行斗争。有一次，我们和戴季陶谈判，延年交代我们和戴季陶谈好后要狠狠地批他一顿，这个人的思想坏透了。我们和戴季陶谈判后，戴假斯文地说，现在你们共产党人才那么多，我们国民党简直不像话了，我看照这样子下去，你们共产党要不再派些人来帮助，国民党就要亡了，希望你们救救国民党，派一些人来国民党里工作。恽代英因接受了延年的指示，就不客气地对戴季陶说，你讲的那个三民主义“连环套”，解释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对青年毒害很深。戴季陶假惺惺地说：现在谈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还有什么理论？接着他又说，我那一套都是骗人的，你们不要听。恽代英又严肃地说，你这个人毒害了多少青年？你表面上这样说，实际上你的思想是最反动的。那次我们怎么说他，他都接受，最后还把我们送出了门口。

延年对宣传工作也十分重视。他曾主办过《少年先锋》、《做什么》等刊物，并为这些刊物写过不少文章。

延年在广州工作时只有二十几岁，当时我们党正处在幼年时期，我们觉得延年当时是比较突出的领导人之一。他的威信很高。他的讲话给我们印象很深，我们认为他讲的道理都对，因此我们都尊重他的意见。延年的作风也好。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剥花生。到了晚上卖花生的人来了，他就拿几个铜板买一点花生来剥拉剥拉。他烟抽得较多，都是百雀牌的。他穿的衣服大都是黑色的。开会、作报告，他都是席地而坐。他在广东手中有权，但是他没有为个人去沾一点光。

1927年4月周恩来同志到武汉时，延年在广东区委（当时设在武汉）三楼办公，我和邓大姐在二楼办公。当时办公室内没有靠背椅，都是长方凳和小方凳。延年面前摆许多小方凳。他管的事很多，黄埔军校、北伐、各支部活动、省港罢工、学生运动等等，所有到他那汇报工作的人，都坐在小凳子上，经常坐得满满的。延年解决问题时十分严肃，态度很认真。

“四·一五”清党以后，我于5月12日到上海去了。延年也从武汉被派到上海任长江局书记，分管上海、浙江、江苏。我一到上海，就找到交通，接上了头，第二天就在北四川路安慎坊见到了延年。我在延年处还碰到了周恩来同志，他刚从武汉回来，谈到武汉政府和党的“五大”情况。延年听了对陈独秀很不满意，讽刺他像泥城隍爷似的，是

塑的偶像，不解决问题（延年没等“五大”结束，就被派到上海了）。

我和延年在上海共见了三次面。6月二十几号第三次见面时，他对我讲周恩来同志让他回武汉去，说现在内奸已暴露，有些人通敌，叫我去告诉李明阳。延年那时已不住在安慎坊，而是在北四川路迪士威路一幢三层楼上，这是江苏省委的办公地点。谈了一阵情况后，他把我送到二楼，打发我走了，他转身去开会了。我刚走到门口，发现情况不对，便迅速走出来。巡捕很快把开会地点包围起来，北四川路街上都戒严了。不一会儿，我们眼看着他们把延年带走了。

延年努力工作，作风踏实，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都很佩服他。俄国顾问鲍罗廷很佩服他，胡志明与他的关系也很好，几次给他当翻译。胡志明办的越南指挥报、青年训练班，都是延年协助搞的。他们两人经常在一起，谈话用法语。解放后，周恩来总理每次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看到我，总谈到陈延年的情况。邓小平同志来审查展览时也谈到延年在法国的作风，和我们在广东所了解的是一致的。我们所有和延年一起工作过的人，都很怀念他。

（张君、万峰岩整理）

刘长胜传略

江柯林

在海参威中国部

1903年6月2日，刘长胜出生在山东省海阳县荪略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勉强读了3年书，便辍学去当为人办丧事的扎纸匠。1918年，刘长胜到大连福源茶庄当学徒。1922年，刚满19岁的刘长胜听说有个姑妈在海参威，在那儿能找到工作做，便背着小包裹，只身来到了异国他乡。以后，他卖过青菜，当过修鞋匠，最后当上了扛麻包的码头工人。

在海参威有一个中国工人五一俱乐部，负责人是中共中央派来的汪寿华（大革命时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刘长胜在五一俱乐部开办的工人补习学校学文化，在俱乐部阅读《向导》、《中国青年》，了解了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1924年，他经杨占魁介绍加入了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人补习学校的许之桢老师见他刻苦好学，革命性强，推荐他到海参威党校列宁学院学习。1927年，刘长胜由梁伯台、王鸿勋介绍，成为联共（布）的一名党员。在

列宁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联共（布）海参威省委中国部工作，担任了海参威码头工会主席。

海参威共有3万多名中国工人，分别在海港轮船公司、远东运输公司、库页岛供应局等单位工作。那时，海参威还比较混乱。一些通事、包工头经常欺压剥削中国人，还用抽鸦片、赌博等手段腐蚀工人，叫工人不要相信无产阶级的“穷党”。刘长胜深入群众，发展会员，并与有关方面联系，争取中国工人与俄国工人在医药费福利方面待遇平等，劳动一年同样可以休假24天。他还与苏联有关方面交涉，使苏联邮局准许中国工人往国内汇钱。同时，帮助年老失去劳动能力的工人与有关方面交涉领回退休养老金。总之，只要是有关工人切身利益的事他都尽力去做，深得工人群众的信赖。

1930年，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要求工会面向生产，调动工人生产积极性，克服散漫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刘长胜听说在半站煤矿工作的中国工人生产任务完成得不好，便和另一同志一起来到了半站。这个煤矿有几千名矿工，大部分是中国人，生活很艰苦。刘长胜经过调查研究，了解到有坏人在工人中活动，这引起刘长胜的警惕。他找工人谈心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为了纪念中国“二·七”大罢工，他组织中国工人开了大会。一小撮坏人扬言要打死中国工人中的党团员，到主席台上乱吵乱打，刘长胜与有关部门研究，将捣乱分子全部逮捕法办。从此工人们情绪高涨，煤产量逐日升高。

1931年，刘长胜到伯力任联共（布）远东边疆党部指导员。第二年，吴玉章、萧三来到伯力，推广拉丁化新文字。拉丁化新文字是苏联共产主义学院中国问题研究院及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院根据瞿秋白的草案搞出来的。目的是使中国的工人群众便于学习，适合中国的语言特点，用口头语的拉丁化新文字发表政治的、科学的思想。刘长胜积极推动这项文字普及工作，担任了中国文字拉丁化委员会主任，编辑了《拉丁化中文辞典》，并在伯力远东国际出版部出版了。

会见邓中夏

1929年1月，刘长胜曾作为苏联海参威工会的代表，到莫斯科出席苏联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得悉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导人邓中夏也出席了会议。邓中夏是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刘长胜以前虽未与他见过面，但早已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刊物上久仰他的名字。因此，会一结束，他便踏着厚厚的积雪，赶到高尔基大街上的“索尤兹纳亚”旅馆，叩响了邓中夏居住的40号房间的房门。两人一见如故。

邓中夏热情地请刘长胜坐下，侃侃而谈。从国内工人生活、劳动条件到思想状况，从各种工人的生活习惯到斗争方法、组织形式，从长辛店铁路工人俱乐部、中国劳动

组合书记部，到上海沪西工友俱乐部、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和在白色恐怖下中国工人的英勇斗争，他的谈话象磁铁一样深深吸引住了刘长胜。刘长胜听得入神，情不自禁地说，要是能把您说的写成一本书出版，让更多的工人了解，那该有多好啊！邓中夏说，他正在写一本有关工人运动的书，准备分上下两册。这本书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取得联系，争取回国参加工人运动，这是刘长胜早有的心愿，也是他一直没有在苏联成家的原因。“象我这样既不会说、又不会写的人回国做工会工作，行吗？听说上海人讲话，我们听不懂，那怎么办？要是回国应该做些什么准备工作才好？”一连串的问题端到了邓中夏面前。邓中夏一一解答了刘长胜的问题。他告诉刘长胜，他在上海、广东、北京等许多地方工作过，语言不通的困难完全能克服，问题是能不能真正到工人中去，真心真意地为他们做点有益的事。你能帮助他们出主意，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解除他们的痛苦，他们就永远不会忘记你。说到回国的准备工作，邓中夏告诉刘长胜：“多学点马列主义理论和苏联经验，那是很需要的。在苏联，学习环境真好啊！在别处，在国内，哪有这样好的条件啊！”夜深了，两人恋恋不舍地分手，不约而同地说出共同的心愿：“我们回国再见吧！”但谁也没料到，这次分别竟成了永别！邓中夏回国后，于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10月牺牲在南京雨花台。

刘长胜永远不能忘记这次有意义的会见。解放后，当他有机会路过南京时，总要到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去凭吊这位著名的中国工人运动先驱。

送 密 电 码 回 国

1933年1月，刘长胜化名罗英进入莫斯科共产国际列宁学院，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的理论。1934年12月毕业后，共产国际决定派他回国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原来，自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中央被迫进行长征后不久，共产国际就与中共中央失去了电讯联系。为了恢复中断的联系，共产国际决定派刘长胜回国把密电码直接送到中共中央。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中国东北的交通站已被敌人破坏，新疆一带边境国民党军队又封锁得很严，因此只能穿过渺无人烟的蒙古大沙漠入境。更主要的是，中共中央究竟在哪儿？谁也答不上，只能从国民党“剿匪”消息中大致知道在陕北一带。

密电码不过薄薄的几页纸，为了躲过敌人的搜查，刘长胜找来了工具，割开鞋底，将领到的钱和密电码塞进去，又密密地缝好，一点不露破绽。想不到当年学到的修鞋手艺还能为革命派上用场。他打扮成中国北方一带的商人模样，踏上了返回祖国的征途。

经过长途跋涉，刘长胜来到了山西。但是国民党阎锡山部队封锁了河岸，过不了黄河。他从黄河边返回柳林，在

一家小旅馆里碰到一帮商人，闲聊中得知他们也要渡河。他便拿出钱来，作为入伙的股金，与这些商人一起以作生意为掩护渡过了黄河。走了一县又一县，为了尽早把密电码送到党中央，刘长胜不顾疲劳向前赶路。1936年5月，当走到陕西省长城北面的宁条梁（今梁镇）时，他终于累得昏倒了。当他醒来时，看见面前站着两个戴着八角帽的红军战士。他心情十分激动，说：“我可找到你们了！”但他被误认为是奸细双臂已被绳子捆住。刘长胜知道误会了并不介意，说：“同志，你们尽快送我去党中央，我有重要情况报告。”他被押到了100多公里外的瓦窑堡。红军北上先遣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问明情况后接待了他，然后，带他去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了汇报。过了不久，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恢复了电台联系。毛泽东表扬说，刘长胜立了一大功劳。

刘长胜到达党中央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工会干部训练班主任。西安事变后，他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主任，着手陕北根据地工会组织的发展工作。他作风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经常深入工厂基层帮助工作，陕北根据地工会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在1937年5月召开的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刘长胜被选为主席团成员。6月，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正式成立，他担任主任。

1937年7月，党中央决定派刘长胜去上海。行前，党的负责人张闻天找刘长胜谈了话，要他到上海后协助刘晓，

用最大的努力把主要产业的党组织和工会建立起来。

7月19日，延安给刘晓发去电报，通知他刘长胜将在8月初到达上海。

开创职工运动的新局面

在刘长胜去上海之前，刘晓就已对刘长胜的工作环境作了安排。由于刘长胜操北方口音，并且是单身，为了便于工作，刘晓物色了一个也是北方籍的女同志，与刘长胜扮成假夫妻。

刘长胜到上海不几天，上海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沪东和闸北天通庵路一带硝烟弥漫，熊熊火海照红了半边天，枪炮声、喊杀声连成一片。全市工人、学生、职员、教师等各界人民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纷纷组织起抗日救亡团体，支前参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大上海！”的口号声响彻全市，《义勇军进行曲》回荡在大街小巷。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使刘长胜深受鼓舞。他利用各种机会学上海话，熟悉上海的大街小巷及风土人情，了解群众的生活和思想情况。

上海是我国最早、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工人运动的摇篮。1921年中国共产党就在这里诞生。此后短短的6年内，共产党人又在这里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地下党员曾发展到8000多人。但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民党的残酷屠杀和党内“左”倾错

误路线的统治，基层党组织和革命力量几乎丧失殆尽。

1937年11月，党中央决定成立江苏省委，领导上海和江浙两省的地下党工作，刘长胜任省委委员兼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不久又担任了省委副书记。刘长胜先后与林枫、顾准、马纯古、吴仲超、张祺、陆志仁、周林、韩念龙等党员接上了关系。他时而身着长衫，时而身着工装，几乎跑遍了租界内和沪东、沪西日军占领区内的各个工厂。一些老地下党员和老工人至今还能回忆起这位身材魁梧而又和蔼可亲的山东汉子。刘长胜经过调查后发现，在全市各行各业的工厂内，都还有仍在坚持地下斗争的零星党团员，还有一批老工会积极分子。而且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又涌现出了一批靠拢党的积极分子。刘长胜对工作充满了信心。

当时，全市产业工人40万，店职员20万，党员还不足100人，党的力量显然太弱了。刘长胜要求工委和职委，在严格审查的基础上放手发展党员。他特别要求在重要产业，即城市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所必需的市政、交通、铁路、海运、纺织和印刷等产业做好党的发展工作。上海工厂和店职员系统的党组织迅速恢复，党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到1939年10月，已陆续建立了交通、邮政、印刷、纱厂、绸厂、烟厂、金融业、店员、洋行等工作委员会，有100多个支部1000多名党员。

大革命时期的上海总工会曾叱咤风云，团结了近80万职工群众，而眼下，日本侵略者明令除汉奸工会外一律不允许组织工会，租界工部局也千方百计地限制职工建立团

体，因此利用合法手段成立工会显然办不到。刘长胜发动大家创造党的群众工作的新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职业界党组织团结群众，利用上层掩护，建立了益友社、银钱业联谊会、华员同乐会等合法团体。工委系统的党员则发起建立了印刷工人业余联谊会以及各产业、工厂的工人自治会、互助社、消费合作社等团体。党通过这种形式，组织和影响着全市 10 多万群众。

刘长胜特别重视职工夜校的工作。他深知没有文化的痛苦。他常对工委和职委的同志说，工人夜校是传播革命思想的阵地，要把对工人的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在他和同志们的努力下，全市各种类型的劳工夜校、文化科学知识讲座纷纷建立，一批又一批的工人和店职员在夜校里接受了革命思想，走上革命道路。

1938 年初，坚持在敌后抗日的新四军缺少棉衣和其它物资，刘长胜及时布置“节约救难”的募捐运动。全市职工 15 万人踊跃捐献钱物，总数达 92 万元之多。这笔款子又通过新华银行送到了新四军军部。1939 年夏，新四军为加强军队和地方工作，要求江苏省委输送一批县委一级的干部。刘长胜与工委、职委的同志反复研究，精心挑选，光是工委系统就送去了 20 多个。抗日根据地需要军工、印刷、纺织、卷烟、面粉等各业技术工人，刘长胜亲自组织安排，光是印刷工人就输送了 1000 多名。对于上海职工的支援，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曾专门致函答谢。

在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

机”的白区工作方针指引下，通过全体地下党员艰苦努力，上海职工运动迅速走出低谷，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1940年初，刘长胜随周恩来去延安向党中央书记处汇报上海工作。党中央对江苏省委的工作，特别是对上海职工运动的蓬勃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在职工中广泛建立各种不同形式群众团体的做法，并高兴地说：“在敌伪统治地区，一个工厂办一所夜校，组织几百工人读书学文化、求进步，就等于办了一个工会，要继续办下去、办好。”

当荣泰烟号的“老板”

1940年春，刘长胜从延安回到了上海。

此时的上海正处在血雨腥风之中。德军1939年进攻波兰后，又相继向法国和英国发起进攻。欧洲战场打得不可开交。上海租界外围的日军趁机向租界渗透。英、法、美仍想以牺牲中国作为日本不参加德意轴心卷入欧战的条件，步步退让。号称“严守中立”的租界工部局根据政府的旨意，加紧对抗日活动的镇压，甚至派巡捕作向导，带日本宪兵队到租界捉人。汉奸特务成群结队，到处乱窜，搜寻抗日群众，捕人杀人的恐怖事件层出不穷。中共地下党员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茅丽瑛和法电工人领袖徐阿梅相继被害。形势一天天地恶化。

为了开展工作，党组织决定让刘长胜以刘浩然老板的

名义，在上海常德路 65 号开了一家荣泰烟号作联络站。伙计是原来在邮局工作的地下党员冯邦荣。筹备这家烟号足足花了近半年时间。在选址时，刘长胜要求冯邦荣不能用亲戚朋友介绍的房子，只能在报上“召盘”、“召顶”的广告中找，这样万一暴露也不会被敌人查出底细和涉及他人。经过刘长胜亲自出面与一个姓王的讨价还价，最后才把房子定下来。

1941 年 1 月 1 日，荣泰烟号在爆竹声中开张营业。冯邦荣从未做过生意，刘长胜就同他研究怎样领“市面”，当“掌柜”。过了一段时间后，生意居然兴隆起来。刘长胜规定，只有他和工委书记张祺能动用烟号的钱款，但笔笔都要入帐。这本帐簿由冯邦荣保存到解放，现在作为革命文物保存在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

1942 年 10 月，刘长胜秘密撤到华中根据地，担任敌区工作部副部长，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可他的公开身份还是荣泰烟号的老板。一直到 1946 年，他才化名刘希敏改行当起“福新号”米店老板来。米店座落在今延安中路 960 号，对面就是当年上海无人不晓的“魔窟”——亚尔培路 2 号中统特务机关。米店的帐房先生是领导秘密电台的张困斋同志。已担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副书记的刘长胜，就在敌人的鼻子底下，与前来“谈生意”的地下市委领导讨论研究党的工作，精心组织那一场场声势磅礴的人民革命斗争。

指挥鲜为人知的上海武装起义

人们都知道大革命时期上海工人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而抗战胜利前夕上海人民为迎接新四军解放上海而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至今还鲜为人知。主持起义的总指挥就是刘长胜。

事情要从1944年6月说起。刘长胜撤退到华中根据地不到两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一败涂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日益发展壮大，已形成对敌的战略包围态势。党中央于6月5日发出《关于城市工作指示》，要求“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华中局决定立即着手进行上海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刘晓去延安参加“七大”后，刘长胜担任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他迅速调集坚持在上海的各系统地下党负责干部，分批到根据地学习，研究了举行武装起义的各项部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当晚，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召开紧急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以粟裕将军为首集结在天目山地区的新四军一师立即进兵上海；刘长胜率敌区工作部干部赶回上海，发动武装起义，里应外合。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宣布成立上海市委，由刘长胜任书记，委

员有张执一、张承宗、陈伟达等。第二天，新华社华中分社播发了新四军军部关于刘长胜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张执一为副市长的命令。张执一和张承宗连夜赶往上海，分别向新四军淞沪支队和上海地下党各委领导传达上级关于发动上海武装起义的命令，并选定离青浦较近的沪西信义机器厂为发动起义的据点，制订了由沪西地区党组织发动群众配合工人地下军占领工厂，再由警委系统的党员作内应，夺取戈登路警察分局枪库内 2000 支枪的起义计划。

刘长胜于 1945 年 8 月 20 日到达上海。他了解到，蒋日伪已公开合流，汪伪上海市市长周佛海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兵力达 12000 多人，驻沪日军也宣称只向国民党缴械投降，而我们的力量与原先估计的有较大出入。他认为上海是蒋介石的必争之地，单凭淞沪支队、260 多名工人地下军队员和其他方面的少数力量，难以确保起义的胜利。即使拿下部分地区，要守住也是十分困难的，而且会有较大的伤亡。他两次派工委书记张祺送电文到青浦新四军淞沪支队驻地拍发给华中局。21 日，华中局命令上海立即以现有力量发动起义，不必等待新四军主力到达。23 日清晨，上海工人地下军和沪西各工厂党员、群众 7000 多人一举占领信义机器厂，设立了起义指挥部。起义群众集中在工厂内外，等待着下一步命令。延安的《解放日报》和重庆的《新华日报》都作了“上海五万工人起义”的报道。

形势的发展瞬息万变。几乎在上海人民武装起义发动

的同时，刘长胜接到了华中局发来的急电：“日本投降条约即将签字，蒋介石已委任了上海官吏，在此形势下，上海起义势必与国民党发生正面冲突而受到镇压，新四军部队到沪也存在被消灭之危险。应即停止上海起义，改为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发动清查反奸斗争，开展和平民主运动。”真是十万火急。刘长胜连奔带跑，找到了工委书记张祺。于是，集结待命的起义群众高呼“要工做”、“要饭吃”的口号，分批撤出工厂。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认为只是失业工人要求复工的游行，谁也不知道是刘长胜安排的停止起义的退兵之计。由于地下党员严守党的机密，国民党又正忙于准备接收，使他们对这次起义竟一无所知。

领导“六·二三”反内战示威

1946年3月以后，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和平作出主动让步，各民主派和饱受战乱的全国人民一致呼吁制止内战的压力下，被迫宣布从6月6日起在东北停战15天。消息传到上海，群情激动，“我们要的是永久的停战，永恒的和平”的呼声响遍了全市各个角落。

6月中旬的一个下午，中央南京局上海工委副书记刘少文、刘晓和刘长胜先后来到静安寺路愚谷村121号（今南京西路1892弄121号）。这是一所双幢三层楼房，北通愚园路，南连静安寺路，东临迪化路，三面均有门进出。底层是由地下党员和一名进步医生合开的中华医药化验所，

三楼住着部分房客。这是一个由刘长胜选定的理想的秘密联络站，他们在这里召开了会议。

刘少文传达了中央关于尽可能推迟全面内战爆发的指示，他提出：为了进一步造成反内战要和平的群众声势，上海工委计划组织一次人民选派代表赴南京请愿的活动。并说周恩来同志和华岗同志已与马叙伦谈妥了代表人选。周恩来同志认为上海工委的活动对象主要是文化界和工商界的上层人物，声势不可能大，他要求上海地下党动员各界群众参加配合。

根据刘长胜的提议，会议决定组织几万人，以欢送和平请愿代表团的名义，举行一次全市反内战示威大游行。会议结束后，他们立即着手示威游行的准备工作。

分工负责上海地下党群众运动的刘长胜提出这个建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上海地下党自从停止武装起义工作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一面领导复工、加薪的生活斗争，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一面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反内战爱国民主运动，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扩大。到1946年上半年，受地下党领导和影响的工会已有100多个，会员有20多万人。而且在成立工会的过程中，由我党掌握领导权的法电、上电等产业工会，已与邓初民、许广平、胡子婴、马叙伦、林汉达等知名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建立了公开的联系，还成立了上海人民反内战的统一战线组织——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另外，参加上海市学生团体联合会的大中学校也有近百个。6月3日，177个工会联合召开反内战座谈会。6

月8日，马叙伦、陶行知、马寅初、阎宝航、茅盾、巴金等各界著名人士164人，上书呼吁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制止内战。因此，发动这场示威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6月23日，上海各界人民群众欢送代表团赴南京请愿。上海人民公推出的和平请愿代表共11人。他们是：马叙伦（前代理教育部长、原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蕙延芳（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四明医院董事长）、盛丕华（上元企业公司董事、开美科药厂董事长）、胡厥文（合作五金厂经理、中国民主建国会负责人）、包达三（雷石化学公司董事长、信仪地产公司总经理）、张弼伯（中兴实业公司董事）、阎宝航（大明公司总经理）、雷洁琼（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吴耀宗（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部主任）、陈震中（圣约翰大学学生、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陈立复（东吴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上海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代表）。马叙伦被推选为代表团团长，胡子婴为代表团秘书长，罗叔章为秘书。这些和平请愿的代表当时在人民群众中都是颇有影响和号召力的人物，他们的参加，对于孤立敌人、团结人民具有很好的作用。

这一天，刘长胜早早地来到北站附近的一所民房内。从上午8时起，一队队学生、工人、职员、教师高举横幅陆续到达北站广场，场内外顿时沸腾起来，反内战的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刘长胜看到群众情绪慷慨激昂，斗争场面声势浩大，心里十分激动。他不由拉起刘晓的手说：“这是

人民的力量，人心的向背预告国民党垮台的日子不远了。”

送走请愿代表后，各界群众5万多人开始示威游行。队伍一路高喊口号，从北站经天目路、浙江路、南京路到达国民党市政府，又折往中正路（今延安东路），经大世界到达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到下4午时才结束。

李维汉后来写道：“这次上海和平请愿运动和‘下关惨案’，是大革命以来上海的乃至全国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影响极大，深刻地教育了人民。”“六·二三”反内战示威揭开了上海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蒋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序幕，扩大和巩固了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曾经指出的，在后方民主运动中农民、工人、士兵和下层公教人员还没有广泛参加的弱点，在上海得到了根本转变。

开辟第二条战线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和腐败统治，造成严重经济危机，人民群众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上海物价就象脱缰的野马，1946年一年之内物价竟上涨了7.7倍。1937年100元法币可买两头牛，到1947年只能买1/3盒火柴了。各业职工在1946年上半年，曾通过斗争取得了按生活费指数计发工资的胜利（即以基本工资乘上生活费指数），使工人实际收入与物价上涨保持相对平衡。但国

民党为了缓解内战造成的经济危机，在1947年2月颁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竟然宣布冻结生活费指数，并重申严禁罢工，违者格杀勿论。这一措施是给靠薪水过活养家的大众雪上加霜，引起了职工群众包括国民党政府内公务员的一致反对。

1947年1月16日，党中央曾决定刘长胜去负责香港分局的工作，为此，刘晓专门致电中央说：“刘长胜对上海情况熟悉，有10年经验积累，对上海工作加强与其他城市开辟与指导，有很重大作用。”中央同意刘长胜留在上海参加上海分局的领导工作。春节过后，刘长胜接到中央2月1日发来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的电报，电报中说：“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将要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阶段。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刘长胜了解群众思想的斗争情绪，他断定新的群众斗争高潮就在眼前。他同刘晓一起仔细研究了中央的指示，决定采取从生活斗争入手、逐步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方针，以开展各业职工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斗争为起点，同时发动学生运动相互呼应，使两者汇合成一场反对美蒋统治的政治斗争新高潮。

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推动下，各业职工纷纷推派代表，不断地去国民党市政府、社会局请愿，四区机器业工会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三区百货业工会还进行了民意测验。这些活动引起各界的共鸣和同情，社会舆论喧腾而起，到处

都是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的呼声。这些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其影响遍及全市。4月29日，工委以上海工人协会名义发布《“五·一”宣言》，号召全市工人为实现和平民主、保障人权、解冻生活费指数、工会民主化等6项要求而斗争，5月份形成了统一斗争的高潮。丝织业、法电和三区百货业职工先后冲破国民党禁令，举行了大规模游行请愿，要求无条件解冻生活费指数。“大票满天飞，工人饿肚皮！”“物价天天涨，工人饿肚肠！”等口号响遍了大街小巷，掀起了职工运动的强大攻势，终于迫使国民党政府宣布解冻生活费指数。

刘晓和刘长胜针对职工运动已出现高潮的斗争形势，决定进一步发动京、沪、杭、平、津各大城市学生，在国民党首都南京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示威运动。5月20日，国民党出动大批军警和马队，挥舞皮鞭、木棍和水龙，血腥镇压各地到南京进行联合请愿的学生，28人被捕，100多名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其中重伤19人。全国各界纷纷起来声援学生的爱国正义行动，严厉谴责国民党政府的血腥暴行，形成了有国统区60多个大中城市参加的、空前广泛的群众运动。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场运动，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

在国民党特务开列的黑名单上，刘长胜总是“名列榜首”，环境十分险恶。但凭着机智和勇敢，他每每化险为夷。一次，他半路上遇到敌人“抄靶子”，想躲避已来不及，便把携带的文电塞进雨伞里，拿着伞把双手举起来。敌人只注意搜身忽略了雨伞，他安全地闯了过去。1948年7月，因有解放区来沪的干部叛变，其中有人认识刘长胜，国民党又准备在8月借换发身份证搜捕地下党员。刘长胜、刘晓、张执一和张承宗等通过赵朴初的关系，到杭州净慈寺内住了一个星期。回沪不久，党中央来电调刘晓、钱瑛去解放区，留下刘长胜在沪主持上海局工作。战支们为他的安全担心，劝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他却爽朗地笑笑，胸有成竹地说：“不必忙，到时候自然会办的。”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接连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百万雄师饮马长江。在上海街头，警察局长毛森悬赏3000银元缉拿共产党的布告随处可见，凄厉的警报声日夜不绝，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被残酷杀害。这时，刘长胜搬到了与地下党有联系的国民党少将参议许彦飞家里。他要许彦飞穿上军装，把一张蒋介石的戎装照片挂在会客室里，照片上款是“彦飞同志”，下款是“蒋中正赠”，吓唬那些“查户口”的警察特务。他自己也脱下长袍，换上了西装，在那里一直住到上海解放。

历史上任何统治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国民党一面集结 20 多万军队，在市郊构筑密密麻麻 4000 多个碉堡和 1 万多个永久性工事，打算死守上海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一面下令把上海所有金银外币和重要工厂设备物资运往台湾。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面临被搜刮一空的危险。如何迎接解放？刘长胜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同沙文汉、张承宗等同志一起，在 1 月 12 日及时制定了反搬迁、反破坏、反屠杀，里应外合保护城市，把配合解放军解放城市与接管城市紧密结合起来的工作方针，“不求目前轰轰烈烈，但求确实为明天作准备。”一份名为《京沪一般形势的特点及当前的基本方针与我们的具体工作》的文件精神，在全市 8000 多名地下党员中传递，化作全市千百万群众的自觉行动。护厂、护校、护店，迎接解放的斗争全面兴起：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恢复活动；工人协会、职员协会、教育协会、新青联等各种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广泛建立；人民保安队队员发展到 6 万多人，人民宣传队和救护队队员有 4 万多人；国民党军队内部起义接二连三；敌军情报和解放军接管所需的资料一批又一批地送到解放军手中。刘长胜冒着生命危险到处奔走，眼里布满血丝，头发也熬白了。

解放上海的战斗在 5 月 12 日打响。5 月 24 日，刘长胜与吴克坚、沙文汉和张承宗等同志一起分析了形势，认为上海解放在即，地下党员和保安队员要立即行动。当晚，人民解放军向市区发起总攻，在明亮的路灯照耀下追击敌人。人民保安队员紧急动员，冒着枪林弹雨为解放军引路，协

助搜索残敌。刘长胜来到威海卫路成都路口的原国民党警备大队部，与解放军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会师，共同指挥战斗。

解放上海的战斗历时 16 昼夜，但全市水、电、煤气和电话通讯一刻也没有中断，苏州河以南市区交通基本正常，工厂照常开工，商店照常营业，学校照常上课。鲜艳的红旗飘扬在天空，国民党搬迁和破坏城市的阴谋彻底破产，城市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陈毅司令员拉着刘长胜的手说：“进城前我们很担心，想不到你们工作做得这样细致周到。你们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啊！”

重建上海总工会

上海虽然解放了，但国民党留下来的是一副烂摊子。市场萧条，百废待兴，人民生活仍十分困难，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又乘机造谣惑众。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军舰还虎视眈眈地停泊在吴淞口外。华东局作了最坏的准备，决定上海基层地下党组织暂时不公开，管理城市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通过工会开展群众工作。要求全体地下党员参加筹建工会工作，尽快地把工会广泛地建立起来。陈毅对刘长胜说，现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选工会干部，你们挑能力强的，总工会机关的房子要挑最好的。刘长胜与原地下市委工委书记张祺等积极准备，在上海解放后第 4 天，召开了上海职工代表纪念五卅 24 周年大会，成立了上海总

工会筹备委员会，刘长胜当选为筹委会主任。

为了尽快地把各产业和基层工会建立起来，刘长胜提出了“搭架子”、“盖锅盖”的方法。即组织工会要先按产业把工会筹备委员会建立起来，然后层层抓工会筹备会的组建工作；把“架子”搭好；发展会员，除了特务，不管是帮派头领，还是同乡会头脑，只要是工人，都不歧视，更不能排挤，把“锅盖”盖住。有问题可以在工会里面做工作。上总筹委会派出 103 个工作组，并举办了各种干部训练班，刘长胜经常去讲课做报告，培养了大批工会干部。到 1950 年初，全市迅速建立起 27 个产业工会，会员达 93 万余人，占当时工人总数的 87%。由于当时党组织还未公开，各级工会组织在贯彻执行党的指示、决议和任务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1950 年 2 月，在解放后的上海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刘长胜当选为上海总工会主席，并担任党组书记。他在做工作报告时，把刘少奇对上海工会工作的指示精神概括为“集中力量，维持生产，粉碎封锁，克服困难”这 16 个字，作为上海工人运动的指导方针，得到华东局的肯定和广大工人的普遍拥护。

刘长胜除了担任工会工作外，还担任了市委第三书记和华东局常委、工委书记、劳动部长以及全国总工会华东办事处主任等职务，担负着协助陈毅市长领导全市人民反封锁、反轰炸斗争，以及维持和恢复生产，救济失业工人，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的繁重工作。他每天都要忙碌到深夜，第二天又早早地起来。他身患糖尿病，但从从不向人提起，紧

张的工作使他劳累过度，可从未好好休息一下。

刘长胜在百忙中，仍十分注意总结职工运动的历史经验。早在1929年在苏联与邓中夏会见时，他就听说邓中夏正在写一部中国职工运动史。刘长胜从延安到上海后不久，即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主持了对全市各主要产业经济情况及职工生活、思想和活动状况的调查，并将所得的近50万字资料整理编印成书，定名为《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假托香港远东出版社公开出版，从而成为关于上海工人运动的第一部专著，在当年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0年，在刘长胜主持下，又编写过续编，但因环境恶化，书稿都遗失了。上海解放后，他读到了延安解放社1943年出版、由邓中夏编著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从而萌发了系统地收集整理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的想法。1952年7月，由刘长胜建议，市委专门成立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要求“各区委、党委、党组应将这项工作视为一项重要任务。”他们共收集了市政、棉纺、邮政、机器、卷烟、店职员和教师7个方面的工运史料1000万字，成稿刊印的产业和工厂工运史27种160万字，并总结了若干专题的经验。这些材料，今天已成为重要的党史资料之一。

在世界工联总部

1953年5月，刘长胜在中国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总副主席。由于他在1946年已当选为世界工联理

事，中共中央和全总决定派他代表中国工会去维也纳世界工联总部工作。

新中国诞生后，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采取敌视、孤立的外交政策，我国对外接触的正式途径很少。通过工会国际活动，使我们有可能了解世界各国的工人斗争，而且对打破封锁也有积极意义。当年刘长胜虽说才50岁，但由于长期的艰苦生活和紧张工作，已两鬓斑白，还患有糖尿病和心脏病。他能说俄语，为了适应新工作，他又开始背法语单词。他感到我国对世界各国工会的历史和现状了解太少，如不抓紧学习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便制订了研究提纲，组织干部抓紧分头收集整理。他对同行的干部说：“行前准备充分一点，将来工作就会顺利些。”他又从书橱里取出已读过多次的恩格斯于1845年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细细地阅读起来。刘长胜认为英国工会是老牌工会，很有代表性。英国工会历史最长，为什么发展这样慢？英国工会机构官僚化表现在哪里？到了世界工联，他又收集了大量资料，并与在世界工联工作的英国人谈话，写成了26万字的《英国工人运动历史研究资料》。这本书至今仍是极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书。此外，他还先后主持编写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情况、工人阶级贫困化和工会运动等问题》、《国际工人运动讲话》和近10万字的关于世界工联历史和现状的研究资料。

刘长胜一行是在1953年5月22日到达世界工联总部所在地维也纳的。世界工联的全称是世界工会联合会，成

立于1945年12月14日，总部原在巴黎。1949年春，英、美、法、意等国工会分裂出去另组自由工联，世界工联总部在1951年被法国政府驱逐，迁到由苏、美、英、法四国共同占领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刘长胜到世界工联不几天，总书记就叫他代表世界工联去日内瓦参加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会议。总书记告诉他，经社部长已起草了发言稿，说这是“轻松的差使”，“等于休假一次”。经请示国内，刘长胜前往日内瓦。当时朝鲜战争还未结束，国民党政府虽然逃出大陆，但仍占据着联合国的中国席位，国民党的“代表”神气活现地坐在前排。刘长胜虽说是代表世界工联，却被告知只有咨询资格，坐在后排，而且仅给了一次20分钟的发言机会。刘长胜十分气愤。主持会议的法国人几次打招呼说，美国代表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在发言中不攻击中国，希望能在日内瓦和平气氛中开好这次会议。刘长胜看看坐满了代表的会场，站起身说：“是的，这里很平静，但亚洲的战火还在燃烧。我国是主张和平的，是美帝国主义挑起战争，侵略朝鲜，把战火烧到我们家门口，我们才被迫同朝鲜人民一起保家卫国。”“没有民族独立，政治解放，根本谈不上建设经济。”会场上哑然无声，主持者赶忙提出别的话题。

会议一结束，刘长胜立即赶回维也纳，筹备将在当年10月召开的世界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他直接负责拟定会议邀请范围和作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工会运动的报告。由于事前作了调查研究，刘长胜举出大量事例，批评

了世界工联 1949 年春的分裂。他认为，本次代表大会应高举团结的旗帜，坚持世界工会运动的团结统一，既邀请那些分裂出去的工会，更要邀请既不参加世界工联又不参加自由工联的各国工会来参加。而且不仅是全国性的，就是重要的产业或地方性质的工会也应邀请。这样，可以使各国工会看到分裂的责任究竟在谁，打破世界工联的孤立困难局面，走向新的团结。刘长胜的主张，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最后书记处终于接受了他的建议。在世界工联书记处的一些书记看来，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会运动是不屑一顾的。他们原已定下了报告局限于“工会”范围内，只能谈工资、工时和社会保险、福利等。刘长胜尖锐地提出：“这与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很不适应，工会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他建议由印度尼西亚工会来介绍这方面的经验。几经周折，最后由印尼工会和我国工会的干部合作完成了这份报告。世界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揭开了邀请非会员工会（占 40%）参加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新的—页，赢得了广泛的赞同。刘长胜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世界工联书记处书记，常驻维也纳参加领导工作。

刘长胜在世界工联的工作得到党中央的肯定，他 1955 年初回国开会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完刘长胜的汇报说：“你们做得对。对国际上的重大问题，在党中央未表态之前，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党中央表态之后，必须按照党中央的决定去做。这是我党长期

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毛泽东问他俄语有否忘记，还随口讲了几句，刘长胜用俄语准确地作了回答，还告诉主席他正学习法语，毛主席很高兴，说他工作不错，并留他一起吃饭。回维也纳前夕，刘长胜接到杨尚昆的电话，说刘少奇要见他。刘少奇对刘长胜说：“你的报告我都赞成，要做好世界工联总书记的团结工作，学习研究各国的工会运动，培养我们的干部。”

刘长胜回到维也纳，形势骤然发生了变化。苏、美、英、法四国在1955年5月与奥地利政府签订了《重建独立和民主的奥地利国家条约》，撤走驻军，把主权交还奥地利。刘长胜敏锐地感到，世界工联总部可能呆不下去了。他要求立即清理资料，保密文件全部送我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保存。7月，条约生效后，在世界工联工作的好几个中国干部因奥国不发签证被阻布达佩斯。1956年2月，奥地利政府查封世界工联总部。我国驻匈牙利大使郝德青和驻维也纳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李一氓都专程前来看望刘长胜，但正在病中的刘长胜考虑的并不是个人安危，他坚持要把全体干部以及全部文件财物撤出维也纳后才离开。在电话被切断、汽车被查封的情况下，刘长胜带领10多位中国干部，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把全部文件和财物安全地转移到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而驻世界工联总部其他国家工会的东西，则全部被奥地利政府接收去了。

刘长胜认为，国际工会运动一方面要顶住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势力的进攻，另一方面也必须反对把一国、一党

和一个工会的路线强加于国际工会运动的做法。各国工会应根据本国的实际，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从1957年到1965年，在世界工会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刘长胜连续当选为世界工联执行委员、副主席，赢得了各国工会领导人的普遍信任和尊敬。

开展人民外交

刘长胜不仅是我国工会卓越的国际活动家，而且是一位人民外交活动家。

1956年9月，刘长胜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12月被党中央调回国内工作。在1957年12月召开的工会“八大”上，他继续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还担任了党组副书记。刘长胜还是全国第一届、第二届和第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刘长胜的主要工作，仍是国际工会和开展同各国人民主要是非洲各国的人民外交工作。他在1960年4月任中非友好协会会长，1962年1月担任北京国际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

1961年，刘长胜以中非友好协会会长的身分，率团访问西非几内亚、马里和加纳这三个已与我国建交的国家，这也是建国后我国访问非洲的第一个代表团。西部非洲是个异常贫穷和落后的地区。刘长胜同往常一样，找来了大批关于非洲各国的资料阅读研究，嘱咐每个团员力戒大国沙文主义，让非洲人民了解我们是真正讲友好的。炎热的非

洲，对年届 60 带病工作的刘长胜是一场生理上的考验。到了马里，他坚持住在没有降温设备的使馆招待所内。去马里内地参观，有时同大家一起睡地铺。访问几内亚时，由于过度疲劳，终于中暑晕倒，但他休息一周后又继续工作。当他被告知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到未建交的尼日尔、上沃尔特、塞内加尔、多哥、达荷美等国访问时，便拖着病体前往访问。其中的达荷美，中国人还从未去过。刘长胜在访问中既掌握原则，又注意方法，尽力扩大同非洲人民的接触。此次西非之行历时 3 个多月，与非洲人民增进了了解，建立了友谊，为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关系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工作。那份 3 万多字的访问报告，为我国开展同非洲的外交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建议。

刘长胜还先后率团访问了阿尔巴尼亚、法国、意大利、南斯拉夫、印度、比利时、澳大利亚、智利、乌拉圭、委内瑞拉和越南。其中有许多国家还未与我国建交，政治情况复杂，条件艰苦。他与各国工会、政府机构和友好协会人士广泛接触，宣传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完成了许多打开局面、建立联系的开拓性工作，被誉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和“民间大使”。

由于长期紧张的工作，刘长胜的病情日益严重。1962 年底，他不顾心绞痛频频发作和医生的反对，坚持去越南出席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国。此后一病不起。养病期间，刘长胜仍抓紧撰写有关材料，记录了我国工会在国际活动中的大量史实及战后国际工会运动的发展和斗争情

况。

“文化大革命”时期，刘长胜在病中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于1967年1月20日在北京含冤逝世，终年64岁。

1979年1月24日，邓小平主持了为刘长胜等8位同志平反昭雪的追悼会。党中央对刘长胜一生的革命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是“上海工人运动和地下党的杰出的领导者”，“是我国工会优秀的领导人和卓越的国际活动家”。

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后五年斗争概述

邓礼峰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一起，经过历时3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军事打击和政治斗争的胜利，迫使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①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和朝中方面签订了停战协定。但美国并不甘心失败，想方设法破坏停战协定的实施，阻挠朝鲜问题和平解决。为了维护停战协定的实施，促成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在停战后的5年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同美军和南朝鲜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于停战协定的实施和保持朝鲜局势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志愿军大力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进一步增进了与朝鲜人民的深情厚谊。

一、维护遣返战俘协议的实施

停战后一个迫切问题，是双方全部遣返战俘。停战协定签字的第二天，即成立了战俘遣返委员会。朝中方面委

^① “联合国军”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加拿大、泰国、法国、土耳其、菲律宾、希腊、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南非联邦、卢森堡共16个国家的军队组成。

员为李平一上校、王健上校、崔学崇上校；对方委员为费莱德斯达夫上校、毕陶夫上校、艾德华兹上校。该委员会在军事停战委员会^①的督导下负责战俘遣返工作。同日下午，该委员会在板门店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从8月5日开始，进行直接遣返战俘的移交工作。停战协定规定：在停战协定生效后60天内，双方应将其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分批直接遣返，交给他们被俘前所属的一方，不得加以任何阻难；未予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则应从拘留一方的军事控制和收容下释放出来，统交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以求得对他们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依此规定，朝中方面到9月19日止，将收容的“联合国军”方面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12773名（内有南朝鲜俘虏7860名、外俘4913名）全部直接遣返完毕。美方到9月24日止，遣返朝中方面被俘人员75801名（朝鲜人民军70161名，志愿军5640名）。在遣返过程中，美方百般阻挠我方被俘人员的归来。他们至少还扣留了坚持遣返的朝中被俘人员300余人。

不直接遣返战俘，是战俘问题中斗争最尖锐的部分，美方蓄意要强迫扣留朝中这部分战俘。依据停战协定，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于1953年9月9日成立，印度的蒂迈雅中将为主席，由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瑞典各出1人为委员。停战协定规定：停战后双方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移交给中立

^① 军事停战委员会于1953年7月28日在板门店成立。它是负责监督停战的机构，总部设在板门店附近。其任务是监督朝鲜停战协定的实施，协商处理任何违反停战协定的事件。

国遣返委员会的印度部队看管，双方派代表对本方的战俘进行解释 90 天，凡愿回乡者立即遣返；90 天期满后，有关尚未要求遣返的战俘问题，交由双方政治会议在 30 天内予以处理；30 天后如尚留存战俘，则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宣布解除他们的战俘身份，使之成为平民，然后根据个人申请分别处理。朝中方面照此规定于 9 月 24 日，将收容的拒绝遣返的美方战俘 359 名，送至板门店松谷里移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美方将所谓不直接遣返的朝中方面被俘人员 2260 名，送至板门店东场里移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美方交出的人数，与朝中方面根据各种有关材料掌握的实际数字相比，还差很多，朝中代表要求美方交代这些人员的下落，而美方一再拖延，经再三催促，美方始于 1954 年 5 月 13 日作了不负责任的交代。朝中方面表示不能接受，并要求美方对此作出诚实的交代。

美方还破坏我方的解释工作，强迫扣留了朝中被俘人员 2.19 万余名。根据停战协议的规定，对交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的不直接遣返被俘人员的解释工作，本应从 1953 年 9 月 25 日开始，由于美方拖延修建解释设备，致使朝中方面的解释工作推迟到 10 月 15 日才开始。解释工作开始后，美方又指使混杂在朝中被俘人员中的特务分子进行破坏和捣乱，用暴力阻挠战俘出营场听取解释，甚至还冒充“战俘代表”，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印度看管部队进行威胁，阴挠他们行使其合法职权。这样，朝中方面的解释工作从一开始就无法正常进行，实际只进行了 10 天，每

天不足 8 小时，有机会听到解释的朝中被俘人员还不到总数的 1/7。尽管如此，中朝方面被俘人员们有 629 名（志愿军 441 人、人民军 188 人）冒着生命危险要求遣返而回到了我方。据此，朝中方面曾提出补足 90 天解释时间的合理要求，竟遭到美方的无理拒绝。美方即于 1954 年 1 月 20 日和 21 日，强迫中立国遣返委员将我方被俘人员 2.19 万余名交给美方，并非法宣布改变他们的战俘身份，把他们强迫送交南朝鲜当局和台湾国民党当局。对此，朝中方面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上提出了强烈抗议。

二、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不懈努力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朝鲜战争虽然停了下来，但朝鲜问题却并没有真正解决。停战协定第 4 条第 60 款规定：“为保证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双方军事司令官兹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的三个月内，分派代表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但是，美国在停战协定签字后的第 12 天（8 月 8 日），即同南朝鲜签订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使美国军队取得了无限期驻留南朝鲜的“权利”。他们还在同一天发表了联合声明，公开扬言，如果在政治会议开了 90 天之后，把朝鲜“统一”在李承晚的统治下的目标无法实现的话，美韩就共同退出会议。这就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设置了一大障碍。中朝两国政府于 1953 年 10 月先后就有关召开政治会议的问题提出过多次声明和建议。10 月上旬，中美两国政府通过瑞典外交部交

换信件的结果，双方商定从10月26日起，朝中两国政府代表和美国政府代表在板门店举行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双方会谈。

会谈开始，美方就在参加政治会议成员问题上制造障碍，反对中立国家参加。后来美方勉强同意中立国家参加会议，但又进行种种刁难。朝中两国代表建议邀请苏联、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5个中立国参加，而美方反对；在讨论召开政治会议的地点时，朝中代表建议在板门店或新德里，美方却提出了旧金山、檀香山、日内瓦、墨西哥、马德里、罗马等十几个地点；在讨论政治会议的程序和讨论政治会议的时间等问题上，美方都表现得毫无诚意。最后，在12月12日双方举行的第23次会议上，美方代表竟片面宣布无限期休会。这样，朝鲜停战协定的高一级政治会议未能召开。

为继续争取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1954年4月26日至6月15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会议。参加会议的国家有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和朝鲜南北双方、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土耳其。在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提出了和平统一朝鲜的建议方案，但被美国等侵朝16国无理拒绝，进而宣布会议破裂。这样，举世瞩目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用了51天、开了15次大会，最后

却以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而结束。

日内瓦会议以后，我方继续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努力，多次建议召开有关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讨论朝鲜的和平统一问题。但是，均遭到了美、英等国的拒绝。

这一系列事实说明，朝鲜停战后，美国根本不想从朝鲜撤退军队，不想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美国的真面目在全世界面前进一步暴露。

三、在监督停战协定实施问题上的斗争

根据停战协定的规定，联合红十字会小组于1953年8月3日成立。当天即签订了《联合红十字会小组工作协议》。联合红十字会分南、北两个小组，即：南组为朝中红十字会代表组，北组为美方红十字会代表组。两组成立后即由板门店出发，分别到南、北方访问本方的被俘人员。朝中方面为来北方的美方红十字会代表提供了各种方便，使其顺利地进行工作。然而，美方对去南方的朝中红十字会代表组的访问工作，不但不给予合作与方便，还进行种种限制和阻挠。8月9日晨6时45分，朝中红十字会代表在巨济岛，受到美方催泪性毒气的袭击。13日，朝中红十字会代表在临津江桥向朝中被俘人员表示慰问时，美国兵用枪撞击中国红十字会代表潘芳的胸部，蛮横地阻止他对朝中被俘人员的慰问。

对上述事件，我方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上提出，经联合红十字会小组协调组调查，情况属实。对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联合红十字会向美方提出了严重抗议。

更为严重的是，美方还破坏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工作，非法运进大批作战物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于1953年8月1日成立，参加委员会的有捷克斯洛伐克的布莱希中将、波兰的翁格洛夫斯基少将、瑞典的格拉夫斯特鲁少将、瑞士的莱纳少将。其任务是：监督交战双方实施停战协定。8月10日，由中立国监察委员会4国成员组成了10个监察小组。这些小组分赴停战双方后方特定口岸，执行监察任务。美方对视察小组的工作进行阻挠和破坏，甚至对其进行侮辱和威胁。停战协定中第13款卯项规定，停战双方不得以增援性的作战武器进入朝鲜，毁坏耗损的作战武器只能在一件对一件条件下进行替换。但是，美方在初期为了逃避视察小组的监督，采用化整为零的办法，运进大量作战物资的拆散件与零件，以便装配成作战武器。从停战到1953年9月30日，视察小组发现美国从朝鲜境外运入了106门迫击炮拆散件。朝中方面于10月3日发表公报揭露了美方破坏协定的行为。但是美方无视我方的反对，继续进行其破坏协定的行动。到1954年2月底止，中立国视察小组发现的美方经由朝鲜特定口岸运入的武器散件、拆散件与零件，就可以装配成火箭炮6400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145门、榴弹炮及其它类型的炮465门，以及各种口径的机关枪1365挺。到1954年4月15日止，为中立国视察小组所发现的美方私自运进南朝鲜的作战飞机达177架之多。我方对美方这些行为，都及时在军事停战委员会的会议上给予了揭露和抗议。

1954年1月20日至21日，美方在南朝鲜仁川港借口“战俘移动”，把2.19万余名朝中被俘人员押走时，强行禁止中立国视察小组进港视察。随后又阻拦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对此，中朝方面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上多次对美方提出了严厉谴责。

日内瓦会议前后，美方对中立国监察委员由不合作、限制活动发展到危害他们的人身安全，直至要解散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对此，我方与美方的限制和破坏行为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四、在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反入侵反挑衅的斗争

停战协定中关于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条文规定：自本停战协定签字后12小时起（即1953年7月27日22时）完全停止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双方各自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公里，中间这宽达4公里的地带为非军事区，其中心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派出对等的民政警察（各方不超过1000名）维持军事分界线南（“联合国军”）北（志愿军和人民军）各自非军事区的秩序。军事分界线非经军事停战委员会特许的人员不准越过。这样，形成了在军事分界线南北的非军事区内双方民政警察警戒对峙，在非军事区南北则是重兵把守的局面。美国为了继续制造朝鲜、远东的紧张局势，则在军事分界线上和非军事区不断制造事端，经常发生违协事件。在军事分界线上，美方的飞机和武装人员越界袭扰、破坏违反协定的事件屡见不鲜。特别是停战初期，对方违协事件更多，军事分界线上局势相当

紧张。对方破坏的主要手段：一是派遣武装人员越界，制造摩擦，挑起事端；二是美方军用飞机入侵朝中部队上空侦察、骚扰；三是派遣特务刺探朝中方面军事情报和进行破坏活动；四是向非军事区或朝中部队阵地打抢打炮，进行挑衅活动，威胁朝中部队的安全；五是偷移军事分界线标志，破坏实际控制线现状，等等。

志愿军一线部队根据军事分界线斗争尖锐复杂的特点，始终保持良好的备战状态，在非军事区担任警戒执勤任务的民政警察，认真履行其职责，积极维护该区内秩序。为了及时打击潜入的敌特和敌小股武装的袭击，朝中方面民警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严密观察，做好预防。即设观察所、观察哨，在前沿组织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的观察网，及时掌握对方的活动情况，找出其规律，及时采取预防措施。5年中，敌特潜入及小股武装的袭扰活动，大都没有逃脱我观察网的严密监视，使敌人的袭扰活动屡遭失败。二是在军事分界线我方一侧非军事区内，坚持昼夜巡逻，严防敌人的破坏活动。1953年底，敌人在南大川向我方移动军事分界线标志物，企图掠占这一地区，我方巡逻民警及时发现，并提出严正抗议，迫敌不得不将标志物挪回原来位置。三是根据观察、巡逻掌握敌特的活动情况和规律，在敌特可能潜入的地区设伏，捕捉敌特，防止渗透。5年间，我方捕获了美方特务和武装人员达700余人，沉重地打击了对方的破坏活动。由于我军高度戒备和采用上述主要的斗争措施，使敌在非军事区或通过非军事区进行的

违反停战协定的 790 余起挑衅活动，均被我军击破，有效地保卫了军事分界线。

与此同时，为了揭露敌人的破坏阴谋活动，朝中方面民警还采取了如下对策：（一）既要做好粉碎敌人挑衅的准备，又不主动惹事。（二）积极向敌方官兵宣传和平政策，做争取对方的工作。首先通过正常交往，消除对方人员的敌对情绪和思想顾虑，取得对方的信任；其次通过经常的交谈、聚餐、节假日赠送礼品、搞联欢等活动，宣传我军的和平政策及主张，揭露美国侵略战争的实质和挑起事端的真相，促使其思想转变。据一线志愿军某军的不完全统计，在 5 年里，我方主动与敌方人员接触 443 人次，联欢 44 次，经过工作后对我方和平政策表示理解和同情的达 377 人，投向我方者 10 人，有的还主动将其本部的部署、换防等情况告诉我方。（三）抓住对方破坏停战协定的重大事件，进行共同调查，以铁的事实揭露敌人的假和谈真战争的阴谋，并公诸于世，使其失去国际信誉，在政治上陷于被动。1955 年 8 月 17 日和 1956 年 11 月 7 日，中朝人民军队先后击落两架侵入朝中方面军事控制区上空的美方军用飞机。10 日，朝中代表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上对美方飞机侵越军事分界线的挑衅活动予以揭露和抗议，在提请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派出视察小组进行调查后，将飞机的残骸和两名驾驶员的尸体、生俘的 1 名驾驶员交给了美方。在人证物证面前，美方的处境十分尴尬。1954 年 8 月 30 日，美方派遣武装特务 3 人越过军事分界线，入侵我方非军事区进

行破坏活动，我方民警当即将其全部抓获。对此事，军事停战委员会第四联合观察小组于9月1日进行共同调查，美方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表示“遗憾”。随后，我方代表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上向美方提出指控，并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人民广播，使美方在政治上陷于被动。

由于朝中方面严格遵守停战协定，保持高度戒备，并对敌方违协事件进行了坚决斗争，使敌人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其破坏停战协定的行动不得不有所收敛，违协事件逐年减少，使其不敢在朝鲜贸然发动新的战争，从而保持了停战局面的稳定。

五、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并遵循着毛泽东主席“爱护朝鲜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指示，尊重朝鲜政府，团结朝鲜人民，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志愿军在战火中抢险救灾，抢救朝鲜人民生命，出现了罗盛教那样的国际主义战士；在战斗空隙中，尽一切力量帮助朝鲜人民生产劳动。

历时3年的战火，使朝鲜城乡一片瓦砾，百姓流离失所，到处是一片凄凉景象。停战以后，朝鲜人民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立即投入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工作中。为了全面地支援朝鲜人民重建家园，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等于1953年11月12日至24日与金日成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会谈，商定如何援助朝鲜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等问题，两国缔结了《中朝经济及

文化合作协定》，并发表了谈判公报。中国政府决定，将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12月31日这一期间中，中国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费用，全部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志愿军广大指战员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响应彭德怀提出的“以自己的劳动来帮助朝鲜人民克服困难，并以此为最光荣的任务”的号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北朝鲜恢复重建的工作中去。他们奔赴平壤、咸兴、新义州等重要城市的建筑工地及广大农村。铁道兵部队与朝鲜人民共同努力，在停战数小时后，就使平壤至新义州的铁路畅通，用3个月的时间，即修复、修整和新建桥梁308座，全长1.5万多米，并修复线路7000多米，车站37处，迅速地全部恢复了朝鲜北半部的原有铁路。担任重建平壤的部队，在建设平壤的工地上边干边学，很快掌握了各种技术，仅用1年多时间，即在平壤市修建了办公大楼、医院、学校等建筑20多万平方米。

志愿军还投入大量劳力帮助朝鲜人民修复被毁坏的水利工程，并兴修了一批新的水利工程。到1957年底，志愿军指战员帮助朝鲜人民先后修复了见龙、泰川等8座大型水库，修筑堤坝1300余座，全长310多公里。在施工中，指战员们有时在齐腰洪水中搏斗，有时在冰水中施工，有的战士在施工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表现了无私奉献和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

为了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不少战士变成了木匠、铁匠、泥水匠、砖瓦匠，盖房子，修学校，填平炸弹坑，起

出敌人埋下的地雷等爆炸物，在很短的时间里，使居民尽快进入新居，恢复生产。在朝鲜东、西海岸上的志愿军部队，帮助朝鲜渔民修补渔船，织补渔网。驻东海岸的一支部队，专建了一个铁匠炉，为附近的渔业生产合作社打修补渔船的钉子，为群众修理工具。他们还帮助渔民修建公路，使渔民们捕获的鲜鱼能用汽车迅速运到附近的火车站。

据不完全统计，志愿军在朝鲜的8年间，主要是在战后5年多的时间里，共帮助朝鲜人民修建公共场所881座，民房45412间，恢复和新建大小桥梁4263座，修坝筑坝4096条（全长4290公里），修建大小水渠2295条（全长1218公里），田间劳动8.5亿坪，运输6.3万多吨。8年来，特别在战时，志愿军节衣缩食，以粮食1000多万公斤，衣物58万件，帮助部分驻地人民度过灾荒。为朝鲜人民治病188万多人次。

志愿军的行动，进一步增进了中朝人民的友谊，受到了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的热情赞扬。金日成说：“我们朝鲜人民从参加朝鲜战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身上，看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光荣的人民中国的新儿女，看到了把朝鲜人民的艰难困苦当成自己的艰难困苦并为克服这种艰难困苦而奋斗努力的崇高而纯洁的新型人物的真面貌。”“这种高贵的道德品质，不能不为朝中两国人民和所有尊重人类尊严的人们引为骄傲。”

在朝鲜停战后的5年间，朝中两国政府和军队为维护

停战协定，争取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作了不懈的努力。为了打开和平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的僵局与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1954年9月至1955年10月间，志愿军分3批主动从朝鲜撤出了19个师的部队。这一主动行动，受到了朝中人民的一致拥护和国际舆论的普遍赞赏。1957年11月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时，在莫斯科与金日成首相商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8年全部撤出朝鲜。

1958年2月14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应邀访问朝鲜，就撤兵问题与朝鲜政府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2月19日，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958年年底以前全部撤出朝鲜。志愿军总部也于2月20日发表声明，声明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官兵完全赞同我国政府的建议，决定于1958年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离朝鲜回到祖国。同时要求美国和参加“联合国军”的其他各国军队，同样采取措施，毫无拖延地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撤出朝鲜。

宣布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以后，广大指战员遵照周恩来关于撤军时要做到“三好”（即交好、走好、到好）的指示，响应志愿军党委发出的“不骄不傲，善始善终，军队撤出，友谊长存”的号召，进一步掀起了一个助民劳动、增进团结友谊的新高潮。指战员们维修工事，清扫战壕，认真做好移交工作。他们把自养的猪、羊，种的蔬菜，生产工具等赠给人民军，把营房、营具、物资器材和医院全套

设备完整无偿地移交给了人民军。

朝鲜人民亦举行盛大活动欢送志愿军。朝鲜政府于1958年2月27日作出了《关于永远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业绩和欢送他们从共和国北半部撤出的决定》。《决定》指出：“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在激烈的祖国解放战争中和战后在我国所建树的不朽功勋和光辉业绩，将永远铭刻在朝鲜人民心中，与我国的繁荣发展共放光辉。”朝鲜政府决定：将志愿军赴朝参战8周年的1958年10月定为朝中友好月。

当志愿军部队分批撤出朝鲜时，金日成首相和朝鲜党政其他领导人，在百忙中，分别到撤军部队驻地看望、慰问和欢送志愿军，出席欢送大会和欢送宴会，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赞扬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同朝鲜美丽的山河一齐万古长存。”朝鲜各地军民纷纷组织盛大欢送会，处处是锦旗飘扬，人山人海。欢送的群众载歌载舞，深夜不散。朝鲜人民对志愿军的情谊，使指战员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志愿军满载着胜利的喜悦和朝鲜人民的深厚友谊凯旋归国，受到党、政府和全国人民的盛大欢迎。

1958年10月28日下午3时，当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归国部队代表团到达北京车站时，周恩来总理和彭真、陈毅、郭沫若、李济深、程潜、张治中以及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在站台上热烈欢迎。周恩来紧紧地握着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和政治委员王平的手，激动地说：

“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代表政府和全国人民，最热烈地欢迎你们——胜利归来的英雄们！”这一天，首都到处披上了节日的盛装，从北京车站到志愿军代表团的住所北京饭店，沿街挂满了彩旗、彩带和横幅标语。代表团乘车由车站驶向北京饭店时，20多万人夹道欢迎。鞭炮声不断，彩花飞舞，彩旗如林，歌声和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10月29日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真、陈毅、李富春、薄一波，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志愿军代表团和志愿军文工团的全体人员，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最高的荣誉。10月30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常委会、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扩大）联席会议，听取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上将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八年来抗美援朝工作报告》，并通过了该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同英勇的朝鲜人民军一道，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战斗，打退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朝鲜停战后，又对巩固朝鲜停战和支援朝鲜人民和平建设，作出了贡献。中国人民志愿军卓越地完成了祖国人民所赋予的光荣使命。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拯救和平的崇高事业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远与日月同辉。

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

郑 谦

1969年至1970年间，中国共产党九大前后，中国曾出现过一次遍及全国、规模空前的战备高潮。

这次战备高潮的出现，与当时的国际形势密切相关，同时也反映出当时我国对于战争形势过于严重的估计。这次战备活动影响巨大，在中央“左”的思想的指导下，特别是由于林彪、江青集团的推波助澜、干扰破坏，在经济生活中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浪费，在政治上助长了当时已经很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战争的威胁。从60年代初起，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苏边境出现了紧张局势。1962年10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军队被迫自卫还击。同年，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企图利用大陆的暂时困难叫嚣“反攻大陆”。1962年以后，美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在越南的战争，对中国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这一系列严峻的事实，使得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把国家安全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不能不高度重

视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

在1964年5月至6月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把国防看作是与农业并列的“一个拳头”。他从存在着新的世界战争严重危险，我国面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估计出发，认为在原子战争时期，没有强大、稳固的后方不行。据此，他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下决心要搞好三线建设。

1965年4月12日，针对美国侵越战争不断升级的趋势，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鉴于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因此，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加强备战。《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要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1965年9月初，国家计委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汇报提纲》明确提出，“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集中力量尽快地把“三线”地区的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汇报提纲》指出，把“三线”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战略大后方是关系到“三五”计划全局和国家安危的大问题，也是

解决长远和当前备战任务的一个根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采取坚定的态度，就会犯方针性的错误。据此，《汇报提纲》认为，加快“三线”建设是“三五”计划的核心。

在1965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各省、各部及军内各部门着重汇报、交流了各自加强战备、加速“三线”建设的情况和计划。会议同意“三五”计划的基本方针为：“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自此，经济建设的中心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这些认识和措施虽然可以理解，但是，显然，它对当时形势和战争的严重性紧迫性的估计是过高了。

1966年，毛泽东对“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战略口号做了具体解释。他指出，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先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然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到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依赖国家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第三是国家的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虽然党中央和毛泽东依然保持着对外敌入侵的高度警惕，主观上仍要继续加强战备工作，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全面夺权”、“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情况下，军队和地方的战备工作均受到严重的

冲击和破坏，有的甚至已经陷于瘫痪和停顿。

1968年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这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已由“天下大乱”的阶段进入了“天下大治”的阶段。在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自身的性质，虽然“天下大治”的理想不可能实现，但与“全面夺权”、“全面内战”时期相比，在全面斗、批、改阶段，国内形势还是较为平稳、安定了一些。遭到严重干扰、破坏的各项工作得以有所恢复，有所发展，部队和地方的战备也有可能比较正常地进行。

与此同时，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国际形势也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反战呼声日盛，美国困难越来越大。而在这一段时间里，苏联却迅速地扩展了其军事力量，并以此为凭借在全世界到处伸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军事力量的竞争朝着有利于苏联方面发展。美苏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局面。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两国之间不断发生边境磨擦。此外，加之意识形态方面的尖锐对立，中国方面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来自与自己接壤并拥有庞大军事力量的苏联的威胁日益增加，它正在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最大的现实的危险。有鉴于此，自60年代中期起，中国战略防御的重点，逐渐由南向北转移，放在“三北”地

区(华北、东北、西北)。随着中苏边境冲突事件迅速增加,^①特别是1968年7月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部队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大规模突然袭击,使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大规模入侵的紧迫性、严重性的估计急剧上升,迫切希望搞好各项战备工作,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这是中共九大前后战备工作高潮的外部原因。

从1968年下半年至1970年底的战备工作总的说来经历了一个常备——高潮——常备的发展过程。

第一阶段:1968年9月至1969年2月。战备工作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以后,战备工作立即被当作一项紧迫的重要工作提上革委会的议事日程。在当时中央重要会议公报、重要文件、两报一刊重要社论以及党政领导人的讲话中,都反复强调:要保持高度警惕,进一步巩固国防,随时准备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

第二阶段:1969年3月至1970年底。战备高潮的掀起与形成。

自1968年起,中苏边境紧张气氛增加,冲突规模明显增大。1968年1月,大批苏联边防军队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侵入中国七里沁岛地区,用装甲车压死、撞死、

^① 据统计,1964年10月15日至1969年3月5日期间,中苏边界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1.5倍。

撞伤中国渔民多人。1969年2月，苏联远东边防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1969年3月，苏联军队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地区，造成严重流血事件。1969年6月和8月，新疆裕民县塔斯提地区和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又发生中苏武装冲突，战争气氛更加浓厚。1969年下半年后，苏联的反华战争舆论明显增加，苏联还私下向美国等国家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外科手术”式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中国更直接、更严重地感受到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全国性的战备工作也随之进入高潮。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1969年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社论明确指出了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主要威胁，以及形势的严峻和紧迫。社论指出：“我们警告苏修叛徒集团：中国的领土主权绝不允许任何人侵犯。……如果你们继续进行军事挑衅，就一定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不管你们来多少人，不管你们联合什么人一起来，我们都要把你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1969年3月5日，社论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准备打仗。”同月15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毛泽东又具体地说到了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战争的问题。他要求：一个县成立一个团，全国都要搞，大县三个营，中县两个营，小县一个营。他提出，如果发生战争，要让对方打进来，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我们的战略是后发制人。他还说，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

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

1969年4月中共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中，以较大的篇幅说到国际形势和中苏边界问题。报告指出：“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充分的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

在1969年4月28日举行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到了要准备打仗的问题。他说，备战主要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关于战略方针，他说，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当时，在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内，在战备与作战的一些主要问题上，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例如，在战争问题上，“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毛泽东语）；在战略方针上，60年代中期以后，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表现为“积极防御，诱

敌深入，打人民战争，打歼灭战”，防御重点在“三北”地区；在战备问题上，一致同意要以充分、广泛的战备工作应付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外敌入侵，等等。

但是，在战争的危险性、紧迫性问题上，当时中央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以林彪为首的，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组的意见。他们过高估计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认为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极大，战争危险迫在眉睫。另一种是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的“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的意见。珍宝岛事件后，四位元帅开了两次会，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题为《从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宝树》的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美苏在全球争霸的态势和重点，提出了若干关系中国战略方针的重要建议。报告认为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并不意味着对方马上就要开始从空中、海上和陆地向中国大举进攻，原因不是对方不想快干，而是没有准备好；而且，不论是从美国还是从苏联来看，它们目前最迫切最突出的是要安定欧洲，巩固欧洲，控制欧洲，这也就是说，它们争夺的重点仍然是在欧洲，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并未改变这一基本战略格局。报告同时也着重指出，不能低估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要抓紧时间搞好战备，时间已经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要素。1969年9月17日，在全国贯彻执行中央“八·二八”命令，战备工作已出现全面高潮时，“国际形势研究小组”又向中央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对目前局势的看法》。

报告提出，目前压倒一切的问题是苏联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报告对此进行了详细的、科学的分析。指出，苏联方面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但它又对战争顾虑重重，怕在政治上孤立，怕加剧国内矛盾和经济困难，怕两败俱伤美国得利主宰全球，等等；所以，在可以预想的时期内，苏联不敢挑起反华大战，反而有可能改变对我国的战争边缘政策，进行和谈；有鉴于此，我们一方面要做好战争准备，一方面要采取灵活的策略，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为“革命制止战争”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事实证明，“国际形势研究小组”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是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所提出的战略方针也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前一种意见占了上风。

中共九大召开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战备工作超出了常备型的轨道，很快进入了突击性的高潮阶段。

1969年6月，为系统研究、制订对付苏联入侵的作战方案，由中央军委召集的“三北”会议在北京举行。

同月，黄永胜、吴法宪等人主持召开军委办事组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按照林彪别有用心地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邱会作等人先后在会上提出，要搞“独立的、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要比洋人还要洋”。他们还提出：“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由于他们盲目扩大军工生产，1969年的国防战备费用比1968年猛增34%，1970、1971年两年又继续递增15%和16%还多。

1969年至1971年这三年，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投资在国家基本建设总投资中所占比重平均高达11%，超过1968年不到9%的比重。造成了工农业之间、轻重工业、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形成了巨大的浪费，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1969年6月中旬，军委办事组公布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机关精简整编方案。

同年6月中旬至7月初，总参谋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战备通信工作会议。会议着重研究了战备通信保障计划，加强通信保密的措施和全国地下电缆网的建设规划等问题。

同年7月30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纪念建军42周年社论：《人民军队所向无敌》。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必须对美国和苏联的侵略野心有足够的估计。我们的方针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美国、苏联硬要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一定奉陪到底。我们准备敌人大打，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

同年8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报告要求：在地方各级革委会统一领导下，吸收驻军和地方有关部门人员，组成各级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小组下设办事机构，承办日常业务工作。报告规定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的基本任务为：组

织和进行对机关、部队和人民群众战备思想教育和防空常识教育；拟制对空防御作战计划并组织实施，拟制城市战时人口疏散计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和训练群众性的消防、救护、抢修、治安等队伍，等等。次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防空全国领导小组成立，组长周恩来，副组长黄永胜、谢富治、吴法宪、阎仲川，办事机构设在总参作战部。

1969年9月，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交通战备建设指示》，批准在“三北”地区修建战备国防公路，要求在1970年开始，在3年内完成。

同月，军委办事组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

同月23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29日，中国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

同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口号》。口号共29条，其中第11条为：“备战、备荒、为人民”；第12条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第22条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要有所准备。”此条为毛泽东审阅时所加。

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最大的战备，但实际上，正是“文化大革命”给战备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九大以后，虽然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都已成立了，整个形势逐渐趋于平稳，但前

一阶段“全面内战”、“天下大乱”所留下的后遗症绝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消除的。而且，“文化大革命”所引发的各种矛盾又在继续造成新的动乱，严重地阻碍着战备工作的进行。

九大以后不久，山西、河南、江苏、湖北等一些省、市、地区又出现反复，动乱再起，一些地方武斗严重。为防止事态扩大和蔓延，中共中央于1969年7月23日发出布告，要求武斗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武斗组织，上交武器，拆除一切战斗据点，依法惩办坏人，实行归口大联合。“七·二三”布告在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山西的形势迅速好转，其他省、市、自治区存在类似情况的地区也受到震动。布告本身虽然没有谈到战备问题，但它所针对的问题和所产生的结果都与战备密切相关。

但是，“七·二三”布告仍不能解决大规模动乱和武斗所遗留下来的各种严重问题。布告发布后，一些边远省、自治区武斗动乱的问题仍未解决，这与当时已经十分严峻的战备形势是很不相适应的。为此，中共中央于1969年8月28日发布命令，这个命令既是一个广泛、紧急的战争动员号令，又是一个措辞严厉、态度坚决的要求立即停止武斗、安定形势的命令。命令首先指出了美国、苏联加紧勾结，阴谋侵犯我国的严峻形势，进而要求边疆军民：坚决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高度地树立敌情观念，克服和平麻痹和轻敌思想，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加强军民联防，随时准备歼灭入侵

之敌。从这一基本点出发，命令要求：大敌当前，要加强军民、军政及军队内部的团结，巩固革委会；反对一切分裂活动，反对资产阶级派性；立即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解散各种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人民解放军；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支援前线。命令要求，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坚决执行命令，服从指挥，严守纪律，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密切注意敌人动向，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

“八·二八”命令把战备工作的紧迫性明确地提到了全国人民面前，把战备问题与稳定形势、平息武斗、消灭派性及加强纪律等问题联系起来。以此为标志，全国的战备工作立即进入高潮，并由主要是思想动员进入了全面的具体实施，由主要是部队的工作变成了全民的紧张行动，由领导机关的一般工作上升为主要工作之一。

“八·二八”命令下达后，全国各地立即出现了传达、贯彻命令的高潮。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均在8月底和9月初召开各种会议，宣读命令，布置、检查落实各项战备工作。甘肃省于8月30日召开省革委会常委会，对照命令检查了前段的战备工作，会议决定：迅速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一个大宣传、大学习“八·二八”命令的高潮；下决心解决一些地区、厂矿的“老大难”单位的问题；在国庆节前整顿一次社会秩序；提前进行战前物资准备、人员疏散等工作。

北京市革委会于9月2日和3日连续两次召开全市大会，号召全市800万军民立即动员起来，以高昂的战斗姿态，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命令，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团结起来，准备打仗。大会决定，立即在全市城乡掀起学习、执行中央命令的热潮，用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武装每个人的头脑；从各方面做好准备，严阵以待；坚决镇压反革命，维护革命秩序，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掀起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热潮；有领导、有步骤地整顿民兵组织，要做到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三落实，并加强首都防空设施。

随着对“七·二三”布告特别是“八·二八”命令广泛的、声势浩大的宣传、贯彻和执行，全国出现了一片浓厚的战备气氛。当时诸如武斗、派性、分裂、无政府主义等直接危及稳定的因素都受到严厉的打击，革委会的权威得到了维护，生产逐步恢复，社会生活、工作秩序有所好转。这些都是进行战备工作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同时，也是紧迫的战备活动的结果。

“八·二八”命令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反响。1969年9月12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原载《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题为《举行军事情报传达会议。中国的核设施对苏联的攻击保持戒备》。报道中说：“中国共产党的军官和民政官员正接到通知要他们预防苏联将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场‘必然的’袭击。……北京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了一个命令，授权军队对‘无政府主义者’、

‘反革命分子’和‘颠覆分子’加强镇压措施。他们的广泛活动被说成是破坏国家的团结和稳定。……在广东会议上，干部们把由毛泽东认可，从9月1日起生效的这个命令说成是实际上是一个‘动员令’，其目的在于加强‘祖国的防御’。……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干部们敦促参加会议的军官和官员对士兵和老百姓进行教育，使他们知道战争已迫在眉睫。”报道表示不解的是：“这里的专家们同样不清楚的是，中国人谈论马上就要打仗，是用来推动它过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计划，还是真正害怕战争而提出这种严密的计划。”

日本《东京新闻》也于1969年11月23日发表了题为《中国发布“八·二八”命令，加强边境地区的备战》的消息，以及题为《同苏联的紧张状态历历在目，对边境地区的武斗感到危机》的评论。评论中说：“‘八·二八’命令的八项内容，直接或间接都同准备打仗有关，由此可见中国同苏联的关系是多么地紧张。……在这种对付苏联和对付美国的准备也即备战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东北、内蒙、新疆、西藏、云南等边境地区，问题特别多，据说各派之间不断发生武斗。针对边境地区的混乱，发布‘八·二八’命令的目的，似乎是要严惩首恶，确保军民纪律，从而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和解放军的支持下，突破国内外的严重局势。”

中国的这种大规模的战备活动虽然完全是防御性的并带有过火反应的色彩，但它却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全球的战

略态势。对于一个高度戒备、充分动员起来的大国来说，任何突然袭击都是难以奏效的。积极的战备防御可以避免战争、走向缓和的重要条件。

1969年9月11日，应苏联方面的要求，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讨论了两国关系中的紧迫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苏联方面表达了缓和边界形势的愿望。双方商定，同年10月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谈判。

但是，林彪及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无视事实，仍继续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做出越来越严重的估计，认为大战在即，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时间可能在国庆节。也可能是在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同时，利用和谈掩护其对华大规模突然袭击。

1969年9月30日，林彪视察北京南苑机场。当晚，他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阎仲川等人开会，布置紧急战备疏散问题。林彪命令当晚立即疏散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防止敌机空降；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配发武器。当晚，空军在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除值班飞机外，全部转移，其它措施也立即落实。

10月中上旬，为防止大规模突然袭击，中央负责人及一些老同志陆续疏散离京。军委办事组撤至北京西郊办公，总参谋部组成了以副总长阎仲川为首的战时指挥班子，“前指”进入京郊战备工事。

1969年10月17日，林彪为“紧急备战”疏散飞抵苏

州市。此时，他既没有认真研究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发展变化的特点，更没有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过高地估计了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10月18日，亦即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前两天，他背着党中央、毛泽东，要秘书给在京的黄永胜发出“六条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当晚，黄永胜即布置阎仲川向全军传达。阎仲川随即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由“前指”下达全军。全军立即进入紧急状态，或进入前沿工事或紧急疏散。19日至20日，许多大中城市也进行了紧急疏散或防空演习。10月中下旬，整个国家处于临战状态，战备活动进入高潮。中国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的严重关注，与中国接壤的一些国家也相应进入了戒备状态。

中苏边界谈判以后，两国关系有所缓和，立即爆发战争的迹象逐渐减少。这时，虽然有些部队还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但总的来说，全国全军的备战活动已开始缓慢地从那种大战在即、一触即发的状态向常备型状态恢复。尽管转变已经缓慢地开始，但直到1969年底，战备气氛仍然很浓，其程度远远超过了1969年9月以前和1970年以后。在当时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的日常工作中，战备工作被当成带动其它各项工作的“纲”。

1969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注意工作方法》，其中指出：“要考虑到全局。一切工作都要从‘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战略思想出发，用这个观点观察

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这就是全局观念。……没有全局观念的工作，就是单纯业务观点。”1969年10月下旬，广东省革委会第十二次常委扩大会议确定要以战备为中心部署今冬明春各项工作。1969年11月中旬，长春市革委会举行城市斗、批、改工作会议，决定从准备打仗出发，以经得起战争考验为标准，认真搞好全市今冬明春斗、批、改工作。在1969年12月7日召开的黑龙江省革委会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上，也以战备工作为重点，讨论落实1970年斗、批、改及工农业生产新跃进问题。

当时，中央对战备工作采取了一种“内紧外松”的方针。紧张的国际形势，大规模紧迫的战备活动在公开的宣传报道中几乎没有反映。尽管战备工作一度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但报纸和广播的基本内容却是“革命大批判”、“活学活用”、“教育革命”、“五·七干校”、“整党建党”以及工农业生产等项工作，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1969年10月至1969年年底，各地战备工作的重点已普遍从平息武斗、铲平山头、加强团结、批判无政府主义等转到战备教育、战备动员、战备训练、战备组织、物资储备、人口疏散等方面，具体内容有：

①战备动员、教育。这是战备工作的思想基础，一直被放在各项战备工作的首位。据湖南省革委会统计，至12月中旬，全省城镇举办战备教育学习班达7200多期，有8万人参加，长沙、衡阳、湘潭、株洲、邵阳几个中等城市

受教育面达 90% 以上。据报道，通过这一系列战备教育活动，“加强了战备观念，促进了斗、批、改运动和工农业的发展。”天津某厂革委会自九大以来，结合国内外形势，针对职工思想，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战争的一系列论述，采用各种形式对全厂职工进行战备教育。在中苏谈判开始时，全厂有 167 名职工主动把被褥搬到厂里，日夜守卫在机器旁，突击生产军工产品。

②按战时要求组织指挥机关。青海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在 11 月上旬决定，将省革委会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约占百分之十几的人到新的指挥机关；一部分约占百分之二十几的人留在西宁，坚持工作；另一部分约占 60% 左右的人到新指挥机关的周围做群众工作和负责面上的工作。湖南省革委会组成了三线，成立了第一指挥所、第二指挥所和本队。中苏谈判时，革委会机关的一、二线人员都背起背包分别进入第一、二指挥所，本队则进行了就地疏散隐蔽。

③疏散城市人口、物资。这是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活动之一。1969 年 10 月中下旬至年底，一批设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春、郑州等大中城市的高等院校被外迁，一些高等学校或被裁并，或以办“五·七”干校、试验农场、分校、进行教育革命实践等名义，在农村建立“战备疏散点”，将大批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下放农村。与此同时，大批中等专业学校被裁并，教师和干部被下放。青岛市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在 1969 年 12 月 15 日晚召开的紧急会议

上议定，在当时全市 92 万人口中应该疏散的人员约四五十万。市里准备将三所高等院校迁往农村，将原定分迁内地的 28 个工厂企业全部搬走，并将科研机关的研究人员全部迁往农村。当时战备疏散不仅给国家财力物力造成很大损失，也使广大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城市居民的生活、工作受到很大的冲击。

④修建地下防空工事。修建防空工事的工作，早已在进行，“八·二八”命令下达及中央防空领导小组成立后，进度明显加快。截止 12 月中旬，湖南全省主要城镇（长沙、湘潭、株洲衡阳等）已挖好的防空工事（防空洞、壕等）可容纳这些城镇人口的一半以上。福建省南安县地处晋江中游的某公社，在村道口、大路旁到处挖了战壕、坑道和单人掩体，交通要道旁有能攻能守的阵地，房屋里有枪眼，制高点 and 暗道直通到指挥作战的堡垒。此外，还有专门储粮、存放战备物资和耕牛的地窑，这些设施还做了防水、防毒、防塌的准备，一些地道从村里发展到村外。县城里的地道，也按疏散区为单位开始挖，计划将各区的地道连接起来，构成地道网，达到能打能防，能在地上打，也能在地下打，使敌人寸步难行。

⑤狠抓民兵工作三落实。这是当时各级革委会普遍重视的一项工作。黑龙江省把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学生以及街道居民都以民兵的组织形式组织起来，实现全民皆兵。有的地方是按生产、工作或居住单位，把群众分别组成战斗队（基干民兵）、支前队（普通民兵）、后勤队（有

孩子的妇女和老年人)和儿童团,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到1969年12月中旬,福建省南安县已经组织起两个民兵独立团(其中一个团战时归军分区直接指挥),还以民兵为骨干组织了一支支前队伍,有6个公社组织了自行车战备运输队。

除此以外,各地的战备工作还包括:修筑战备公路、桥梁,制造轻武器,储存战备物资,建立战时生产领导体制,建立健全战时后勤供应、物资运输、消防、防化、治安纠察等各种专业小分队,等等。

第三阶段:1970年初至1970年底。战备工作由临战型向常备型转化。

从1970年初起,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在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上的认识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全国的战备工作也表现出一些不同于1969年的特点。

1970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在《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社论中号召全国人民“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用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推动斗、批、改,检查斗、批、改,戒骄、戒躁,更好更快地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在这里,战备工作仍然是各项工作的中心和“纲”,但在程度上,较之1969年10月至12月的一些提法和做法,似乎又不那么突出了。

1970年5月11日,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时,谈到了对战争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大国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

有的，但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毛泽东在这里使用的战争与革命的范畴与通常人们所理解的有所不同。这里的革命是当作与战争对立的一个因素出现的，它不仅包括了武装夺取政权的行为，也包括了全世界人民制止帝国主义战争的努力。而他这里所说的战争主要是指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

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其《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里又明确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在这里，值得注意的不仅有他关于战争与革命的提法，还有他对主要敌人的表述。

此后，在毛泽东的谈话和1970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八·一”社论中对战备的提法大致如前。

在1970年9月6日通过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中，有关战备问题的提法有所改变。公报没有重复以前有关“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等提法，而代之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这实际上是恢复了1969年以前的提法。1970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国庆社论又重复了这一提法。这些提法的变化表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央已适时地调整了战备工作与其它各项工作的关系。

不仅如此，与1969年相比，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

国突出了对美国扩大印支战争和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谴责。

1970年5月20日，针对美帝国主义阴谋策动柬埔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悍然出兵柬埔寨，以及恢复对越南北方的轰炸，首都北京举行了百万军民集会。会上，毛泽东在其声明中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5月中下旬，全国各地4亿多人集会游行示威，声讨、谴责美帝国主义的战争罪行。

1970年6月25日至26日，北京及全国各省会纷纷隆重集会，纪念朝鲜祖国解放战争20周年，谴责美帝国主义霸占南朝鲜和中国领土台湾。6月2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亚洲人民团结起来，把美国侵略者从亚洲赶出去》，矛头直指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特别是亚洲的侵略罪行。

1970年11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中国政府 and 中国人民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新的战争挑衅。中国人民正在密切注视着越南和印度支那局势的发展。中国政府重申：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①1970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严正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扩大越南战争，轰炸越南北方。声明指出：“美帝国主义对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任何军事冒险和战争讹诈，

^① 1970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

也是对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挑衅。我们正告美帝国主义，你们不要看错了形势，打错了算盘。越南人民决心打到底，中国人民也决心支持到底。”^①把1970年中国对美帝国主义扩大印支战争的强烈反应，与1969年中国因苏联的战争挑衅而进行的全面战备动员相比较，不难看出，因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国际战略也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虽然这种变化不是根本性的，但它还是逐渐反映到1970年中国的战备活动及其它各项工作中。

从1970年初开始，大规模的战备活动逐渐向常备型方向发展，战备工作与其它工作的关系也逐渐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从年初起，虽然在内部讲话、文件和动员中还把战备作为整个工作的“纲”或“中心”，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1970年初全面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加之斗、批、改运动中的各项繁杂任务，以及1970年初掀起的工农业生产高潮，战备工作往往难于被放在中心的地位，各级领导班子的主要精力往往不得不放到不间断的、杂乱纷繁的政治运动和生产上去。

但是，尽管如此，战备还是对1970年特别是其上半年的各项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或者说，虽然一些直接的，具体的战备工作往往没有被摆在中心的位置，但当时的各项工作又都是在强烈的战备气氛这个总背景下展开的。

1970年2月15日至3月21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

^① 1970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

举行，会议讨论拟定了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计划纲要的总要求是：“四五”计划期间要狠抓战备，集中力量建设战备后方，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初步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适应战备需要，计划纲要中要求：“四五”计划期间将内地建成一个部门比较齐全、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强大战略后方；内地的工业要大分散、小集中，不搞大城市，工厂布点要“靠山、分散、隐蔽”，特殊重要工厂的关键设备或车间，有的要“进洞”，等等。“四五”计划纲要（草案）所提出的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和高指标，与当时以战备为中心带动其它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以及希望在1970年掀起工农业生产新高潮的愿望是密切相关的。1970年国民经济的盲目跃进也是这种指导思想的产物。

除经济工作外，战备工作也对1970年特别是其上半年的斗、批、改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指出，在国际上美苏勾结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的形势下，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加紧进行破坏活动，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指示》要求：为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稳准狠地予以打击。要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

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

1970年2月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中认为，在斗、批、改运动深入发展、工农业生产新高潮正在出现的情况下，一小撮阶级敌人在政治上伺机反扑，在经济领域里对社会主义发动进攻，进行各种经济犯罪活动，这是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同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通知》指出，在当前全国军民正在积极进行战备的情况下，有些单位还大兴土木，讲排场，摆阔气，请客送礼，挥霍浪费国家资财，这种铺张浪费的资产阶级作风，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影响了当前的战备工作，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根据中央这些指示和通知的精神，从2月份起，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这场运动与当时已在进行的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本身已带有严重的扩大化倾向，加之又是在“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和背景下开展的，被认为是“打击帝、修、反”的斗争，所以，运动虽然也处理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和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分子，对铺张浪费现象产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也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扩大化后果。

从1970年初起，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备活动虽然还保持着大规模、高速度势头，但基本上是逐渐向常备型的方

向发展。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颁发了有关指示、召开了有关会议以加强正常的战备工作。

1969年下半年至1970年初，新疆、沈阳、济南、北京等军区的一些部队走出营房，进行野营训练。通过野营拉练，部队的野战生存能力明显提高。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些部队野营拉练的经验。1970年2月，他在总参谋部关于新疆、沈阳、济南3个军区野营训练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这样训练好”。1970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上批示：“全军是否利用冬季进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中央转发了毛泽东这一批示，在通知中要求参加野营训练的人员，“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传播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知识，帮助社、队修理农机具，给群众治病，等等。既‘进行野营训练，又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福利’。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机关工作人员，要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中央通知下发后，从1970年底至1971年初，野营拉练在全国全面铺开，迅速掀起了大规模的野营拉练热潮。

1970年，战备交通建设出现了空前的多项目、大规模、高速度的局面，新建了铁路和国防公路，疏浚、整治了航

道，各地区还新建了许多地方交通线路，大三线的铁路网迅速形成。“三北”地区主要战役方向的公路干线基本成网，通往战略、战役后方基地的道路也得到进一步加强。长江上新建了军用活动码头，黄河上新建了公路大桥，为部队南北机动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国防通信网的建设也有进一步发展，基本形成了以地下指挥所为中心的平战结合的通信网，增强了通信的可靠性。

地方的战备活动也在广泛进行，但其声势和紧张程度已不如 1969 年下半年。

1970 年上半年，华北、东北等地区又相继召开了地区级的战备会议，然后有关省、市、自治区又分别召开了各自的战备工作会议。会议精神层层传达，成为基层各单位战备工作的指导思想。会议分析、研究了国际形势，总结交流了前一阶段各自战备的经验，研究确定了今后战备工作的方向和内容。

全国各大、中城市的防空工作在 1969 年的基础上，又取得较大进展。到 1970 年底，全国许多城市的防空工事已连片成网。此外，物资储备、军工生产、后方建设、支前准备、战地医疗网等各项战备工作，也都有了很大发展。

1969 年至 1970 年间全国性的战备高潮，是在中苏、中美关系处于紧张状态的国际环境中，在我们对于发生外敌入侵，对立即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后发生的。从 1970 年上半年起，当我们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适时适度地调整了我们的战略构想之后，全国的战备

工作又逐渐走上常备型的轨道。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紧张的战备工作对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工作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严峻的国际形势和紧张的战备空气，使得中央在1969年下半年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迅速有力地解决了由于“全面夺权”、“全面内战”、“天下大乱”所遗留下来的武斗、派性和无政府主义问题。在一段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纪律和秩序，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战备工作的进行创造了基本条件。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指导思想并未得到纠正，导致动乱的根源并未被触及，因此，虽然全国战备动员强制性地解决了一些地区恶性武斗，削平了一些顽固的派性山头，但只要一有机会，派性和无政府主义便又会产生和泛滥。1970年初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虽然也处理了一些反革命刑事案件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等问题，但也造成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后果。

由于形势的变化，由于斗、批、改工作各项繁重的任务（如整党建党，清理阶级队伍，基层革委会建设，教育革命，等等），以及1970年一些新任务的提出（如“一打三反”，工农业生产新跃进，等等），战备工作实际上已逐渐从中心工作转为各项日常工作中的一项，成为各级革委会中专门部门的工作，这一过程也就是战备从突击型向常备型发展的过程。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批陈整风又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1972年8月，国家计委在向党中央报送的《关于当前

国民经济中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改变了以往把战备放在国民经济首位的提法，提出要把农业放在首位。1972年国防战备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也由1971年的23.1%下降为20.8%，1973年又进一步压缩到18%。在减少国防战备费用的同时，国家还将一部分投资由内地转向沿海地区，把支援三线作为一、二线主要任务的提法改为重要任务，1973年国家用于沿海地区的投资比上年增加了17.6%。这些变化反映了在林彪事件之后，中共中央对国际形势发展新的认识 and 把握，以及据此对战备方针和国民经济建设方针的适时调整。

去延安*

[日] 野坂参三 韩凤琴译

1939年初夏，《联共党史》的日文翻译工作结束后，我头脑里反复考虑着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今后我的活动地点应该在哪儿。因为在日本的党同左翼工人运动完全断绝了联系，祖国陷入无尽头的战争和走向毁灭之际，我只是呆在莫斯科无所作为，那将无异于政治上的消沉。我考虑，如果通过苏联边境去日本是很危险的，但当时与日军有联系的人经常往来于日本，倘若先到中国大陆的某个地方，然后根据情况潜入日本，这是个最佳方案。

我所在的共产国际东方支部，有来自革命形势最高涨的中国的代表，我们的办公室离得很近。他们有几位领导人常来莫斯科。再加上日本的党与中国的党都把日本帝国主义作为共同敌人，我们很早就有交往。因此，在1931年我到共产国际工作后，很快就同中国的代表亲热起来。在那一年的年底或第二年春天，王明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来到东方支部后不久，又加深了亲密的交往。1933年夏休假

* 该文摘译自野坂参三自传《风雪的历程》一书（新日本出版社，1989年）。

时，我们两家都住在莫斯科近郊的库采博别墅，我跟他曾一起练习手枪射击等。

接着，作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推动者之一的康生于1933年、任弼时于1937年都作为中国代表在共产国际工作，同王明之间的那种亲密关系也在我与他们之间延续下去。此外，瞿秋白的女儿在国际红色救援会的“儿童之家”与岩田义道的女儿鹦在一起，由于这种关系，她们常到我的住所来玩。另外，有时同蔡畅（李富春夫人）和李立三等人见面。

在这种交往中，我增长了有关中国形势、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具有历史意义的长征和中国西北部革命根据地的知识。

一天，大概是1939年末，我把经中国去日本的想法对任弼时讲了。他对我的计划很感兴趣，打算设法帮助我。

恰好在不久前，周恩来来到莫斯科来治疗受伤的右胳膊，不久将回国。任弼时打算再和周恩来商量一下。

我又和妻子龙讲了这个问题，她立刻表示赞成。

不久，任弼时带来了与周恩来商量的结果。说可以和最近就要出院的周恩来一行同行。我对任弼时的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马上把这件事告诉了龙，我们谈了我不在期间龙应该做的工作，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在设法得到有关日本的重要情报时，务必将它转告给库西宁。

第二，要仔细阅读寄到共产国际来的在日本公开出版的报纸、杂志、单行本及其它资料，并把它们按类整理、保存。

第三，如果我在中国呆得过久，可以将极重要的情报寄给我。

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她还需要有人给出主意，我想最好让她到共产国际内我的办公室去上班，于是我向库西宁提出这个建议。

几天之后，库西宁告诉我，季米特洛夫赞成我的中国之行，有关龙的工作的建议，也得到了库西宁的批准。

那时，任弼时告诉我，有一位重要的中国同志想和我见见面，他是八路军的一名指挥员，现在为治疗神经系统疾病来到莫斯科，待康复后就回国，说最好事先见见面。我们乘汽车来到市内一间民房前。那儿有一位和我同辈，个儿不高，脸色苍白，性格内向，好像有点神经过敏的男子。我根本没有想到他是那种有威严的指挥员，他就是曾听说过的林彪。这时，林彪没有正面看我，只是伸出冰凉的手同我轻轻地握手。他一句外语也不会说，对话几乎只在我和任弼时之间进行。任弼时似乎在向林彪说明我的经历。通过任弼时翻译，好像他和我也进行了一些交谈，但内容记不起来了。他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我见到了一位让人觉得有点害怕的人。后来当我得知他就是在见面的前几年在华北的平型关战役中，消灭强大的日本板垣师团的一个旅团的八路军指挥员时，感到震惊。当时的第一次见面令人

难忘，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在我去中国后的那年秋天，林彪，还有我的妻子，都去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疗养，从那时起，不知不觉地似乎同林彪建立了密切关系。妻子有时写信告诉我那时的一些有趣的事。她说：林彪向她自我介绍说他叫林达。又说：“我记得林达同志确实是在第二年（1941年）春回国的（实际是在1942年2月）。当时，我正在共产国际的一间办公室里整理资料，他来见我，只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就走了。后来听说那是因为他要回国，为了向（在延安的）参三转告，便来看看我。我现在还不清楚他是否向参三转告了。”

终于到了出发那一天，我和龙告别后，为了搭乘开往哈萨克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的列车，在共产国际向导的指引下，急忙去火车站。而且，我们上了挂有七八节客车的列车最前头的车厢，即紧靠火车头的车厢。那是周恩来一行乘坐的贵宾车厢。进到里边一看，车厢中央有宽敞的餐车和厨房，餐车兼作谈话室。旅客房间设在餐车前后，这些都由我们使用。

进到指定的房间一看，我很吃惊。意外地坐着一位先来的东洋客人。一看便知，他不是中国人，而是南洋人。脸色黑红，大眼睛，头发黑黑的。我进去时，他也显出有些吃惊的样子，但马上露出笑脸，伸出大手，用流利的英语作了自我介绍。他的名字叫阿里亚罕，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我也向他问好，并作了自我介绍。我不会说汉语，直到此时才想到在今后漫长的旅行中，我不能加入到中国同

志中间去，必须一个人孤独地度日，心中不免有点孤单感，可是由于和英语娴熟的阿里亚罕同住一屋，这才放了心。不等他说明我就知道，他和我一样，是途经中国回祖国去的。阿里亚罕这个名字是他的笔名。他的真名叫马斯·普拉沃依洛戴鲁乔·阿明。同我一样，他是在1946年回国的，回国后的一段时期，他曾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负责人，后来因为和已故的部长会议主席艾地发生矛盾，被从领导岗位上撤职，这也是在战后过了好长时间我才得知的。

列车刚一出发，好像每个人都走进了各自被分配的房间里。发车后不久，任弼时来了，他把我们俩人引到谈话室，向中国同志作了介绍。谈话室里聚集着十来个人。至今我还记得有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蔡畅、陈郁、任弼时夫人等。经任弼时介绍，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他浓眉大眼，目光敏锐，笑的时候显得很温和，一看就是个聪明能干的人。论年龄，他还比我小6岁。夫人邓颖超是个既温厚又聪明的坚定女子。她参加过长征，自1938年以来，她与毛泽东、王明等人一起，担任由7人组成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蔡畅也参加过长征，是被称为卢森堡式的妇女活动家。陈郁是工人出身，是1922年和1925年著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的组织者。他懂英语，具有工人性格，心直口快，我们俩人相处得很好。从这时起，过了19年，在1959年，当我参加完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建国10周年庆典后的归途中，乘飞机访问广州市时，他任广东省省长。陈郁同志亲自到机场迎接我，在这次没有想到的

重逢中，我们共叙友情，并受到了他的款待。后来听说他在1974年去世了。

到达靠近苏联边境的阿拉木图共走了4天3夜。火车一路顺风，没发生特别值得记忆的事情。要说在头脑中留下的深刻记忆，那就是任弼时的夫人陈琼英，她总是成为一行人笑声的中心。她个儿不高，长得如同少女，又像平民百姓似的，嘴里说个没完。谁都不叫她真名，只叫她的爱称“麻雀”。我们也打手势相互进行交谈。

我还记得另一件事。在列车到达目的地那天的前夜，车内突然热闹起来，好像是周恩来等中国人一行正在举行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告别宴会。高声的说话声和大笑声有时经过走廊传到我们的客房，一直持续到深夜。

次日抵达阿拉木图的一行人，因为要在这里等开往中国兰州的班机，所以在此呆了几天。

由于是在苏联领土内，旅客是按贵宾招待的，本应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可是后来情况渐渐变得严重起来。中国国内虽然从1937年起建立了“国共合作”，即成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敌视共产党，大家显得有点紧张。而且，这次旅行又带着我们两个根本不懂汉语的人。这对周恩来来说，似乎有点不方便。

我和阿里亚罕在蔡畅的帮助下进行准备工作。最后决定我们二人充当华侨，说我是在美国长大的华侨，说阿里亚罕是在南洋长大的华侨，而且一口咬定说是英语娴熟的周恩来一家的佣人。

出发去中国的那一天早上，一行人集合在旅馆门口。一看周恩来与往日穿的西服不同，身着国民党将军的制服和军帽。他仪表堂堂，衣服得体。这样一来，沿途的地方官吏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哈腰行礼，我们一行没有遇到麻烦，我这才松了口气。实际上，在以后的长途旅行中，虽然不知道地方官吏是怎样看共产党的，但是由于周恩来的声望和这套制服的缘故，他们没有表示出敌意。

我们乘大轿车前往阿拉木图机场，登上了等候在那里的苏联客机。当时，中苏两国之间签订了航空协定，阿拉木图至甘肃省省会兰州之间隔几天有一趟班机。飞机在飞行途中为了加油，降落在新疆省的省会乌鲁木齐。那时的乌鲁木齐是在军阀盛世才的统治下，对苏联采取了友好态度，身着军服的官兵隆重欢迎周恩来将军。

飞机加油完毕起飞了，径直飞往目的地兰州，在当天的傍晚抵达兰州。一行人立刻被安顿在八路军的甘肃办事处。

我们在兰州呆了五六天，为的是消除从莫斯科出发以来的旅途疲劳和为今后去延安做好复杂和费心的旅行准备。

就这样，旅行的准备全做好了，我们一行乘坐小型公共汽车，从兰州出发到达西安。沿途地方行政机关和居民对周恩来一行十分友好，并提供了各种帮助。周恩来一行在这里也与沿途的其它各城市不一样，他行动好像无拘无束，而且每天都忙忙碌碌地工作。整天关在屋里的阿里亚

罕和我，在中国同志的帮助下，了解了延安这个未知的世界，抓紧制定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计划。尤其是我，除了要将在莫斯科基本写完的文章原稿作最后修改外，还要将各种资料整理一下，以便到延安后可以立即投入工作。

从西安到延安的距离，若从地图上看，大约有二百六七十公里，看来大体是西安至兰州距离的一半，我轻松地认为坐汽车大概有两天就到了，可实际上所用的天数是原来预想的两倍。

当在汽车的前方看到一座9层的塔（即延安宝塔）时，有谁说了一声：那就是延安。道路左侧，有一位白发老人站在那里冲着车招手，车内响起了欢呼声。同时，司机停车，打开门，把老人让进车内。这位老人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受到全党尊敬的林伯渠。这是蔡畅告诉我们的。他是专门来迎接我们一行人的。另外，后来听说林伯渠曾留学日本，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中央大学学习过。

汽车继续往前走时，看到了城墙之类的东西，令我们吃惊的是，那厚厚的城墙和城门全部遭到破坏。更使我惊讶的是，汽车开到城里时，看到城内也是一片砖头瓦块的荒野。向四周一望，连一间象样的房子也没有，人影也是稀稀拉拉，的的确确是令人不快的被遗弃城市的痕迹。一行人中的一个人看到我惊讶的样子，告诉我说这是日军轰炸造成的。当我亲眼看到没给日本造成任何危害的这个中国内地城市遭到如此非人道的残暴的破坏时，我不得不从内心感到愤怒，可是没有人向我说明日军的这种破坏行为

是何时、怎样进行的。然而，我后来从吉积清（他是在我到延安之前的1938年5月被八路军俘虏后来到延安的，现在是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顾问）那里详细打听到关于此时日军的空袭情况。前不久去世的我党中央委员会顾问高仓辉又向我介绍了在此次轰炸之前进行空中侦察的参加者——住在东京立川市的旧陆军航空中尉片仓恕，我从片仓那里得到了他用94式侦察机从3500米高空拍照下来的延安照片。

根据片仓的证言，他实施延安侦察是在1938年1、2月，空袭是在那一年的11月20、21日。之所以选在这个时期，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将在10月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日本方面不知道6日闭会，以为会议还在继续进行，因此选在这个时期。作为这种想法的证据还可以举出当时的《同盟通信》误报这个中央委员会全会将在11月22日结束。

另外，谈点题外话。我从片仓那里得到的侦察摄影是“文革”之前的事。当时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处于正常时期，我把这张照片复制后赠与该党。

最后，汽车停在一个窑洞下面的公路上，像是到达了目的地。周恩来夫妇和任弼时下了汽车，走在前面，并催促我们二人上了窄坡。

我后来才知道这儿叫杨家岭，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因为收到周恩来的归国电报，政治局正在开会。

关于此后的情况，我在战后的1949年写有文章，打算

引用一些。

“大概向上走了 18 米多远的时候，看到从上面下来一些人来欢迎我们这一行人。他们穿着八路军的做得很不讲究的厚棉军服，兰色的棉军服已经褪色，有些发白了。这些人看起来完全是老百姓的风度。在五六个人前面有一位身材高大的人以舒缓的步子走下来。他同我们这一行人的领队同志紧紧地握手，用中国话打招呼。一看到这位巨人的相貌，就知道他是我曾在像片上看见过的毛泽东。他不知道在这一行人里面还有两个外国人。虽然在看到我时觉得面生，但仍然同我热情地握手。这时在他身后的康生（政治局委员）认出了我，于是就喊着‘塔瓦利什欧卡诺’（俄语‘冈野同志’的译音——译者注）跑了过来。他拥抱着我说：‘欢迎！欢迎！’高兴得几乎流出眼泪来。康生在莫斯科时曾一度同我在一起工作过，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

毛泽东看到我同康生用俄语相互倾诉重逢之际的喜悦心情时，他立刻知道了我是日本的共产党人。于是他再一次到我的面前来，一面用中国话说：‘日本同志’，一面再次同我紧紧地握手。

这就是我同毛泽东的最初的会见。

稍事休息之后，同志们就相继到来了。里面有我在苏联见过面的同志。比如，除了康生以外，还有王明、周恩来、陈云、任弼时、吴玉章、蔡畅等人。在那里，大家有趣地谈着我们一行人在旅途中的冒险和喜剧。我也被介绍

给大家。

困难的是，今后如何把我和那位印度尼西亚的同志隐蔽起来的问题。在延安知道我们两个人的事情的只有这里的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我们将来还必须到华中和华南去。而且当前是处于战争状态，必须防备被日本军队和国民党的密探发觉。必须绝对保密。因此应当立即打扮成延安人的模样。康生很快地就去拿来了普通士兵的棉军服、帽子和棉鞋。我们两个人就脱下了从苏联穿来的西服，换上了这种衣服。穿着这身衣服给大家一看，毛泽东笑着说：‘很像很像！’只是印度尼西亚的那位同志因为皮肤是黑的，所以怎么也不像是个纯粹的八路军老战士……”（《延安回忆》，载《劳动评论》杂志 1949 年 7 月号，并转载于《野坂参三选集》战时篇）。

会议结束后，出席会议的人员三五成群结伴到附近的广场去。我们也跟着去了。那里搭有讲台，周围已经聚集了数百人。我们为了不引人注目，被带到会场的角落里，席地而坐。这时太阳开始落山。

不久，宣布开会，演讲开始。周恩来、任弼时、蔡畅接连讲话。因为没给我们翻译，所以讲话的内容一点儿也不懂，但主题似乎是分别报告在苏联及归国途中的情况。唯有对蔡畅的雄辩演说鼓掌最多这一点给我留下了印象。用了一个小时左右，集会结束，当时太阳已经全落下去了，周围一片黑暗。听众悄悄地散去，好像谁都没特别发现我们的存在。

后来，我们被带到美丽的窑洞。在那儿，王明夫妇满面笑容地迎接我们。我和王明夫人孟庆树是在莫斯科认识的。一起共进晚餐后，我们二人便进到隔壁的窑洞，在那儿就寝。这一天，是1940年3月26日，是我满48岁生日的前4天。

次日晨，决定我们搬到其他地方。我们沿着前一天走过的路反方向前进，骑着马渡过延河。一到对岸，顺着路往右拐，即往北拐，照直前进，不久就到了平地。沿着平地正中央的一条窄道走了一个多小时，看到前方以低矮的黄色秃山和山脚下的绿色为背景，高大的砖墙长拖拖地向两侧延伸。

墙中央有一个坚固的大铁门，一行人来到门前。好像是门卫的武装士兵走过来，看到我们前头的士兵出示的证件，立刻打开沉重的铁门。门发出响声，被打开了。一切都很严格。进到门内，看到右侧排列着各种各样的建筑物，左侧有这个地方特有的小苹果树林，在那当中有两间别墅式的房子。

我们被带到的地方，是在这些设施最里面的山脚下并排挖掘的3眼窑洞，它是在距马路有十几米远的高坡上。

我后来才知道，因为周围一带长有许多枣树，所以把这里称为枣园。越南的胡志明，在回祖国之前，好像也在这里住过。

给我分配的窑洞在最里面，接着是阿里亚罕，另一个是翻译的。那个翻译已早有人选，他正在窑洞前面等着我

们。他叫王泽，大约有二十四五岁。据他自我介绍，他是北京大学的辍学者，英语很好。他好像是某地的良家男孩，个儿很高，也有风度，因向往延安而来。我听他说在延安有许多像他这样的青年。

他还带来一个姓杨的十五六岁少年，这个少年给我们送饭，洗衣服，帮我们做其它杂事，听我们适当的吩咐。翻译告诉我，在延安把这样的少年叫做“小鬼”。

我一边听着王说，一边打开手提皮箱，拿出必要的物品开始收拾起来。这时，康生来了，他说，屋子很窄，大概不太方便吧，作为我们来讲，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请忍耐一下。他说完就回去了。

穿过非常严格的大门来到的这一带，究竟是什么地方，我没搞清。数日后我才知道这是名为“敌区工作委员会”的一种情报机关所在地。因为这个机关的负责人是康生，所以又以“康生机关”而闻名。从这种机关的性质考虑，被分配到不大显眼的地方。这对于隐藏我和阿里亚罕来说，也是个极好的场所。

住处也安顿好了，我就按照从在莫斯科时起一直考虑的计划开始工作。虽说如此，但当时还不具备着手准备秘密进入日本的条件，还必须等待时机的到来。在这点上，阿里亚罕也和我一样。于是，在等待期间，为了隐瞒我们是日本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就需要变成中国人。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延安回忆》中是这样写的：

“首先必须确定我的名字。用冈野和坂野的名字都不

行。为了考虑一个中国人和日本人都理解的名字，于是就想了‘林哲’这样一个名字。这不是一个十分常见的名字，但好的地方是这个名字作为中国人的名字来说说得过去，在另一种场合需要改换名字时，作为日本人的名字也能通用。

印度尼西亚的那位同志的名字必须是一个最容易写的、简单的名字。原来他是完全不能写汉字的。于是大家想办法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王太才”（据赵安博同志回忆，应叫“王大才——译者注，下同）。因为这个名字他只要练习练习就能写了。”

这样，迈开延安生活第一步的我，为了使自己尽快地适应和熟悉这里的生活，努力从王泽那里学习各种必要的知识。不大功夫，一个月过去了。

一天，周恩来突然带着一个干部来了。那个干部是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要职的王稼祥。周恩来向我作了介绍。他们两人英语都很好，我们3个人的会谈进行得很顺利，他们来的主要目的是向我传达中国方面关于今后我的工作的意见。

据周恩来讲，如果我从延安出发，秘密进入天津或上海再去日本，由于沿途在日军的占领下，就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力量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也清楚地知道这很困难，但如果仔细地研究一下地点和时间，下功夫抓一下，有没有可能设法打开一条路呢？我从各种角度提出了问题。可是，他们的结论没有变，认为现在还很难看出那种可能性。

交谈最后，周恩来说明了这样意思：为了同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实际上希望我留在延安，帮助做些重要事情。而且问我能否接受。并且附带说明他的这个建议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协商后得出的结论。周恩来的建议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3点：

第一是调查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实际情况，将其结果报告给中共中央。因为在延安也有去日本留过学的同志，他们正在担任这项工作，但是他们的有关日本的知识浅薄，而且陈旧，感到把握不大，这是实际情况。

第二是希望对前线的日军士兵的宣传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关于这一点，当时在前线的几个地方曾开展了这项工作，但工作极为幼稚，不充分，决心改善一下。

第三是希望我亲自抓日军俘虏的教育工作。原来八路军采取的立场是：对当了俘虏的日军士兵，认为他们放下枪、脱去军装，本来就是工人、农民、劳动人民出身，是被日本军阀和反动势力剥削掠夺、受折磨阶层的人们，他们不是被日军侵略、受折磨的中国人民的敌人，而是应该携起手来共同战斗的“国际弟兄”。因此，八路军禁止杀害、虐待日军俘虏，禁止强迫他们劳动，把他们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来对待。希望回日军的，就送他们回去；想留在中国的，就让他们留下，采取了极为人道的俘虏政策。而且在前线的一些地方，虽然规模不大，但成立了由俘虏组成

的反战团体。现在在延安，也有许多俘虏，他们有时还协助八路军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很希望我指导、帮助这项工作。

我接受了这样的建议，同周恩来和王稼祥作了广泛讨论之后，过去那种烦闷不安的心情渐渐消失，感觉立刻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充满了新的希望。我以略微兴奋的心情接受了二人的建议。他们两人听到我的回答非常高兴。

最后，关于我今后的工作和生活的重要问题处理，决定由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负责，具体问题处理由总政治部所属的对敌工作部（简称敌工部）负责。而且，附带说了一下那个负责人将于近日派出。

会谈结束已是黄昏时刻，周恩来和王稼祥一起下山去了。从那以后，自离莫斯科以来一直保持联系的周恩来与我之间的接触打上了终止符，几乎再也没有看到他的身影。因为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到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去了。而且，他后来的工作是由王稼祥完成的。

几天后的一天下午，突然从隔壁传来喧闹声。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跑到外面一看，是在搬家。王太才和王泽从各自住的窑洞搬走，然后搬进一家陌生人。和我一见面，那个好像是主人的人用流畅的日语开始自我介绍。这个人是敌工部长王学之。他还把他的妻子连同像是小学一年级学生的儿子介绍给我。

王学之在学生时代，曾在日本的京都帝国大学留学，在那里跟河上肇博士学经济学。在学习期间，他掌握了共产

主义思想，回国后加入了处于秘密状态下的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地下活动。那时，他还同上海的日本共产主义者保持着联系，但由于日本的特高警察追捕很厉害，最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带着全家人搬到延安。在延安，他在大学里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看上去他是一位诚实的学者式的人物，学术造诣很深，日语比那里的日本人还好。实际上，他是来当我的助手的，这对我来讲，十分感激。他的夫人是一位老式内向的中国妇女，脚上还留有缠足的痕迹，牙齿已被染黑。日语虽然也懂只言片语，但由于她对我敬而远之，尽管住在隔壁，可是在我呆在延安的5年中，我们从来没有充分聊过一次。

这样，我的生活也暂时安定下来，终于开始着手我在延安的最初的工作。我首先问王学文，对过去从科学的社会主义立场出发对日本的形势和国民运动等所作的研究和分析以及关于这方面的报道等在延安是如何处理的？据他回答，在延安有几位去日本留过学的日本问题专家，遗憾的是他们的工作与党的要求还有距离，这和从周恩来那里听到的情况一样。而且说现在最需要克服那个弱点，在这点上他希望得到我的指导和帮助。

他还向我说明了关于当时在延安获取的日本问题情报和资料及其来源情况。其概要如下：

第一，接收日本对中国的短波广播。为此，给我配备了一台短波收报机。

第二，能接收日本和世界各国短波新闻的设备在延安

都很完善，把由此得到的新闻印成稿子每天发给高级干部和重要机关，还说也发给我。

第三，因为日本的主要日报和定期出版的杂志类可以由北京、天津、太原等地活动的中共秘密工作人员冒着危险送到，而且不定期出版的重要资料也可以用同样方法得到，所以可以利用那些资料。

以上资料分别由日本政府和军部发表，令人置信的东西不多，尽管如此，只要有意识地阅读，可以相应地成为正确的判断材料，并可以在当天大体了解日本及围绕日本的世界形势要点。所以，从这点上看，我有一种实感，认为延安这个地方虽然是在山沟里，但是却比在莫斯科和洛杉矶时还靠近日本，这使我很惊讶。

于是，我对王学文说，我在莫斯科写完了关于日本形势的文章，我想这对同志有用，就把它带来了，我问他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发表。王学文听到我说做好了准备，感到吃惊，同时他说希望务必登载在这次敌工部新创刊的《敌国情报》上。于是我把以《日本革命无产阶级的当前任务》为题的较短的文章原稿交给了王学文。

这篇文章很快由王学文译成汉语，发表在《敌国情报》杂志上。这篇文章一发表，在延安的有识之士中引起了轰动。因为从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以来，已经过了将近3年的时间，在这段时期内，关于日本国内的形势、国民的生活状况或国民的情绪，进而还有日本共产主义者的反战斗争等情况，正式写成文章发表，过

去还没有过。可是，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这种东西。于是，除了少数干部知道我的存在以外，大家都很惊讶。而且，究竟笔者是谁这种搜寻声传播开来，好像还有几个人到敌工部来打听。敌工部的回答是：“王学文写的。”在了解过去他写的东西的人们中间，对敌工部的回答没有认可，结果笔者是谁这个问题在以后的一段时间似乎一直是个谜。解开这个谜是在那3年后的1943年我公开使用“冈野进”这个名字以后。

总之，如果从延安的中国共产党对日本的形势分析这一点来看，可以认为这篇文章对于我来说也具有划时代意义。

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对外宣传机构 ——《中国工人通信社》

程慎元

在我党历史上，人们对 1931 年 11 月 7 日在江西瑞金成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下称《红中社》）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对比《红中社》早成立一年多的《中国工人通信社》（亦称《工农通讯社》）就知之甚少了。笔者在研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 30 年代的史料时，偶然发现了一些关于《中国工人通信社》的史料，才对《中国工人通信社》有了一个概略的了解，使我们透过历史的霾雾鸟瞰式地窥见了《中国工人通信社》工作人员在敌人白色恐怖下进行采访、编辑、翻译、打字、油印并向国内外秘密发行《中国工人通信稿》的情形。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实现党在“策略和工作”上的“转变”，中共中央宣传部于 1930 年 10 月成立了《中国工人通信社》，英文名字为 Chinese Workers Correspondence，简称为 CWC。李一氓同志受中央宣传部之托召集林电岩、童我愉、朱伯琛、冯达等在童我愉的住处——上海爱文义路赫德路口一个过街楼上亭子间里

召开了会议，确定林电岩为负责人，社址就设在林电岩的住处——静安寺路大中里，并令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朱伯琛立即从互济会总会搬来与林电岩同住。从这时起，开始了《中国工人通信社》的编采、翻译、打字、油印及秘密发行工作，直到1935年7月中旬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代理宣传部长、《中国工人通信社》负责人董维健被捕才结束长达5年的发稿工作。

《中国工人通信社》的主要任务是以中英文两种文字向国内外秘密发行《中国工人通信稿》。中文稿数量较少，一般是用复写纸复写七八份，供党领导的革命报刊发表。像《红旗日报》、《红旗周报》、上海《斗争》、苏区《斗争》以及《红色中华》等都发表过它的稿件。发往国外的通信稿是用英文打字油印的，用的是KORESS牌美国拷贝纸，这种纸非常薄，每期油印80—100份，由负责秘密发行工作的朱伯琛同志按中宣部事先拟定好的地址寄往苏联、共产国际、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士、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革命或进步刊物，再由他们转换成本国文字加以发表。同时，英文通信稿还设法转交给以伊罗生名义在华创办的英文《中国论坛》发表。此外，胡绳、叶籁士、张企程同志等主办的《无产者世界语通信稿》也经常采用《中国工人通信社》发来的材料，其中常有关于苏区人民革命斗争的消息报导。1933年以后，由于《中国工人通信社》人员有的被捕或他调，潘企之同志除采编、翻译稿件外，几乎承担了全部打印和发行工作。据日本《无产阶级科学资

料月报》1931年6·7月号、8·9月号、10月号、12月号发表的《中国工人通信稿》目录记载，1931年3月31日至9月29日，《中国工人通信社》共发出英文《中国工人通信稿》63期（其中包括5期特刊）；1931年7月至1932年3月日本《无产阶级科学》杂志全文发表的《中国工人通信稿》有15篇之多。

国内外的史料证明，《中国工人通信社》发往国内外的中英文《中国工人通信稿》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面极广。有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及革命团体发出的文件、宣言、电函；有关于红军和苏区斗争方面的报道；有关于白区斗争方面的稿件。关于白区斗争情况，通信稿刊载的数量最多。《中国工人通信社》对国内外的发稿情况表明，30年代初期，《中国工人通信社》的工作是非常出色的，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它对打破敌人对我党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同时向世界人民表明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决心和勇气。

关于参加过《中国工人通信社》工作的人员情况，据史料记载，先后共有11人。他们是林电岩、童我愉、朱镜我、朱伯琛、冯达、董维健、潘企之、应修人、许邦和、李少石，还有住中央宣传部机关并担任“内交”工作的葛琴同志，她也担任过《中国工人通信社》与中宣部的联络工作。其中，林电岩、朱镜我、董维健曾担任过《中国工人

《中国工人通信社》不同时期的负责人。下面分别介绍一下主要工作人员：

林电岩（1900—1937），原名林炯，字电岩，曾使用过阿木林、阿森、马良、王德等化名，浙江省临海县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往苏联学习。1927年回国，在上海党中央机关任翻译，兼管中共与东方各国党的联络工作。精通英、俄两国文字。1930年10月《中国工人通信社》成立时，被确定为负责人。大部分译文和专电都需要他亲自动手，工作十分繁忙。1931年7月被捕，受电刑，英勇不屈。后被党组织营救出狱，调往满洲省委工作，自此脱离《中国工人通信社》。

朱镜我（1901—1941），浙江省鄞县人。192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第一任党团书记。1931年7月林电岩被捕后，调中央宣传部接替林电岩任《中国工人通信社》第二任负责人。1935年2月被捕入狱，从此脱离《中国工人通信社》。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突围时壮烈牺牲。

董维健，生卒不详。一名董之学，因早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文博士学位，故又被称为“董博士”。1935年3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建时被指定为代理宣传部长兼秘书，管理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文印机关，同时兼任《中国工人通信社》第三任负责人。1935年7月中旬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大破坏，董维健被捕。在监狱中，他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保护了中央文

印机关的安全，《中国工人通信社》也未受到破坏。

李少石（1906—1945），广东省新会县人，廖梦醒的丈夫。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5年7月董维健被捕前，曾交待他找《中国工人通信社》潘企之接头，委以未来负责人之责，但因种种原因工作“一直没有重新开始”。^①

朱伯琛（1903—1980），曾用名朱慎修、朱毅（凝）、朱明。湖南省宁乡县人。著名革命教育家朱剑凡之子。父子曾一起留学日本。精通英语。193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立即受命与林电岩接头，调入《中国工人通信社》，担任采编、翻译、秘密发行工作，并与林电岩一同住《中国工人通信社》机关——静安寺路大中里。他曾设法冲破敌人封锁，深入沪东纱厂采访工人斗争情况，并与日本友人尾崎秀实联络，采写了日军动态等方面的重要消息。1932年冬，为躲避敌人追捕离开《中国工人通信社》。后经董维健通知调入《中国论坛》任翻译。但朱伯琛一直与《中国工人通信社》有工作联系，直到1934年初他还曾在董维健安排下为《中国工人通信稿》翻译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土地法大纲等通信稿，并秘密寄往国外。

潘企之（1909—1990），又名潘渭年。江苏省宜兴县人，潘梓年的胞弟。1930年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1932年秋冬到上海寻找党组织，先在党领导的互济会工作，不

^① 潘企之：《在工农通讯社》（未刊稿）。

久即到《中国工人通信社》担任采编、翻译工作。因为他学的是经济专业，所以在通信社主要负责采编有关财政金融方面的稿件，并以“都比”的笔名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经济评论。1935年7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大破坏时，他奉命停止活动，隐居上海，生活极为艰苦、危险。遵义会议后，他根据潘汉年指示，护侍陈云同志由香港转上海，并由上海去苏联。

童我愉，又名熊泽，亦名熊得山，在党内发表文章常以“老熊”为笔名。上海人。曾留学日本，是《中国工人通信社》的主要成员之一，除担任采编、翻译等工作外，兼管通信社的经费，并负责英文稿的最后审定工作。他还是党内组织生活、学习秘密文件的召集人，是林电岩、朱镜我的得力助手，通信社具体工作的主持者。由于工作紧张、劳累，加上营养不良，终因得肺结核逝世。

应修人（1900—1933），原名应德麟，字修士，在党内发表文章以“丁九”为笔名。浙江省慈溪县人。1925年入党。1932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迁往江西瑞金以后，曾以中央代表身份指导《中国工人通信社》工作。1933年5月14日到上海昆山花园7号与丁玲等同志接头时，中敌特埋伏，在楼顶与敌特搏斗时坠楼牺牲。

许邦和，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向往革命工作，义务为《中国工人通信社》的掩护机关——《时闻通信社》工作，后因病贫而歿。

冯达，广东人。精通英文。《中国工人通信社》成立初

期的主要成员之一。当过史沫特莱的英文秘书，主编过中共江苏省委《真话报》，1933年5月14日被捕后叛变。

从以上参加过《中国工人通信社》工作的人员简况可以看出，他们有若干共同特点：一是多才多艺，文化素养较高，一般都精通一门或数门外语；二是具有熟练的中英文打字、油印、密写技巧；三是机敏灵活，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四是无产阶级立场坚定，不怕坐牢，不怕牺牲。除冯达一人外，在被捕、被严刑拷问者中，都宁死不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因此，《中国工人通信社》得以在敌人白色恐怖下坚持5年之久，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通过对《中国工人通信社》史料的分析，我认为《中国工人通信社》的历史可依照对它的领导关系分为三个阶段：（1）1930年10月到1933年1月，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的时期。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它又可以分为两个小阶段：1930年10月到1931年3月是创立阶段。这时主要是调集人员、建立机构、完善地下工作制度与纪律，发行《中国工人通信稿》50篇；1931年3月到1933年初，是它的大发展阶段。在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领导下开展工作。当时张闻天不仅是宣传部长，而且是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苏区委员会主任、党内刊物《红旗》、《斗争》的主编，这为《中国工人通信社》的大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事实上，这个时期的《中国工人通信社》发稿量最大，有些稿件就是根据张闻天在《红旗》、《斗争》上发表的文章翻译而成

的。(2) 1933年1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成立，朱镜我受命担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中国工人通信社》在中共上海中央局领导下开展工作。由于白色恐怖加剧，环境险恶，《中国工人通信社》的发稿量大为减少。(3) 1935年2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破坏，经共产国际同意，成立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原来就在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工作的董维健受命担任了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代理宣传部长兼秘书，同时担任《中国工人通信社》负责人。这个时期，临时中央局屡遭破坏，环境极为恶劣，《中国工人通信社》的工作也日趋困难，已经不能坚持继续发稿。目前国内外均尚未发现1935年以后发出的《中国工人通信稿》。

另外，关于《红中社》与《中国工人通信社》的关系，我认为，《红中社》1931年11月在瑞金成立后，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特别是在宣传苏区政权建设、扩大红军方面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但是《红中社》毕竟只是我党在根据地的一个通讯社，尽管它曾于1931年11月8日以CSR的呼号向外播发过英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但它毕竟因发射功率不大，覆盖面狭小，收听率是很有限的，不像《中国工人通信社》那样向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发出新闻稿。从发稿时间上看，红军主力长征后，《红中社》即停止发报发稿了，而《中国工人通信社》于1935年才停止发稿。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工人通信社》是我党中央领导的第一个对外宣传机关，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具有国际性的新闻通讯社，它在中共党史

上应占有一定的位置。

《中国工人通信社》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它从1930年10月成立，到1935年7月结束，一直以地下方式活动于上海，由于受到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国际指示神圣化以及“左”倾思潮的影响，不可避免地犯有宣传和鼓吹“武装保卫苏联”、“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城市中心”，甚至“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错误，以致最后与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一起丧失了自己存在的客观条件，这不能不是我们应该加以认真总结和细心研究的。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四十一辑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